

【本期论题】

未来五年全球经济金融展望

温信祥，张怀清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北京 100800)

[摘要] 未来五年是全球经济金融的调整期，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动能缺乏，新兴市场经济体进入停滞。全球贸易低增速的状况不会改观，通货紧缩的幽灵仍将在发达经济体徘徊，而实际利率率维持较低水平。杠杆率的上升及金融机构的坏账、国际资本的无序流动、金融市场的过度波动、资产泡沫的破裂等都是金融危机的火种，未知的是金融危机之火在哪个新兴经济体燃烧。

[关键词] 经济放缓 通货紧缩 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 F8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 (2016) 05-0007-06

[作者简介] 温信祥（1970—），福建寿宁人，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张怀清（1971—），山东聊城人，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经8年，全球经济金融依然未能走入良性循环轨道。在接下来的五年，甚至更长的时期，全球经济金融走势值得关注。在中长期，全球经济走势主要取决于资本的累积、劳动力参与量，技术进步及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的资源配置效率等，其中受到关注的量化指标主要包括经济增长率、物价水平、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等。本文在总结当前国际经济金融状况的基础上，对未来五年全球经济金融的走势给出一个大胆的判断。

一、全球经济在深度调整中逐步复苏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经8年，全球市场需求疲软、投资信心不振的局面没有根本性改观，全球经济复苏步伐的缓慢程度超过多数人预期。2015

年全球经济增长为3.1%，为2011年以来最低水平，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年7月份对2016年和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值，分别为3.1%和3.4%。针对全球经济状况，美国经济学家Lawrence Summers在2013年IMF年会上重提“长期停滞”假说，认为金融危机可能对经济造成了永久性伤害，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传统货币政策下很难实现充分就业和潜在产出，经济将长期停滞。可能导致全球长期停滞的因素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人口增长率下降，老龄化加剧。人口增长率在中、高收入国家正逐年递减。二是技术发展缓慢，TFP增长减速（Gordon 2012,2014）。OECD（2014）预测，在2030年以前TFP增长率保持在1.7%，之后30年将会降到1.1%。三是利率走低，产出缺口扩大（Ball，2014）。四是储蓄过度，消费不足。五是资本品价格相对下降，投资不足。六是债务负担重，资产负债表衰退（Koo，

2014)。总体看，主要经济体已陷入低需求、低增长、低就业之间的循环，多数经济体仍将保增长、保就业、防通缩作为首要任务，积极的财政政策及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等总需求政策仍是多数经济体的主要选择，有利于中长期经济增长的结构性改革雷声大、雨点小，进展缓慢；人口老龄化、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等结构性因素导致经济潜在增速下降。在全球经济金融领域，新的经济增长动能正在形成，新市场需求及新投资领域还在孕育之中，未来五年仍旧是全球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期，特别是金融机构、企业和居民资产负债表的修复期。

（一）发达经济体经济逐步复苏，但增长动能缺乏

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和消费基本饱和，2012年至2015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2%、1.2%、1.8%和1.9%。美国保持较高的创新能力，但是目前看，发达经济体制度和技术创新能力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还很难开启一个全新的投资领域和消费市场，以激活全球经济活力，未来五年经济增长率可能保持低位。

作为全球经济金融最具实力的经济体，美国仍将是未来全球经济增长动能的主要中心之一，其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在全球的优势地位仍将保持，其创新和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程度决定了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大趋势。由于特有的灵活的社会经济结构调整能力，美国社会经济结构调整已初显成效，劳动力就业状况不断改善，投资和消费逐步回升，企业、家庭和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已基本修复完成。在危机四伏的全球经济中，全球资本在未来几年将流入美国。社会经济的快速调整能力和创新能力将是未来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美国家庭、企业和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将推动消费和投资的快速复苏，随着消费、投资额逐步恢复和全球资本回流，美国经济增长将逐步回归常态。但美国经济依然受到全球经济，特别是其他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态势的影响，考虑到目前新技术、新市场和新行业还处于蓄势待发之势，美国经济未来五年处于逐步回归到长期经济增长轨道的过程，2020年经济增长率可能为3%至4%之间。

欧元区经济处在经济弱增长时期。尽管欧元区结构性改革逐步取得进展，欧洲经济存在重返增长轨道的机会，但社会结构性改革的力度不足，进一

步结构性改革的难度较大。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负利率政策及财政政策，尽管在短期可能维持了总需求的稳定和通货紧缩的出现，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步调不一的财政政策都对经济金融产生了负面影响。考虑到欧元区内部各经济体的主权独立及衍生的财政独立和货币金融的一体化，是一个长期无法克服的制度性困境，受到结构性问题困扰的欧元区经济，未来五年将呈现弱增长态势，经济增长率在2%以下。

日本经济将依旧维持在既有轨道。近年来日本实现了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特别是激进的安倍经济学，而且也试图进行推进结构性改革计划，但日本经济增长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通货紧缩问题仍旧困扰日本。对日本经济增长及应对措施的分歧依然广泛存在，但可以从另外角度来看日本经济增长的状况。从经济增长有条件收敛的角度看，由于日本人均水平已经处于高收入国家，在既有的社会经济结构条件下，过去20年日本经济增长已经处于自身潜在经济增长率水平，无论日本采取何种政治上正确的决策，作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和处于创新前沿的经济体而言，日本经济已经不存在高增长的条件。从这个逻辑出发，日本多年来采取的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等政治上正确的措施，都不会改变低的潜在增长率，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对经济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例如高政府负债、低利息率产生的扭曲等。因此，尽管在过去几年日本社会经济展现了强大的创新能力，但考虑到老龄化、高政府债务等多种社会经济结构性因素的影响，未来五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仍将延续已有的低位波动态势。

（二）新兴经济体面临经济增长停滞风险

近年来，经历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出口滑坡、资本流动逆转、汇率波动增加、债务上升等外部性冲击，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在过去八年处于被迫调整阶段。可以说，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已经度过最为艰难的阶段，一些经济体经过结构性调整，经济增长表现不错，少数新兴经济体社会经济经济金融问题被掩盖，其后果是可能潜伏更大的货币金融危机，经济金融未来存在很大不确定性。未来五年，甚至更长时期，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复苏主要依赖于两个方面，一是国内的社会结构性改革及其他提升潜在增长率的措施；二是外部需求，特别是主要发

达经济体的经济走势。受制于社会经济结构性变革的困难和改革效果显现的滞后性，新兴市场经济体未来五年经济金融将维持在既有的历史轨迹上，多数依赖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少数幸运者通过社会经济结构性调整而进入社会经济的良性循环。

中国、印度及东南亚和拉美的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潜力依然比较大，这些经济体发展的前景，仍然主要依赖于结构性改革的深度和广度及短期政策的灵活性。中国维持中高速增长仍然是大概率事件，但经济增长更多依赖结构性的进展，从以投资为主，转为投资和消费并重；以外需为主，逐步过渡到外需和内需并重，中国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逐步减弱。印度和印尼，国内存在巨大的内需基础，未来可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快速经济增长，给地区经济增长提供强有力的动力，但在未来五年，甚至十年成为带动全球需求回升的新兴市场可能性不大。除中国、印度等少数例外者，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将继续依赖于发达经济体经济金融的恢复状况。此外，少数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单一、财政金融状况脆弱、抗风险能力差，金融风险累积较大，在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严重、国际资本无序流动和汇率波动较大的货币金融环境下，政府、企业和居民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可能以强制的方式完成，未来五年这些经济体发生货币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比较高，并扰动全球经济增长，这是未来五年全球经济增长中的最大不确定性。

二、全球贸易增长进入低速期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贸易增速大幅放缓，除2010年反弹外，2011至2015年间的年均增速处于低位，分别为6.8%、2.8%、3.5%、3.7%和2.6%（World Economic Outlook, 2016）。这远远低于1987~2007年全球贸易的年平均增速7.1%，也连续数年低于全球经济增速。

全球贸易增长放缓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结构性短期因素在起作用。二战后，全球经济在1971、1976、1982、1991、2009年等经历了较为严重的衰退，而每次经济衰退都带来全球出口增速的急剧下降。未来五年，全球经济处于恢复过程中，必然导

致全球贸易经济增长的低速。同时，全球贸易增长相对于经济增长的放缓等结构性因素发生变化。多项研究表明，收入的贸易弹性在近期发生变化，1970年至2013年收入的贸易弹性为1.7，其中1986年至2000年为2.2，2001至2013年为1.3（WEO 2015）。国际分工与交易规模的扩张是经济发展的大趋势，社会经济金融的全球化也是大势所趋，1960年至今全球贸易总额与GDP之比呈现上升态势。但在经济放缓的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等政治因素必然影响国际间的分工与合作的程度，延缓国际贸易的增长。

未来全球贸易增长还会受到政治等因素的影响。社会分工与交易必然提高社会的总福利，但这种社会福利的提高并不会在分工与交易者之间合理分配，甚至可能损坏一部分的利益。社会经济金融的全球化和市场力量提高了人类的总福利，但同时扩大了全球收入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仅体现在发达经济体和不发达经济体之间，也体现在各经济体内部的不同行业、领域和不同阶层。例如，无论是美国、英国，还是法国，民粹主义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底层并没有从全球贸易中获得很大的收益，而是受到冲击。作为对经济放缓、全球需求不足的直接反应，2008年后贸易保护主义已经出现，包括直接限制贸易措施，也包括货币竞争性贬值和区域贸易集团对非成员的隐形歧视，各经济体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球贸易的增长。更重要的是，近年来社会经济金融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冲击，将逐渐蔓延到主要发达经济体政治及经济政策的各个方面，并将对全球贸易的开放度及政策产生影响，甚至体现在国际关系、全球治理、经济发展的理念与模式等方面。逆全球化和逆区域化的趋势已经有较多表现，例如，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英国脱欧等，甚至美国国内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种区域化的贸易协定也出现了反对的声音。因此，在未来五年全球社会经济的调整期，无论经济金融因素，还是社会政治因素，对全球贸易的影响都将逐步显现，尽管社会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但未来五年社会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步伐可能放慢，国际贸易增长进入平台期。

三、大宗商品价格将回归正常水平

影响大宗商品价格走势的因素，主要包括大宗商品的供给与需求等中长期因素及金融因素等短期因素。大宗商品2005年开始大幅上涨，2008年经历大幅下跌，2015年开始由逐渐下滑。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看，未来大宗商品价格可能在目前水平的一定区间波动，而不是回到过去的高位区间。这里以石油为例讨论未来大宗商品价格的走势。

从中长期看，决定油价走势的根本因素是供需关系，未来原油价格大幅回归到以前较高水平的可能性较低。从需求方面看，发达国家消费萎缩、人口老龄化趋势不会改变，对资源能源的需求量和人均消耗量将趋势性下降。除美国经济强劲复苏以外，欧洲、日本经济濒临萎缩，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处于下行调整中，实体经济的需求仍较疲弱，未来原油需求增速可能下滑。美国由于原油自给率显著提高，进口需求大幅下降。欧洲和日本原油消费需求有下降趋势。尽管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对原油的需求继续上升，但经济放缓也导致需求增速回落全球经济放缓，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对原油需求的影响十分明显。在过去15年，中国原油需求增量在世界石油需求增量中占据很大比重，未来中国经济转型也将导致对原油需求的增速放缓。此外，全球产业结构趋向低碳化，以新能源、环保、高附加值制造业、生产服务性制造业，以及能够提高能源效率的高技术产业为代表的低碳经济，将成为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推动力，初级矿产资源、基础大宗商品以及化石能源需求会趋于减少。从供给角度看，能源效率的提高、页岩油技术、新能源等替代能源的开发以及环境标准的提升，将大大改变全球资源能源的供给结构。未来五年，在未出现新的石油需求市场和领域之前，原油价格不可能回归到原来的高位。

在经济增长放缓、需求下滑和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的背景下，全球一般物价水平呈现下行的态势。由于各经济体在全球经济金融格局中的位置及国内经济金融情况存在很大的差异，尽管相对于自身国内一般物价水平走势而言，多数经济体CPI呈现下行趋势，但一般物价水平在各经济体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主要发达经济体一直存在通货紧缩的压力。

少数不发达经济体货币贬值、债务高企等国内因素推动通货膨胀率上升。在全球经济增长和需求都处于恢复的过程中，主要发达经济体面临的通货紧缩困境在未来五年可能会逐步缓解，但通胀率仍将维持在较低水平，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可能抬头。

四、全球实际利率率继续维持低水平

从1980年至今，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长期实际利率率一直处于下行通道。Zhu(2016)采用简单统计方法，分析了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日本、中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自然利率，发现除中国和泰国外，亚洲主要经济体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自然利率呈现下降趋势，平均下降4%，这一趋势在2000年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更加明显。关于实际利率长期下降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解释，一是全球总需求的持续疲弱；二是生产率增长缓慢；三是人口老龄化趋势；四是全球储蓄过剩假说。针对全球长期实际利率下降的问题，特别是美国过去30多年长期实际利率下降的问题，Hall(2016)认为主要是经济中风险厌恶者与风险偏好者的占比发生了变化，风险厌恶者占比上升，导致长期均衡利率下降。Carvalho et al. (2016)认为，1990年至2014年期间，人口变化至少可以解释1.5个百分点的实际利率下降。

短期看，除美国外，其他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仍然乏力，并争相实施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负利率政策，这种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可能进一步压低实际利息率。从中长期看，在决定实际利息率的因素中，最重要的是资本投资回报率，在宏观上则表现为经济增长率。因此，综合考量未来经济增长率和主要经济体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负利率政策，未来五年长期实际利率仍将维持较低水平。

五、部分脆弱经济体可能爆发金融危机

全球债务问题凸显。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主要经济体都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为应对危机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积累了大量债务。同时，经济持续萎靡不振的时间超出了多数人的预期，一些经

济体政府债务率不断攀升，在经济放缓的背景下，政府负债率一直呈现上行态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15年，发达经济体政府负债率（政府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高达104.8%，较2007年提高33.4个百分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政府负债率为45.1%，较2007年提高7.8个百分点。此外，受到大宗商品价格的暴跌冲击和经济增长放缓带来的财政收入减少，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体财政负担加大，可能会遇到麻烦。

资产泡沫问题需要关注。考察二战后的70年，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货币政策大宽松是力度最大的，在全球经济金融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全部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首先是采用传统货币政策，降低利率，利率到达零下限之后开始量化宽松（QE）；多轮量化宽松之后，发现效果不明显，规模也遇到了限制；然后又开始尝试负利率。目前，除美国外，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仍保持极度宽松，欧洲中央银行和日本中央银行都在实行负利率政策，且量化宽松规模还在不断加大。在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资本大量涌入股市、房地产市场、商品市场，推高了金融资产价格，埋下金融风险的隐患。

负利率政策影响深远。目前已有瑞典央行、丹麦央行、欧央行、瑞士央行和日本银行五个中央银行实施负利率政策，以应对经济放缓、通货紧缩、货币升值。从其短期影响看（Jackson,2015,Bech & Malkhozov 2016），负利率政策和正利率政策的传导机制是一样的，传导到短期货币市场利率和其他货币市场利率，其对货币市场交易量的影响相对较小，未对货币市场的正常运转产生影响。负利率政策也传导到长期和高风险利率。目前还未看到负利率政策对零售存款利率的影响，对现金需求也没有明显的异常冲击。但负利率政策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实施是首次，其影响是深远的、复杂的。

全球金融市场风险加大。宽松货币政策导致除美元外的其他主要国际货币竞相贬值，加剧了国际资本的无序流动和汇率的过度波动。这次金融危机首先发源于美国，然后冲击了欧元区，在当前的货币金融环境下，第三波可能扩散到新兴市场经济体和不发达经济体。在美国经济率先复苏及美联储加息的背景下，由于美元在全球经济金融中的核心地位，美元、美债将成为全球资本的避风港和安全资

产，美元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还是全球追逐的安全资产。而在全世界货币金融市场中占重要地位的几大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存在巨大分歧，进一步加剧金融市场波动率以及多重经济金融风险，小的事件可能引发全球范围内的资本异常流动，引发金融动荡，特别是债务过高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其他不发达经济体，很可能发生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

六、结论

未来五年全球经济金融发展突出特征是：从经济增长趋势看，全球经济将进入恢复和调整期，经济增长可能呈现不稳定与不平衡的特征。源于特有的社会经济结构的灵活调整能力，美国经济金融可能很快进入正常轨道，而欧元区及日本仍然在目前的状态下前行，并且可能是旧病未出除，新病增加。新兴市场经济体中，依据已有经济增长动能，中国经济将维持中高速增长，在全球经济金融格局中地位上升，当然，这种远景依赖于结构性改革的推进深度和金融体系的稳定状况。印度及其他少数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也可能有突出表现。但多数经济体经济增长轨迹的方向仍旧依据大国经济的状况。在经济增长放缓及经济金融全球化受到阻力的背景下，全球贸易增速低于经济增速的状况很难有改观。

全球经济放缓未有明显改观、缺乏新需求市场和新投资领域的背景下，物价水平将保持低位，而以原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不会回到前期高位。全球实际利率下行的趋势在全球经济放缓及主要发达经济体极度宽松货币政策的背景下大幅回升的可能性较低。国际金融危机后政府采取的各种刺激政策的负面影响也将逐步显现，政府债务率上升及金融机构被掩盖的坏账、国际资本的无序流动和汇率的极大不稳定、全球吹起的资产泡沫及金融市场过度波动、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金融的脆弱性等都可能引起金融风险的爆发。在结构性改革进展缓慢，财政政策没有空间，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递减，而其累计的金融风险越来越大的时候，也可能以金融风险的方式强制修复全球各国政府、居民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

当然，正是在这艰难的社会经济调整期，社会结构性改革可能得以实施，新技术及组织方式可能

会出现，新市场和新领域得到开拓，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可能得以孕育，为未来全球经济的新一轮增长创造基础。

[参考文献]

[1]Ball, L. (2014). “ Long - term Damage from the Great Recession in OECD Countries ” [J].Europe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Economic Policies: Intervention, 11(2): 149 - 160.

[2] Borio Claudio, Leonardo Gambacorta and Boris Hofmann, “ The influence of monetary policy on bank profitability ” [DB].BIS Working Papers No 514 October 2015.

[3] Bech M and Malkhozov A, “ How have central banks implemented negative policy rates ” [DB].BIS Quarterly Review, March 2016.

[4] Carvalho, C., et al., “ Demographics and real interest rates: Inspecting the mechanism ” [DB].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 Working Paper 2016 - 05.<http://www.frbsf.org/economic-research/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wp2016-05.pdf>.

[5] Escaith ,H and S Miroudot(2015), “ world trade and income remain exposed to gravity ” [A]. in B Hoekman(ed) , The Global Trade Slowdown: A New Normal?, A VoxEU eBook, London:CEPR Press and EU.

[6] Fischer,Stanley,Monetary Policy, “ Financial Stability, and

the Zero Lower Bound ”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 Proceedings 2016, 106(5): 39 - 42.

[7] Gordon, R. (2012). “ Is U.S. Economic Growth Over? Faltering Innovation Confronts the Six Headwinds ” [DB].NBER Working Paper, No. 18315.

[8] Gordon, R. (2014). “ The Demise of U.S. Economic Growth: Restatement, Rebuttal, and Reactions. ” [DB]. NBER Working Paper, No. 19895.

[9]Jackson Harriet , “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with Negative Policy Rates ” [DB].Staff Discussion Paper/Document d ' analyse du personnel,2015 - 13.

[10] Hall, R. (2014). “ Quantifying the Lasting Harm to the U.S. Economy from the Financial Crisis ” [DB].NBER Working Paper, No. 20183.

[11] Heider, Florian and Saidi, Farzad and Schepens, Glenn, “ Life Below Zero: Negative Policy Rates and Bank Risk Taking ” [DB].June 23, 2016,Available at SSRN: <http://ssrn.com/abstract=2788204>.

[12] IMF, “ Uncertainty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U.K. Referendum ” [DB]. WEO Update, July 2016.

[13] Koo, R. (2014). “ Balance Sheet Recession Is the Reason for Secular Stagnation ” [A].In “ Secular Stagnation: Facts, Causes and Cures ” , edited by Coen Teulings and Richard Baldwin, 131 - 142.

[14] Zhu Feng(2016), “ Understanding the changing equilibrium real interest rates in Asia - Pacific ” [DB]. BIS Working Papers No 567.

World Economic and Financial Outlook in the Next Five Years

Wen Xinxiang,Zhang Huaiqing

(Research Bureau of the People ' s Bank of China , Beijing 100800)

Abstract: The global economy and finance can be expected to continue to adjust in the next five years. The low global trade growth will not change, Advanced economies will still suffer deflation, and real interest rates will be low. Higher leverage ,bad loans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e disorder of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 the excessive volatility in financial markets, asset bubble, etc may cause the financial crisis, emerging economies have a high probability of financial crisis.

Key words: economic slowdown deflation financial crisis

(收稿日期：2016 - 09 - 14 责任编辑：廖令鹏)

【本期论题】

世界能源格局走势分析

林卫斌，陈丽娜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北京 100875）

[摘要] 世界能源格局走势的初步判断为：新兴市场国家将带动能源需求持续增长，预计未来20年世界能源消费年均增长1.4%左右；全球范围内应对气候变化和大气污染防治将深度改变未来能源结构，预计未来20年清洁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提高10个百分点以上；未来能源供应在地域上更趋多极化，能源生产西移，在能源品种上更趋多元化；能源贸易重心从大西洋盆地向亚太地区转移；能源价格将逐步走出低迷状态，缓慢回升。

[关键词] 能源需求 能源结构 能源供应 能源价格

[中图分类号] F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 (2016) 05-0013-04

[作者简介] 林卫斌（1981—），福建安溪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能源与产业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研究方向：能源经济和产业经济；陈丽娜，女，江苏兴化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研究方向：能源经济。

近年来，全球能源供过于求，能源价格持续低迷，未来能源供需形势将可能会发生什么变化？能源结构将如何深度调整？研究判断未来能源市场的供求状况、能源价格走势、能源结构变化等问题，对各国制定能源发展战略及应对能源安全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兴市场经济体带动能源需求持续增长

从2012年开始，世界能源需求呈现疲软态势，增速逐步放缓，2012、2013、2014和2015年世界一次能源消费增速分别为1.4%、2.0%、1.1%和1.0%，显著低于之前10年2.7%的年均增速。但是亚洲、南美洲和非洲等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将不断推进，人口规模持续扩大，未来将成为全球能源需求增长的主要驱动

力。从BP、IEA等权威能源机构的预测来看，尽管因为统计口径及电力折一次能源方法不同导致对能源消费总量的判断存在差异，但趋势大体相同。到2035年，世界一次能源消费总量预计在249~280亿吨标准煤的范围内波动。其中，BP的预测最为保守，2035年世界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249亿吨标准煤，较2015年增加约61亿吨标准煤，累计增长34%，年均增长1.4%，增速与近几年相比较有小幅的提升。

分地区看传统的高能源消费地区，如北美、欧洲等，受经济和人口增长放缓、能源利用效率提高等因素的影响，未来的能源消费总量基本维持不变。而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将在未来的20年间贡献几乎全部的能源需求增长。在所有拉动未来能源需求增长的新兴经济体中，印度的表现最为突出。虽然印度2015年的一次能源消费量仅有10亿吨标准



数据来源：BP.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6.

图1 2005 ~ 2015年世界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及其增速
煤左右，占世界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不足6%，但与10年前相比，其消费量几乎翻了一倍，且这种增长趋势并没有减缓，近几年增速仍维持在5%~6%之间。另外，印度对世界能源需求增长的拉动作用已经初步显现出来。

表1 四大能源机构对世界一次能源需求的预测

能源机构	2035年世界一次能源消费总量预测值 (亿吨标准煤) :
英国石油公司 (BP)	249
国际能源署 (IEA)	267
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	280
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 (IEEJ)	250

数据来源：BP、IEA、EIA、IEEJ官网。

二、能源结构将发生显著变化

到目前为止，以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为代表的化石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主体地位仍不可撼动，但其内部结构却在不断发生变化。进入20世纪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费量持续增加，石油取代了煤炭成为最主要的能源。根据BP统计数据，石油占世界一次能源消费量的比重在1973年达到峰值（占比48.7%）后逐年降低，到2015年，石油占比为32.9%；天然气所占份额不断提升，由1965年的15.8%上升到2015年的23.9%，提高了约8个百分点；煤炭的占比在1999年降到最低点后（约25%），又出现小幅回升，近几年占比维持在30%左右；核能的占比在经历了短暂上升后又开始下滑，到2015年占比不到4.5%；可再生能源的

消费量在过去几十年间一直稳步增加（主要以水电为主），所占比重由1965年的5.6%上升到2015年的9.6%，提高了4个百分点。由此可见，迄今为止，石油仍然是最重要的能源。另外，化石能源内部此消彼长，它占世界一次能源消费量的比重一直维持在85%以上，核能以及可再生能源的占比依旧很小。

尽管短期内化石能源作为主导能源的地位不会改变，但是受全球气候变化、新技术的发展等因素的影响，未来能源结构将会发生显著变化。一方面，在可预见的未来，化石能源所占比重将不断下降，同时可再生能源的比重不断上升。另一方面，由于新技术的发展，天然气的开采成本越来越低，且作为一种相对清洁、低碳的燃料，天然气将取代煤炭成为第二大燃料。尽管不同机构的预测存在一定的差别，但只要各国采取一定的措施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未来能源结构变化的趋势大体相同。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显著降低，由当前的85%降低到占75%左右。其中，石油预计以年均0.9%的速度稳定增长，但它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却在不断下降，尽管如此，石油仍然是最重要的燃料；天然气预计以年均1.8%的速度增长，成为增长最快的化石能源，到2030年将取代煤炭成为第二大燃料。另外，非化石能源的比重迅速上升，尤其是可再生能源。

在全球能源结构逐步发生变化的同时，世界各个地区的能源结构也随之发生改变。未来受碳排放量制约，亚太地区的煤炭消费比重将会显著降低，同时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的比重将趋于上升。以中国为例，根据中国能源研究会预测，到2030年，煤炭消费占比大幅下降至49%，较2015年下降15个百分点；石油消费占比下降至17%，降幅不大；清洁能源合计（包括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占比达到34%，较2015年提高了16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与世界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

三、能源供应更趋多极化、多元化

随着页岩油、页岩气等非常规油气的兴起，能源供应日趋多极化、多元化。受益于页岩气革命，美国、加拿大、巴西和委内瑞拉等美洲国家丰富的油气资源得以开发利用，根据BP统计数据，在2015

年石油剩余可探明储量中，美洲（包括北美洲和南美洲）占到世界的33.4%，为中东剩余可探明储量的70.6%，美洲的石油（包括原油、页岩油、液化天然气等）供应由2005年的21.0百万桶/日增加到2015年的27.4百万桶/日，年均增加64万桶/日，增长潜力巨大。若美洲的石油供应继续以年均2.7%的速度增长下去，它将在2025年左右超过中东成为最大的石油供应区。同样得益于页岩气开发技术的突破，2009年美国以5840.0亿立方米的产量首次超过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并以4.7%的速度持续增长，2015年年产量已超过俄罗斯约2000亿立方米。

随着非常规油气的开发日趋成熟和壮大，美洲地区有望成为“第二个中东”。从发展速度看，美国尤其令人瞩目。美国很有可能在2020年以后成为石油的净出口国，而据BP的保守预测，美国也将在2030年成为石油的净出口国。以上表明，美国“能源独立”战略将成为可能。另外，更值得一提的是加拿大。加拿大可能成为新的能源超级大国，据IEA预测数据，到2030年加拿大的石油产量将达到30~60百万桶/日。美洲能源的高地崛起，进一步加强了能源供应的多极化趋势。

从能源供应结构看，受碳排放政策日趋严格和能源新技术的快速发展的影响，天然气的供应进入黄金时代，可再生能源的地位持续上升，能源供应持续向更为高效、清洁的多元化方向发展。页岩气在总产量中的比重由2014年略大于10%上升到2035年接近25%，未来10年内几乎所有页岩气产出的增长都源于美国，而到2035年，中国将成为对页岩气产量增加贡献最大的国家，每日产量达到3.7亿立方米左右。天然气的供应由“分布式”取代了“集中式”，缓解了制约天然气发展的一大问题——远距离输送，未来天然气在能源供应中的地位还会不断提升。

可再生能源作为一种更加清洁的能源，在能源供应多元化发展中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尤其在发电领域。据IEA的预测，203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包括水力）将占全球发电量增长的一半，在全球发电总量中的占比将增加至31%，成为电力行业最主要的燃料。此外，欧盟将继续引领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但是到2035年，中国将成为可再生能源发电增幅最大的国家，超过欧盟和美国之和。综上所述，能源供应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是大势所趋。

四、能源贸易重心从大西洋盆地 向亚太地区转移

随着能源供需格局的改变，世界能源贸易重心将从大西洋盆地向亚太地区转移。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强劲的经济增长推动能源需求快速增长，世界能源贸易中心将转向亚太地区。当前，仅中国和印度的石油进口量就已经达到12.6百万桶/日，超过美国9.4百万桶/日的进口量，直逼欧洲的13.6百万桶/日。据IEA预测，到2035年，亚洲将成为全球石油贸易中心。

分地区来看，北美逐步向石油出口区转变，对外依存度不断降低。以美国为例，为扭转能源供应受制于中东的局面，美国一直致力于寻找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能源路径。美国天然气将实现自给自足并有富余的供应出口。在提升能源自给率的同时，美国还将加拿大、墨西哥等周边国家发展成稳定可靠的石油供应国，对地缘政治复杂、地区冲突不断的中东及非洲等地区的石油依赖明显降低。据BP统计数据，2015年美国从加拿大净进口石油量高达2.8百万桶/日，同年从中东地区的石油净进口量只有1.5百万桶/日左右，与2000年相比下降了一半左右。美国的石油自给及周边国家的供应已占到消费总量的80%以上，逐渐退出全球能源贸易的中心。

为满足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亚洲将成长为新的全球能源贸易中心，到2035年，亚洲占区域间净进口的比重接近80%，并且超过40%的一次能源需求将依赖于进口，基本贡献了全部新增能源贸易量。具体以中国来看，“十二五”期间中国石油进口量不断增加，由2010年的5.8百万桶/日增加至2015年的7.4百万桶/日，2030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68%左右。目前来看，中东地区仍是中国石油进口的最大供给方，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比重一直保持在50%左右。其中，沙特阿拉伯曾是中国第一大原油供应国，但是从2014年10月开始，中国就逐渐减少对沙特阿拉伯原油的进口量，转而大幅增加对俄罗斯的石油进口。

五、能源价格将逐步回升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数据，

石油价格在2016年达到34.8美元/桶^①历史新低后，开始出现小幅上升，2020年石油价格将达到49.4美元/桶，年均上升9.2%；天然气价格由2016年的2.1美元/百万英热单位上升至2020年的2.7美元/百万英热单位，年均上升7.2%；截至2020年，煤炭价格的上升趋势还未显现出来。以石油为例，这一期间价格回升的根本原因还是供求状况的改变。从需求层面看，受印度、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拉动，全球石油需求稳步增加，非OECD地区将贡献全球石油需求增量的大部分；从供给层面看，OPEC地区将贡献全球石油供应增量的多数，但其增幅将有所趋缓，同时由于低油价致美国、欧洲、拉丁美洲、中国等相对高成本产油区产量下滑，加拿大森林大火、尼日利亚武装冲突等偶然事件致该地区石油供应削减，全球石油市场过剩局面逐步缓和，国际油价较年初低位逐步回升。

2020年以后，尽管日趋严格的碳排放政策增加了清洁能源对石油的替代，减少了对石油的需求，但受全球人口增长及新兴市场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持续推进支撑，全球石油需求仍将保持增长，不过增幅逐渐放缓。为满足全球增加的石油需求，石油领域也将新增大量投资。同时，随着石油开采区域逐渐向高成本区域转移，石油边际开采成本将逐步上升。因此，综合预计国际油价将保持上升趋势，但平均回升速度较2016~2020年有所放缓，据

IEA预测，在这之后的10几年里，Brent原油期货年均价格或升至80~120美元/桶。

总体来看，北美“页岩气革命”、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全球气候变化和新能源突破发展等因素促使世界能源格局发生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可以总结为以下五点：尽管当前能源需求疲软，快速发展的新兴市场国家将带动能源需求持续增长；未来天然气将取代煤炭成为第二大燃料，可再生能源的比重迅速上升；随着页岩油、页岩气等非常规油气的兴起，能源供应更趋多极化、多元化；能源贸易重心从大西洋盆地向亚太地区转移；未来全球能源供需趋于平衡，能源价格将缓步上升。

[参考文献]

- [1] 杨松梅,王婕.全球能源格局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J].国际金融,2014,03:44-51.
- [2] 李晓西,林卫斌等.“五指合拳”应对世界新变化的中国能源战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3] 张萌,余家豪,杨睿.2015年全球能源格局新变[N].第一财经日报,2015-01-27A13.
- [4] BP世界能源展望2016[R].北京:BP,2016.
- [5] 国能源研究会.中国能源展望2030[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6.4.

^① 该处IMF对2016年石油价格的估计偏低，主要原因在于这一数据是在2016年4月份统计的，而2016年第一季度的石油价格达到近10年的最低点，但最近几个月又有所缓和。

Analysis of Trends of Global Energy Pattern

Lin Weibin, Chen Lina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ses the future trends of global energy situation through energy demand, energy structure, energy supply, energy trading and energy prices. Combining factors which affect the trends of global energy situation with forecast results from related institutions, the paper makes following preliminary judges: (1)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 will continue to drive growth in energy demand and the annual growth rate of world energy consumption is expected to reach around 1.4% over the next 20 years; (2)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air pollution prevention will lead to deeply change in future energy structure and the proportion of clean energy in primary energy consumption will increase by 10 percentage points or more over the next 20 years; (3) future energy supply in the region will become more multipolar with energy production shifted westward, meanwhile energy breed will become more diversified; (4) center of energy trading will shift from regions of the Atlantic basin to the Asia-Pacific; (5) energy prices will gradually go out of recession and start to rise slowly.

Key words: energy demand; energy structure; energy supply; energy prices

(收稿日期：2016-09-12 责任编辑：垠喜)

【本期论题】

美国金融改革思潮的重大转变

杨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北京 100732)

[摘要] 2016年7月美国的金融改革思潮剧变, 民主党、共和党的大选纲领都提出新的金融改革主张, 将恢复罗斯福遏制金融资本贪婪的监管法规作为改革方向。中国应高度关注这一动向, 美国今后推出的金融改革, 很可能同美国施压中国推行金融自由化截然相反。

[关键词] 金融改革 泡沫经济 罗斯福新政 美国大选

[中图分类号] F8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 (2016) 05-0017-04

[作者简介] 杨斌(1957—), 北京生人, 20世纪80年代留学日本、美国,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研究方向: 政治经济学、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一

2016年7月美国的金融改革思潮骤然发生变化, 民主党、共和党的大选纲领都提出新的金融改革主张, 将恢复罗斯福遏制金融资本贪婪的监管法规作为改革方向。中国应高度关注这一动向, 因为美国今后推出的金融改革, 很可能同美国施压中国推行金融自由化截然相反。当年日本、东南亚听从美国改革建议后纷纷爆发金融危机, 美国却由于罗斯福的金融监管法规存在而安然无恙。美国财团控制的主流媒体正竭力淡化新改革思潮的重要意义, 这意味着中国应警惕今后美国可能“己所不欲、偏施于人”。

罗斯福时代和美欧社会改良时期出现长期平稳经济增长, 归功于有效遏制了投机的金融监管三大成功经验: 一是制定格拉斯—斯蒂格尔监管法案, 禁止国内投机资本借贷加杠杆扩大交易规模, 禁止

央行、商业银行信贷直接、间接流向各种投机, 只允许证券公司从事中介业务而禁止自营投机炒作, 实行严格的金融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模式; 二是实行资本账户管制并禁止国内外投机资本跨境流动, 允许实体经济领域的贸易、投资全球化, 禁止虚拟经济领域中各种投机交易的全球化; 三是禁止金融衍生品交易以防范系统性风险, 仅仅保留少数利大于弊的大宗商品期货交易, 严格限制其投机规模不超过相关产品的避险需求, 禁止期货交易超过避险需求变成赌博扩大风险。

恢复罗斯福实行的金融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成功模式, 这是美欧长期实践证明唯一能够有效防止金融危机的成功改革, 1999年美国废除这一成功改革后短短数年就导致了大萧条阴影回归。

二

马克思、列宁曾预见资本主义将出现虚拟金融

化的趋势，谋利贪婪可能促使其演变为最纯粹、最巨大的欺诈制度，这意味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框架，为我们与时俱进探索金融资本主义规律奠定了理论基础，可借此深入研究今日美欧的金融赌场化、投机化和泡沫化，研究金融资本利用泡沫现象对实体经济的新型剥削，以及掠夺全球民众财富的新型阶级博弈和金融战争博弈。今日美国1%超级富豪与99%广大民众的尖锐阶级矛盾，包含着对实业领域富豪、白领工薪阶层和工人的掠夺，远远超过了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家与工人的对立。

马克思认为价值规律有调节社会化大生产的作用，价格受供求状况影响围绕价值波动并调节资源配置。当市场出现供求缺口时价格就会出现背离价值的波动，市场供不应求时价格出现高于价值的波动，市场供过于求时价格出现低于价值的波动。当供求缺口不大时价值规律能自发恢复供求平衡，但当市场供求缺口过大导致价格远远背离价值时，价值规律就会出现功能失灵并难以恢复市场供求平衡。当市场出现供给远远大于需求的过大缺口时，价格就会出现远远低于价值的大幅度波动，生产者为了生存不会减少供给反而会扩大供给，这样才能在价格暴跌时获得维持生存所需的收入，预期收入效应促使价格暴跌反而扩大供给维持收入稳定，现实例证如当前国际油价暴跌引发的全球经济疲软。

当市场出现供给远远小于需求的过大缺口时，价格就会出现远远高于价值的大幅度波动，价格暴涨就会吸引投机资本为获暴利纷纷涌入，预期收入效应促使价格暴涨时需求数量反而增加，扩大供不应求缺口并导致价格进一步暴涨，就会出现市场价格远远超过价值的泡沫现象，投机资本获利撤出就能轻轻松松掠夺走大量价值，促使泡沫破灭和价格暴跌至远远低于价值处徘徊。泡沫膨胀过程中容易出现投机操纵化的倾向，操纵价格的能力能够带来暴利反之则意味着巨大风险，意味着拥有巨大资本和融资能力的投机者占有市场优势，意味着投机泡沫可以被改造成掠夺价值财富的武器。从新市场失灵理论可以看出无论资产泡沫多么诱人，泡沫破灭并造成巨大损失是唯一的最终结果，而且泡沫越大、吸引资本流入越多造成财富损失就越大，资本跨国自由流动只能加剧市场失灵和泡沫损失，资本市场全球化的结果只能是投机全球化、泡沫全球

化。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不同于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第三产业如科研、教育、医疗等，虚拟金融投机不仅不创造价值还会掠夺实体经济创造的价值，不仅没有社会积极意义还造成了经济资源的极大浪费，西方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大萧条促使资源浪费空前扩大，意味着为维护社会利益必须区分金融投机和实体经济，必须彻底改革金融混业经营和监管缺失的失败模式，罗斯福执政后提出了“不能容忍资本贪婪损害社会利益”口号，制定一系列法规实行严格的金融分业监管和分业经营模式，这才是矫正新市场失灵并促使市场更好发挥作用的真正金融改革，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市场失灵理论可清楚揭示这一点。

2008年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超过美国十倍以上，从实体经济领域和综合国力来看两国的增速差别就更显著。倘若不认识美国的经济复苏舆论是虚假的，效仿美联储滥发货币刺激虚拟泡沫的宽松货币政策，听从美国建议实施金融自由化、泡沫化、赌场化，华尔街就能用金融赌场上赢得的虚拟筹码洗劫中国，中国就会面临刺激经济投资效果不断下降，虚拟泡沫濒临破灭不断需要巨资挽救的尴尬局面，经济增速就会不断下行并难以抵御美欧危机反复冲击。

美国主流舆论公开承认刺激政策仅仅具有“涓滴效应”，形象地体现了其无法惠及实体经济和民众的严重弊端，而实际上刺激虚拟泡沫还会吸走大量实体经济资源，这种抑制经济的“潮吸效应”远远大于“涓滴效应”，是危机以来美国制造业萎缩和真实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中国不应受美国虚假复苏舆论误导效仿刺激股市、楼市泡沫政策，否则会抵消刺激实体经济政策效果并导致投资效益下滑。发展服务业应该扶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科研、教育、医疗等，而不应以天量信贷支持不创造还掠夺价值的金融投机，特别是警惕运用凯恩斯主义刺激虚拟经济政策的危害，这样才能避免实体经济低迷造成严重的社会失业问题，才能避免投机借贷、加杠杆酿成股灾损失和资本市场动荡。

美国推行金融自由化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以后，美联储和商业银行的资金可以不受阻碍地流向金融投机，吸走实体经济的大量资源并催生了特大虚拟泡沫，形成了实体经济萎缩与虚拟泡沫破灭

共振的特大危机，促使华尔街操纵政府、美联储救市升级金融战争博弈，转向进一步掠夺纳税人资金和美联储的救市巨资。美国金融业盈利高居各个行业榜首而创造就业仅占5%，出现了“无就业或低就业增长”的不正常状态或新常态。金融超级富豪虽然从巨资救市中掠夺了巨大财富，但是，美国制造业和产值和就业却处于不断萎缩的状态，表明美国的经济复苏仅限于虚拟经济领域。美元除正常的交换媒介、国际货币功能之外，越来越多具有了不正常的金融赌博筹码的功能。

三

今天美国主要总统竞选人纷纷严厉批评美国金融模式，积极倡导恢复罗斯福时代卓有成效的真正金融改革。民主党高层领导机构通过投票表决一致决定，将恢复罗斯福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写入大选纲领，通常反对政府监管的美国共和党这次也主张恢复罗斯福改革，这是美国社会各界面对着大萧条阴影回归的奋力自救行动，中国应该敏锐察觉并高度重视美国金融改革思潮的风向骤变。

美欧实行并竭力向中国推荐的金融自由化模式，完全否定了罗斯福实施的真正金融改革的成功经验，抛弃了七十多年来避免大萧条灾难重现的金融政策法规，促使投机贪婪膨胀酿造特大资产泡沫方面有惊人效果，1999年美国国会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之后，银行杠杆资金流向投机领域催生了前所未有的泡沫膨胀，短短数年就爆发了网络泡沫、次贷危机等严重危机，让已经消失了半个多世纪的大萧条阴影回归，2008年危机后美联储耗费了天文数字的巨资反复救市，当前又再次濒临爆发特大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边缘，而且因反复救市耗尽宏观政策弹药面临着无药可救的困境。

当前美欧金融制度非但不是最发达、最完善的金融模式，相反是导致贫富分化、经济停滞、危机频发的灾难性模式。尽管中国金融模式尚且不完善却优越于美欧模式，正因如此，中国绝大多数民众的收入并未像美国比十五年前下降，中国经济虽然下行新创业企业数量却远远超过了破产企业，而没有像美国那样破产、关门企业数量远远超过了新创办企业，中国虽然尚未实行注册制但上市公司数量并未像美国出现大幅度萎缩，换言之，倘若中国金

融改革效仿美国将带来“社会改恶”而不是“社会改良”。

美国政府统计数据证实：99%的家庭的收入比十五年前显著减少，仅有1%的超级富豪的收入和财富获得大幅度增长。当前美欧社会的两级分化已经不局限于工人和资产阶级，而是扩大到少数金融富豪与大多数资本家之间的两极分化，2008年以来美国制造业产值出现了两位数下降，上市公司数量减少1/4，美国企业的死亡数量超过了新生企业，美国股市非但无法帮助实体经济的企业融资和发展，反而因借债回购炒作股票导致企业负债累累。这意味着实体经济领域的富豪纷纷陷入严重困境，私人创业动力正在随着中小企业纷纷破产而日渐消失。

正因如此，美国出现了反抗英国统治革命前夕的政治不稳定，民意调查表明民众对现行制度不满超过当年的三倍之多，大多数民众认为现行政治经济制度是为少数富豪服务的，美国实体经济领域传统富豪的财富正日渐消失，他们正效仿当年反抗英国重新组织茶党来发泄愤怒情绪。据称今日美国茶党的许多支持者曾经是拥有十亿美元的富豪，财富缩水的痛苦促使他们变成了激进反对现行体制的愤怒富豪，竟然也像“愤青”一样用激烈的言辞、行动发泄不满。

中国改革效仿当前美欧否定社会改良的新自由主义金融模式，非但不可能复制美欧二战后社会改良时期令人羡慕的经济繁荣，反而可能会重蹈美欧二战前的贫富分化、频繁经济危机甚至大萧条的覆辙。当前美欧推行的新自由主义金融自由化的破坏威力如此巨大，如此迅速将美欧模式复辟到了野蛮资本主义时代，如此迅速将当年美欧的繁荣景象变成了大危机的凋零破败乱象，中国应充分认识社会改良与新自由主义的美欧模式有着天壤之别，转向借鉴美欧社会改良时期真正金融改革的成功经验，这样才能避免效仿当前美欧金融模式必然带来的灾难性恶果。

四

美国据称是一个法治国家，强调“法无禁止皆可为”，鼓励个人自由奋斗、创业致富，私人资本进入限制少、门槛低，美国的注册制让私人企业无需审核就能上市。但是，为何近年来美国上市公司

数量不断萎缩，企业死亡数量达数万家，私人创办企业的动力和机遇正日渐消失？

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私人资本享有充分自由，虽然导致了贫富分化、假冒伪劣、环境污染等弊端，实体经济毕竟能创造财富并多少具有双赢色彩。美国进入金融资本主义后一切发生了变化，金融投机交易是纯粹零和游戏毫无双赢色彩，私人资本自由促使损害社会利益的金融创新泛滥，融资融券、股指期货、金融衍生品等，次贷债券、次贷违约避险合约、各种衍生避险工具等，都围绕着刺激投机泡沫和谋取暴利而被创新出来。美国注册制表面上给私人企业更多的上市自由，其实是给华尔街利用冒牌企业当作投机道具的自由，以及攻击上市公司的作弊证据获取做空暴利的自由。

罗斯福曾为克服大萧条进行了一系列真正的金融改革，金融资本谋取暴利冲动又促使这些改革被废除。金融资本的谋私自由终于剥夺了实业资本的谋私自由，促使社会各个阶层维护自身权益的自由受到损害。西方资本主义鼓励私人谋利自由的逻辑

正走向了反面，极少数超级富豪的谋私自由正在剥夺大多数人的谋私自由。

当前中国面临着经济下行和市场普遍疲软的困难，这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来自美国的经济金融危机冲击。有些人期望用给予私人资本更大自由来解决困难，给予私人资本更多的创业、解雇、金融创新自由，减少私人进入金融、自然垄断、公用事业的门槛限制，但是，当前世界已经不是昔日的西方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中国也受到美国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恶果的多方面影响，市场疲软导致了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断崖式暴跌。减薪裁员自由虽然能够暂时缓解部分私人企业的困难，广泛推行却会导致市场有效总需求更加萎缩，促使全体私人企业共同陷入更大的经营困境。私人资本尚且正不断减少盈利较高的制造业投资，更不愿意进入周期长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鼓励私人谋私自由很可能损害社会利益，倘若发现这种危害蔓延、扩散再来制定法律为时已晚。

Transition of the Thoughts on Financial Reform in the United States

Yang Bin

(Marx Institute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Abstract: In July 2016, the thoughts of finance reform changed drastically in the U.S.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all raised new proposals on financial reform in their election program. They intended to recover the regulatory laws of restricting greedy capital in the FDR times as reforming direction. China should pay high attention to this tre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nduct a series of follow-up financial reforms, which is likely to be opposite to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pattern (ps. The United States put pressure on China to promote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Key words: Financial reform, bubble economy, Roosevelt's new deal, United States Presidential Election

(收稿日期：2016-08-31 责任编辑：靳叶)

【本期论题】

日本在新工业革命中的作为及启示

陶涛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正在掀起新一轮工业革命浪潮。日本新工业革命战略——机器人革命, 有望成为日本重振制造业、拉动经济摆脱长期萧条的引擎。为此, 日本企业须尽快改变固化的纵向一体化企业组织方式、政府须尽快营造激励创新的宏观制度环境, 否则, 在未来的竞争中日本工业的技术优势将止步于制造, 企业在全部分工中只能沦为模块供应商。

[关键词] 新工业革命 模块化 全球化 结构改革

[中图分类号] F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 (2016) 05-0021-06

[作者简介] 陶涛(1969—), 女, 安徽巢湖人, 经济学博士,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和日本经济。

目前, 新工业革命的关键技术和应用, 是智能机器人、物联网和云计算平台。日本作为机器人产业大国和曾经雄霸全球的制造强国, 已经充分意识到“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对制造业结构的变革”这个大趋势, 并根据自身的技术和产业特点, 制定了“机器人战略”作为期推进新工业革命的国家战略。以智能机器人为核心的工业革新能否成为拉动日本经济的新引擎呢?

不同于现有文献多立足经济增长结构和制度结构的分析视角, 本文从生产和组织方式的视角考察日本产业的发展模式和竞争潜力, 结合全球化趋势以及日本国内结构性特征分析日本产业在新工业革命中的机会和挑战, 以及对我国促进制造业升级, 实现结构调整的启示。

一、新工业革命: 世界经济的新引擎

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宽带等技术

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并广泛应用, 正在迅速地改变知识和信息传播模式、消费和商业模式以及居民的生活方式, 并逐渐向工业领域渗透, 与之融合, 掀起了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浪潮。欧美发达国家纷纷制定新工业化发展战略, 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对工业制造业的深度改造与融合。

产业层面, 工业与新一轮信息技术相融合的创新层出不穷。一类是大型先进制造企业与IT企业合作, 通过硬件智能化、工业自动化及软件一体化构建智能工厂, 开发物联网解决方案。与此同时, 互联网企业也在向制造业渗透。一些互联网巨头纷纷开发可用于工业企业的云计算解决方案或平台, 如谷歌的GFW (Google for work) 系统为工业企业提供成套的接入互联网服务, 亚马逊的AWS (Amazon web service) 系统向企业提供云计算等IT基础设施服务, 微软的Azure云平台和Windows 10物联网版通过终端与云端的互通互联实现了跨硬件的信息通用。其中一些互联网企业已进入工业领域。如微软与

KUKA公司联合研发物联网机器人。2012年底，谷歌收购7家机器人相关企业，其中包括日本创业企业SCHAFT，随后又并收购美国老牌机器人公司“波士顿动力”，高调进入机器人业务领域，推进工业机器人的产品化。另外，谷歌、苹果、IBM和Facebook等公司都投资开发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无论“工业互联网”、“工业4.0”概念，还是制造企业与IT企业多维度的融合创新，其实质都是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等新信息技术对制造业进行变革，推进工业生产的信息化和智能化，实现智能制造。目前来看，智能制造的关键技术和应用是智能机器人、物联网和云计算平台，美国、德国和日本在这些技术和应用上各有所长。

日本是制造强国，在1980年代，日本制造业的竞争力超过欧美居全球第一。即便进入21世纪，日本政府仍强调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坚信信息化离不开发达的制造业，鼓励新材料研制和新制造工艺开发。在新一轮工业革命的竞争中，制造技术以及机器人等优势产业无疑是日本的核心优势。

日本是工业机器人生产和消费大国，根据“机器人战略”报告，2012年日本机器人产值约为3400亿日元，占全球市场份额的50%，安装数量（存量）约30万台，占全球市场份额23%；机器人主要零部件产量占据90%以上的全球市场份额。但日本并非工业机器人的原创国。从1960年代起，日本企业陆续购买美国专利进行机器人生产，在生产中不断改善设计，提高产品质量。由于日本劳动力短缺严重，机械、汽车等新兴产业的大中小企业广泛存在多样化的机器人需求，激励电子电机、机械、运输和钢铁行业的企业纷纷投入机器人生产，基于各自技术优势展开激烈竞争，形成了多种机器人专业制造技术。旺盛的需求和激烈的供给竞争推动了日本机器人产业的蓬勃发展，从1960年代开始，日本逐渐成为机器人产业的引领者^①。日本发那科公司和安川电机公司是全球机器人产业的龙头企业。美国机器人产品主要满足太空和国防产业需求，生产者多为创新企业，因此美国机器人产品大多设计精密，功能复杂，编程复杂。日本的机器人产品主要满足工业制造需求，往往功能单纯、制造精湛。日本机器人产业发展虽然遥遥领先于美国，但是核心技术和软件编程都落后于美国。这与日本IT产业尤其是软件产业落后有关。

日本虽然在某些IT硬件制造上拥有技术优势，但IT技术和产业均落后于美国，迄今为止没有一家像IBM、Intel、微软、谷歌、亚马逊等世界一流的IT企业。日本的信息化和互联网技术及应用也相对落后。日本于2000年提出“e-Japan”构想，促进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相关技术研发。2004年提出“u-Japan”计划，促进互联网的全面使用。2009年又提出“i-Japan”计划，促进政府、医院和学校等公共部门信息化应用。通过上述战略促动，日本互联网设施和网速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商业互联网和人际互联网也发展迅速。但是企业的信息化水平不高。以企业的大数据利用来看，根据2013年日本电子产业信息协会对日美企业的调查，大数据已经用于整个公司和在多个部门中使用的企业占比美国分别是32.5%和40.2%，而日本是6.0%和12.5%；不了解大数据以及讨论过但没有应用的企业占比高达42.6%和28.2%，而美国只有2.1%和4.6%^②。由此可见，在新工业革命竞争中，日本在信息技术及应用上处于劣势。

鉴于上述优劣势，日本的新工业革命战略立足于机器人工业，制定了将机器人设计及生产技术与信息技术相融合，开发集合大数据、网络化和人工智能的智能机器人的产业升级和发展方向。但无论人工智能技术还是物联网、云计算都需要先进的IT及互联网技术支持。IT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是日本突破人工智能以及智能制造的软肋。

二、模块化设计是智能制造时代的核心产业竞争模式

自1950年代中期，日本制造业经过约20年快速发展，形成了全球第一的竞争力。但在冷战结束后的1990年代，随着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美国IT产业高度繁荣，将美国经济拉入低失业、低通货膨胀、高增长的新经济时代。日本经济非但未能分享IT技术革新的繁荣，反而陷入二战后前所未有的低谷。一种解释是，日本企业的生产与组织方式适用于大批量生产，不适应IT产业的演进结构。

（一）日本产业的竞争力在于纵向一体化优势

以上内容参见[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上）》，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01-214页。

日本经济省《2015年版ものづくり白书》，<http://www.meti.go.jp/report/whitepaper/mono/2015/index.html>。

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家电、机械和汽车等世界主要工业产业的生产延续了19世纪末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形成的大批量生产方式。大批量生产方式适用于标准化生产，不同规格零部件的尺寸精确，零部件连接方式固定，利用专业加工模具和机器可以规模化生产。

与大批量生产方式相应的企业组织形式通常是纵向一体化。机械产品多由众多功能相互配合的零部件彼此连接而成的，不同规格、不同功能的零部件组成不同性能的产品。对于零部件众多、功能复杂的产品，零部件之间的依赖性 or 协同性大，企业存在较强的资产专用性（威廉姆森，2002）。企业资产的专用性越强，对交易伙伴的依赖性越大，被交易伙伴的机会主义行为损害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一旦做出了专用性资产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就锁定了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为了降低被“锁定”带来的交易成本，企业往往把投入品生产和产品营销纳入经营范围，形成纵向一体化组织形式。纵向一体化虽然降低了与外部市场的交易成本，但是加大了要素投入成本和内部管理成本。所以在大批量生产方式与纵向一体化组织形式下，除了产品核心技术创新的竞争，降低生产和管理成本的竞争至关重要。

日本在家电、机械和汽车等产品上的竞争力正是来自于其生产和组织方式在降低成本上的优势。以丰田生产方式（JIT）为代表的日本制造业生产方式通过生产的自动化、零库存管理等措施形成精益生产，在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有效地降低了成本，使多品种小批量生产成为可能。

同样是大批量生产方式，日本企业因为精益生产方式和企业系列化组织结构实现了企业内部信息共享（青木昌彦，1999），形成了超越美国和德国相关产业的竞争优势。但是这种方式显然不适用IT产业的发展。

（二）模块化设计方式助推IT产业兴起与繁荣

IT行业实行的是设计模块化，将每一个复杂系统或产品按照功能分解为数个独立模块，通过设计标准化界面将各独立模块组合在一起。系统的设计者只负责设计系统架构和界面，不设计子系统。每一个模块都是单一功能的子系统，可以单独开发，可以用于不同系统。对众多模块进行多元化组合，可以开发出多样化的复杂系统或产品。因此基于模

块化设计的IT产品适合多品种定制生产。

在设计模块化生产方式下，作为系统规则的界面越标准化，各模块的独立性就越强，物理连接也越简单。另一方面，独立设计的模块的功能共享程度越高，用于不同复杂系统的可能性越大，就越有可能通过将模块的多元化组合开发出多样化的复杂系统。模块功能的独立性和连接的简单性从技术上降低了企业资产专用性。无论系统设计者还是模块供应商，每个企业的开发、设计和生产都不依赖于别的模块，不存在锁定效应，也就无需通过纵向一体化来降低交易成本。企业在充分掌握产品结构、系统创新以及各模块创新信息，甚至其它领域新技术和应用的基础上，通过标准共享和横向合作，在界面的标准化、模块的统合性以及模块的功能化和专业化等竞争中创造自己的竞争优势。

在竞争中，设计演进产生了新的产品、设计和任务结构，产业演进产生了新的企业、合同和产业结构^①。模块供应商频繁地开发试验、进入、退出和重组，模块化设计可能沿着各自的轨迹快速演进，新的系统可能是现有模块组合过程中偶然形成，模块供应商和模块交易市场可能彼此独立地迅速发展。模块化设计以及相应的任务结构又促进了金融、产权、劳动市场以及战略管理的演变。企业试验、进入、退出和重组的动态化促进了新金融合同、机构和市场的形成和演进，如伴随IT产业兴起而出现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PE投资等。企业间的横向合作以及争夺设计人员的竞争促进了产权制度和劳动合同的创新和制度变革。模块化结构还促进了企业内部模块化任务分工和员工淘汰赛机制的管理创新。

日本IT企业的发展沿袭了纵向一体化组织方式。一般认为这是日本IT产业的竞争力落后于美国以及日本1990年代后在全球竞争中落败的原因。当前美国居优势的IT技术与日本居优势的制造业相融合的工业革命是不是日本的机会，还要看新一轮工业革命的竞争模式以及20多年来日本企业结构调整的状况。

（三）新工业革命时代日本转换生产方式面临挑战

其实1990年代以来，过去依赖一体化设计体系

[美]鲍德温和克拉克著《设计规则——模块化的力量》，中信出版社2006，第372页。

的汽车等产业为了降低成本、适应个性化需求，也在加快创新，尝试向模块化设计转换。

以智能制造为特征的新工业革命刚刚兴起，产业融合正在演进，生产与组织方式尚未定型。不过可以看到的是，在信息技术、信息产品与工业生产融合的过程中，随着跨行业的合作和并购越来越普遍，企业的行业属性越来越模糊，产品或服务的设计与生产技术越来越跨领域，制造业的商业模式正在发生变革。（1）生产方式发生变革：利用数字化设计开发模型进行产品试制和性能测试、通过物联网和云计算平台同时实现制造现场和供应链优化等智能制造手段将大大提高制造效率，能够实现针对市场个性化需求的大规模定制生产。（2）产业的商业模式发生变革：系统或平台的计算能力、网络化程度、机器的智能化和功能分割程度成为行业竞争的关键，产品定价权可能从制造企业手中向软件提供商转移；（3）企业功能将发生变革：企业内部化优势被弱化，可能变身为以平台为中心的产业生态中的一个设计或生产单元。可见，智能制造时代的基本生产与组织方式依然是模块化。

在失去的20年间，日本企业系列化组织结构也经历了变革与调整。由于泡沫经济破灭使银行业陷于长期困境，企业对银行的依赖程度降低，融资方式趋于多元化，银行和企业相互持股的比例不断下降。大企业为了降低危机时期的雇佣压力，不断提高雇佣合同工的比例，企业内部培训也趋于减少。但是年功序列和终身雇佣制作为大企业的基本雇佣制度没有动摇。

总体来看，日本企业重视制造工艺、设计的一体化、稳定的交易关系以及企业长期增长等发展理念没有根本改变，企业生产、组织和竞争还沿袭旧模式。这种相对固化的生产和组织结构无疑是日本参与新工业革命的重要挑战，但不是唯一挑战。变化中的全球化趋势和日本国内结构性因素也带来新机遇和新挑战。

三、新工业革命时代：日本的机会与挑战

用生产与组织方式特征解释日本产业成败的视角往往容易忽略另一个关键要素，那就是全球化。日本制造的成功除了生产与组织优势外，冷战时期的全球化为日本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创造了外部条

件，而日本的宏观制度结构为其创造了内部环境。

（一）全球化的机会与挑战

二战结束后，政治上的冷战体制确立，科技革命和世界和平推动了西方世界经济蓬勃发展。美国从1950年代开始调整产业结构，集中发展集成电路、精密机械、精细化工、家用电器和汽车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转移出去。日本作为产业转移的承接国之一不仅获得了钢铁、纺织品等领域的庞大市场，更分享了科技革命的成果。

1970~1980年代日本制造业竞争力胜于欧美的前提是日本拥有与欧美相近的核心生产技术，否则日本企业将不得不长时间耗费巨资从事产品开发与创新。冷战时代日本作为西方世界的同盟国得以大量引进欧美国家先进技术，充分发挥后发优势，与欧美制造业几乎在同一水平上竞争。如1950年代自澳大利亚引进LD转炉技术，使炼钢技术与世界先进国家持平；从美国引进焊接法、分段船体建造法，建造出具有世界竞争力水平的船舶；日产汽车与英国奥斯汀公司进行技术协作，帮助日产实现所有零部件的国产化，丰田公司到福特公司进行现场观摩，学习到的生产和管理技术为日后的丰田生产方式奠定了基础^①。1970年代日本半导体产业发展也是从用美国的设计标准、美国制造的生产设备以及美国许可的技术开始的。

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发生了变化。首先，冷战终结为国际化扫除了政治壁垒，使全球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原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开启市场化改革，不同意识形态的两大阵营对垒不复存在，知识、信息、标准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全球越来越趋向统一的商业标准。其次，电信技术和产业的迅猛发展将全球领入互联时代，知识、信息及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和交换，商品和服务贸易也更加便利和快捷。第三，原社会主义国家及一些欠发达国家纷纷开启国际化，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不断改变了商品、零部件、要素以及服务的流向。1990年代欧美及日本、东亚四小龙通过外包将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劳动加工环节转移到中国及东盟四国，逐渐形成了基于产品内分工与贸易的全球化格局。随着最终产品贸易占比下降，发达国家普遍走向“去工

①[日]安场保吉和猪木武德编，《日本经济史（8）：高速增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第137-151页。

业化”，日本一体化产品的竞争优势减弱。最后，随着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不断融合入，商品和要素的全球化将被消费和任务的全球化取代。

日本在新一轮全球化中的机遇不再是技术引进和发达国家市场，而是横向合作与标准共享；日本面临的挑战不再是开发高质量的一体化产品，而是划时代的技术创新和集成创新。全球化趋势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要求日本企业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必需转换经营观念、调整竞争模式。

（二）国内结构性因素的挑战

宏观制度结构和人口结构是影响日本企业创新，同时也是阻碍日本经济走出长期萧条的两个重要结构性因素。

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对金融体系的保护、限制竞争的各种管制措施、鼓励技术和设备引进的外汇管制，促进目标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等政府管制所形成的宏观经济制度与结构对，日本企业技术进步和快速提高生产率起到了促进作用。随着日本技术水平接近世界技术前沿，鼓励模仿的制度结构需要转向激励创新的制度结构，否则会掉进非收敛陷阱（Acemoglu, Aghion和Zilibotti, 2006）。经过上世纪末年桥本政府以及本世纪初小泉政府的结构改革，基本消除了对银行的过度保护体制，对电信、公路运输、零售行等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价格管制等经济管制也在放宽，但是土地和公共设施建设、环境和安全、法律和保安类等社会管制却加强了。

另外，由于少子化与人均寿命延长，日本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结构问题越来越严重。根据日本人口研究所预测，2030年总人口将比2010年下降近9%，减少为1.16亿，其中劳动年龄人口减少17.1%，净减少1400万人，而老年人口将增加25.0%^①。人口结构问题导致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减少，同时社会保障支出不断增加，从而抑制了日本经济增长潜力，并对结构调整造成压力。为了带动经济长期增长，日本新工业化战略需要面对人口结构问题带来的挑战。

（三）新工业革命时代日本战略定位

为促进机器人革命，“机器人战略”提出了3个具体措施。第一个是打造全球机器人创新基地，旨在建立创新机制，解决日本产业创新性不足的问题。具体措施包括建造创新机制所需的系统和基础

设施，比如建立国内外合作系统，成立机器人实验示范区；培养信息技术专家、机器人系统集成商等人力资源；促进人工智能、传感和识别技术等跨领域前沿技术的研发，促进设立机器人全球标准。第二个战略是促进机器人广泛应用，将机器人的应用从大企业制造扩展到中小企业、农业、医疗保健和基础设施、防灾等人手短缺日趋严重的领域，同时更多地应用智能机器人，以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提高生产效率和社会效应。第三个战略是开发集合大数据、网络化和人工智能的智能机器人，打造世界一流的物联网。

新工业化战略充分考虑到了自身的产业特点，立足机器人这个日本优势产业，通过打造创新环境和培养专业人才，促进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实现工业机器人向智能机器人产业的升级。战略同时也确立了新工业革命的战略高度——在智能机器人和物联网领域居世界领先地位。针对日本在互联网技术与相关产业发展的短板，2015年10月机器人革命促进会下设物联网升级制造模式工作组，以产官学合作的方式推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开发与商业创新。目前，工作组会员已达1000家左右，包括三菱电机、日立制作所等工业控制设备厂商，富士通、NEC等IT企业，三菱重工、川崎重工、IHI、日立造船、丰田汽车、日产汽车、本田等工业企业。从第二项战略措施来看，机器人战略也是务实的，考虑到了全球化环境和国内制度结构造成的压力。不是一味地去打造新工业革命的主导产业，而是立足当下日本劳动力短缺、中小企业和农林等行业生产率低下的状况，推进机器人、尤其是智能机器人的运用，通过应用创造需求，带动创新。

机器人战略对新一轮工业革命的认识是到位的，战略措施与定位切实也有高度，机器人革命能否完成还取决于是政府的结构改革是否能营造出创新环境，以及企业能否迫于压力转换理念，逐步调整生产方式，充分利用全球化和新工业化的有利机会。

四、启示

毫无疑问，新一轮工业革命是日本重振制造

① 参见金京淑和马学礼，“人口老龄化困境中的‘安倍经济学’：兼评日本经济增长的前景”，《现代日本经济》2015年第3期。

业，拉动经济增长，摆脱长期萧条的契机。生产与组织方式、全球化特征、宏观制度结构及人口结构是决定日本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性因素，也是日本经济能够摆脱长期萧条的决定性因素。

成熟的机器人产业、精湛的制造工艺、先进的IT硬件技术、善于管理创新的经营优势以及互通互联的全球性信息与交易网络都是日本参与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机会。欧美国家的积极行动、新兴国家对全球化市场的割取、国内长期的经济萧条压力要求日本政府营造创新环境、企业转换经营理念和调整商业模式，否则日本产业的优势将止步于制造，企业的未来将限于专业化模块供应商，就像它们目前在飞机制造业和IT产业中的地位。机器人革命不能成为一个引擎拉动日本制造业、乃至日本经济走出困境，取决于企业固化的组织方式、抑制创新的宏观制度环境等羁绊能不能尽快消除。

短期来看，信息化建设以及以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为核心的机器人开发、生产和应用可能形成投资热潮，拉动经济扩张。较长期内，智能机器人的广泛应用将提高各行业生产率，促进有效供给。

同样，新一轮工业革命也是中国调整产业结构、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契机。我国相应的新工业革命战略“中国制造2025”的核心就是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相融合的新型工业化，即通过信息化促进制造业升级、实现结构调整。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在制造规模、能力以及配套供应上具有优势，但机械、汽车等制造技术水平不敌日本。作为新兴经济大国，我国拥有发展迅速的IT产业和互联网应用，

以及庞大的且继续扩张的日益个性化的消费需求，由此带来电子商务和社交网络等新商业形式爆炸式扩张，激励了互联网相关技术、终端产品集成、生产组织方式、商业模式以及金融组织不断创新。模仿、创新以及上升期的巨型市场是中国参与新一轮工业革命竞争的优势。放松对资源流动的限制、构建创新性科技研发机制以及相应的产业扶持政策是我国加强竞争优势的必要举措。

[参考文献]

[1]Acemoglu, Aghion and Zilibotti, Distance to Frontier, Sele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J].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March 2006 4(1):37-74.

[2]Baldwin, C.Y. and Clark, K.B, Managing in An Age of Modularity[J].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7, (Sep. - Oct.):84-93.

[3][日]安场保吉和猪木武德编.日本经济史(8):高速增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4][美]鲍德温和克拉克.设计规则——模块化的力量[M].张传良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

[5]金京淑和马学礼,人口老龄化困境中的‘安倍经济学’:兼评日本经济增长的前景[J].现代日本经济2015(3):83-94.

[6][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上)[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7][美]奥利弗·E.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8][日]青木昌彦和安藤晴彦.模块时代:新产业结构的本质[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

[9][日]青木昌彦和奥野正宽.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10]任云,“失去的20年”与“安倍经济学”增长战略[J].国际经济评论,2014(4):122-141.

The Contribu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Japan in 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Tao Tao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reates a new wave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 Robot Technology, Japan's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strategy, is expected to become an engine of revitalizing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pulling the economy out of a prolonged recession. To implement the strategy, Japanese enterprises will have to abandon their rigid vertical integration production structure; Japanese government must quickly adapt its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to nourish enterprises innovation. Otherwise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Japanese industry will be confined within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Consequently enterprises will become module suppliers only in the near future competitions.

Key words: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modularity, globalization, structural reform

(收稿日期:2016-09-12 责任编辑:廖令鹏)

【本期论题】

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策略

熊爱宗, 张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 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策略, 从国内层面看, 应继续营造良好的国内外政治、外交、经济、社会关系, 保持中国经济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为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夯实国内基础; 从国际层面看, 应积极联合各种力量采取共同行动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改革, 注意改革方案对相关利益主体的影响, 降低守成大国的改革阻力, 同时应积极利用20国集团等现有的多边治理平台, 积极推动全球金融治理的完善。

[关键词] 全球金融治理 SWOT分析 应对策略

[中图分类号] F8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6)05-0027-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变化与我国应对战略研究”(14ZDA081)。

[作者简介] 熊爱宗(1982—), 河北河间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室, 助理研究员, 经济学博士, 研究方向: 全球经济治理、国际金融; 张斌(1975—), 河南许昌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室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 经济学博士, 研究方向: 全球宏观经济、中国经济。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 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发生了巨大改变。原有的治理机制被证明不但未能克服金融体系运转中所产生的风险, 甚至本身的制度设计缺陷也成为风险爆发的原因之一。国际社会已意识到必须对现行的国际金融治理机制进行改革。

一、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目标与原则

(一) 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总体目标

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内容, 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思路与全球经济治理是一致的。根据国际经济发展环境以及我国经济情况, 现阶段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总体目标应为: 积极推动旧有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改革和完善, 加快建立公平、公

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金融新秩序。新的全球金融治理机制应该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公平性和有效性。代表性, 是指无论国家经济实力大小, 都能参与到全球金融治理中来, 应该建有能够反映各国利益诉求并为之实现以及解决各国利益冲突的渠道与机制。公平性, 既包括过程的公平性也包括结果的公平性, 应确保各国在全球金融事务处理过程中都能平等参与, 并确保最终结果被各国接受。有效性, 包括决策的有效性和政策效果的有效性, 提高全球金融治理的效率, 加强全球金融治理解决全球金融问题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二) 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基本立足点在国内

我们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 就是服从服务于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①。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目的更是如此。

第一，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机制建设，使中国的声音和诉求正当合理反映到全球金融规则制定中，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金融环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有关。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在这种情况下，唯有积极主动参与全球金融规则的制定与改革，合理利用规则，趋利避害，为我国经济发展建立有利的国际金融规则和机制安排。

第二，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水平，以对外开放促进国内改革。为配合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必须相应地进行国内政策的调整。如应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积极推动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推动人民币成为可兑换、可自由使用货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以开放促改革的“倒逼”机制，应该是一种有管理的“开放倒逼”，这需要中国积极主动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建立公平有序、松紧有度的开放环境。

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对于全球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在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过程中，应阐释我国的立场和意见，努力推动确保各项改革倡议和相关国际标准符合我国利益，在解决国际金融体系中存在的系统性、根源性问题的同时，积极维护国内金融稳定，并充分发挥金融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三）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应坚持发展中大国的定位

在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过程中，应坚持我国发展中大国的定位。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应把维护我国利益同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既要看到我国发展对世界的要求，同时也要看到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我国的期待。因此，应积极推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反映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化，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并保护最不发达国家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发言权。

另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大国应合理承担国际责任，体现负责任大国形象。随着经济实力的上升，

中国应逐渐承担起合理的国际责任，这也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体现。积极承担合理国际责任有助于我国逐步积累全球经济治理经验，提升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软实力”，同时也有利于缓解其他国家对我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疑虑，获得其他国家的认同。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权利和义务相平衡原则，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应根据自己的实力大小来确定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程度，例如中国为满足国际经济与金融稳定发展提供公共品，积极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倡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出资设立丝路基金、签署协议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为完善全球金融治理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另一方面中国在承担更大全球金融治理责任过程中，也要积极争取相匹配的权利。

（四）完善全球金融治理不是推倒重来

当前的全球金融治理机制虽然存在诸多缺陷，但是改革应以增量推进为主，尽量避免“大破大立”式推进。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受益者^②，现行的国际分工格局、国际贸易格局、国际投资格局等总体上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在我国全球经济治理理论和实践准备尚不充足的情况下，大幅贸然推进相关领域改革，不但会导致世界经济秩序的紊乱，同时也会造成我国经济利益受损。因此，中国应该是现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维护者和修复者，改革应以“帕累托式”循序渐进，这既有利于现有经济治理机制的传承发展，同时又可以降低各方的改革阻力。

在此基础上，中国对当前全球金融治理机制改革的诉求不应谋求挑战美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主导地位。从目前来看，无论是从经济总量的“硬”实力来看，还是从全球金融治理理念与实践的“软”实力来看，中国仍同美国存在较大的差距。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全球经济治理影响力的提升是在美国主导的体系之内实现的（何帆等，2013），如果盲目追求领导地位，反而会导致美国在现有体系下的极力回应与打压。由于目前我国全球经济治理的立足点主要在国内，因此争夺领导权

习近平：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3/c_1116812159.htm，2015年10月13日。

李克强：跨越喜马拉雅山的握手，央视网，<http://news.cntv.cn/2013/05/20/ART11369035296705203.shtml>，2013年5月20日。

既不现实，也无必要。

二、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SWOT分析

为准确评估中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角色与地位，我们应用SWOT方法来分析影响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各种因素，我们希望通过各种因素分析，综合出中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优势与劣势、机会与威胁，为未来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提供分析思路。

1. 优势。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最大优势，来自于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快速成长，以及在此基础上中国金融实力的不断上升，这成为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基础。截至2015年底，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金融资产规模接近200万亿元，这相比2004年的31.6万亿元增长了6倍多。据预计，我国金融资产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未来五年可能会达到400万亿元。

表1 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单位：10亿美元）

	2005	2007	2009	2011	2013	2015
资产	1223.3	2416.2	3436.9	4734.5	5986.1	6218.9
储备资产	825.7	1547.3	2453.2	3255.8	3880.4	3406.1
负债	815.6	1228.1	1946.4	3046.1	3990.1	4622.5
净头寸	407.7	1188.1	1490.5	1688.4	1996.0	1596.5

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

我国金融实力上升另外一个最为重要的指标是外汇储备迅速累积，在2014年年底接近4万亿美元，在2015年才稍微出现回落态势。尽管有学者批评中国的净债权国地位“质量”还不高，但是这却为中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中更加有所作为提供了真实的基础。

2. 劣势。近几年，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加速推进，但改革仍未根本完成。从利率市场化改革来看，我国从1996年开始启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先后放开了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利率、境内外币存贷款利率以及人民币贷款利率。至2015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对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不再设置存款利率浮动上限，这标志着利率管制基本放开，中国的市场利率化基本完成。但后续仍还有很多任务^①。汇率市场化改革也是如此。2015年8月11日，央行宣布完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出发点是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触及了

汇率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政府向市场转让汇率定价权的重要举措。但是，我们发现现在又恢复了过去的汇率维稳政策。这表明我们的汇率市场化改革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与此同时，我国的金融环境仍有待完善。有些亟需的法律法规尚未建立，法律法规之间还存在抵触和矛盾，现有的法律法规没有充分体现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有些法律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法律法规的执行有待加强。社会信用体系不完善，特别是企业信用意识仍然淡漠、社会信用风险评价体系不够健全、国家信用建设管理体系滞后，金融业的发展面临社会环境风险。同时，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体系的监督与管理水平还不高，金融监管需要不断加强。

3. 机会。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也纷纷通过各种努力来改善全球金融治理，例如在全球层面推动基金组织达成2010年份额和投票权改革，积极提升特别提款权的作用等，在区域层面，如金砖国家推动建立应急储备库、新发展银行等，倒逼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等。与此同时，基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金融治理理念开始发生动摇。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全球金融治理理念不断发生变化，但是基本延续自由主义的脉络。然而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国际社会开始对新自由主义开始反思。考虑到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来自基金组织内部，这标志着国际社会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

4. 威胁。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最大的威胁主要来自于美国。美国是二战后国际金融秩序的主要建立者，也是主要的获益者，因此，任何的改革建议都必然会遭到美国政府的反对。中国试图推动新建国际金融机构以倒逼全球金融治理完善的努力也遭到美国的抵制，这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例子中可以看出。

三、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应对策略

我们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上提出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策略。

（一）国内层面

1. 继续营造良好的国内外政治、外交、经济、

周小川：利率市场化已经基本完成，中国经济网，2016年3月20日。http://www.ce.cn/cysc/newmain/yc/jsxw/201603/20/t20160320_9639644.shtml

社会关系，保持中国经济健康稳定持续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这几乎是中国所有优势的基础。要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发挥作用，必须建立坚实的经济基础。应积极营造良好的国内外关系，对内应继续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战略，更好地平衡工业与服务业、资本积累与城镇就业和生产率增长的关系。对外则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与国际环境，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积极发展同亚洲近邻国家的关系，促进亚洲地区的发展与繁荣。积极展开对话与合作，本着互谅互让、公平合理的原则，积极妥善地处理同亚洲国家的各种争议，维护亚洲地区的稳定；同时，继续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并稳定与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

2. 继续推进以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为主要内容的金融体制改革

未来至少有两个方面应进一步推进：第一，进一步完善引导市场定价的基准利率参考体系，包括短期货币市场政策利率和中长期国债收益率，从而形成完整、平滑的收益率曲线。目前这条曲线仍然存在很多缺陷，例如国债的期限分布不均匀等。第二，完善利率传导机制，打通货币市场、信贷市场、资本市场之间的关系，促进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在当前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央行应该继续参考一篮子汇率，退出常规性外汇市场干预。同时实施资本管制措施，避免跨境资本流动造成汇率过度波动。积极做好危机预案，加强同时市场的沟通，引导市场预期。

积极发展金融市场，完善金融体系。要进一步发展资本市场，培育多元化市场投资主体，提高直接融资比例，促进国有企业的资产证券化；进一步改革、发展和建立统一、灵活、高效、大容量的货币市场；促进债券市场扩大发行主体与债券品种，加强债券评级、担保、清算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国债市场。此外，要加强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自身建设，积极推进商业银行现代化建设，努力与国际惯例接轨，完善商业银行管理机制，增强抗风险能力。在政府层面上，要继续加强和完善政府金融监管体系，进一步完善中国人民银

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监督制度与法律框架，保持监督机构的独立性，树立监督机构的权威性，提高监督水平。

（二）国际层面

1. 联合各种力量集体行动

这方面较为成功的经验是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一道共同推进全球金融治理的完善。经过多年的发展，金砖国家已成为推动国际金融合作、重塑国际金融秩序的新生力量。例如，金砖国家一直主张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以更好地反映新兴经济体的重要性。同时，中国还与其他国家一道通过建立新的机制和机构，以切实行动倒逼全球金融治理完善。

通过与其他国家进行联合，有利于将具有共同利益导向的国家联合起来，进一步壮大推动和完善全球金融治理的力量，在此中间，中国可以通过引导、推动，或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或充当“主心骨”的角色，借力使力。同时，联合其他国家，也有利于降低中国在推动全球金融治理过程中所承担的压力与责任。

2. 避免与守成大国展开直接对抗

历史经验表明，改革方案不能过激，否则必然会招致守成大国的强烈反对。例如，东亚货币合作中，较为激进的方案——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就造成美国的强烈反对，而较为温和的方案如清迈倡议（CMI）则较为顺利。CMI货币互换下的资金安排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贷款条件相挂钩，这一切保证了CMI的顺利进行。东盟10+3财长反复强调，CMI的核心目标是为地区的短期流动性困难提供支持，CMI是现有国际金融安排的补充而不是替代。因此，中国在推进全球金融治理的过程中，也应该吸收亚洲货币合作的经验教训，既要维护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利益，同时应尽量避免与守成大国产生直接的冲突。

3. 通过多边平台推动完善全球金融治理

中国应积极通过参与多边国际合作平台，特别是在20国集团（G20）等平台中发挥更大作用，以此来推动完善全球金融治理。

20国集团首脑峰会为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提供了新的动力。在华盛顿首脑峰会上，20国集团强调，必须对布雷顿森林体系进行全面改革，使它们能够更充分地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新

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应在这些机构中具有更大的发言权和代表性。此后几届峰会，各国领导人都呼吁20国集团成员国批准2008年基金组织份额和发言权改革决议。在督促各国批准2008年改革方案的同时，20国集团开始考虑基金组织进一步的改革行动。在20国集团的直接推动下，基金组织达成了相比2008年方案更进一步的2010年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方案。虽然这一方案直到2015年才获得美国国会的批准，但是这一方案的达成，20国集团却功不可没。

2016年，作为20国集团轮值主席国，中国在推动全球金融治理完善上不断向前推进。担任主席国期间，中国恢复了G20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围绕扩大SDR的使用、增强全球金融安全网、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和治理改革、完善主权债重组机制和改进对资本流动的监测与管理五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形成《迈向更稳定、更有韧性的

国际金融架构的G20议程》^①，这显示出中国对于完善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视与期待。

[参考文献]

- [1] James M. Boughton and Colin I. Bradford, Jr. Global Governance: New Players, New Rules. IMF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December 2007, Volume 44, Number 4.
- [2] Jonathan D. Ostry, Prakash Loungani, and Davide Furceri. Neoliberalism: Oversold? Finance & Development, June 2016, Vol. 53, No. 2.
- [3] 何帆,冯维江,徐进.全球治理机制面临的挑战及中国的对策[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4).
- [4] 黄薇.G20主导下的全球经济治理与中国的期待[J].国际经济合作,2015(6).
- [5] 李培林.全面深化改革二十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09.
- [6] 鄢莉.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战略分析[J].价值工程,2015(2).

① 二十国集团完善国际金融架构的中国方案，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6-08/17/c_129237111.htm，2016年8月17日。

Proposals for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Xiong Aizong, Zhang bin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Beijing 100732)

Abstract: China has begun to play a more active role in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overall objectives and basic principles of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and identifies its strengths, weaknesses,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through SWOT analysis. On this basis, it gives some strategy recommendations for China to participate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from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From the domestic perspective, China should continue to maintain healthy and st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reinforce its foundation participating in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From th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China should actively take joint action, fully consider the impacts of the reform program on the relevant stakeholders, and use existing multilateral platform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Keywords: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SWOT analysis; China

(收稿日期：2016-08-29 责任编辑：垠喜)

【本期论题】

“十三五”外贸发展的战略方向

余淼杰，崔晓敏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北京 100871）

[摘要] “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既存在机遇又面临挑战。当前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基点是创新，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并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机结合。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依然是我国持续发展的主要方略，力争在产业结构调整、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提升、区域性自由贸易区建设和对外直接投资四个方向逐步突破。

[关键词] 创新 对内改革 对外开放

[中图分类号] F75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 (2016) 05-0032-05

[作者简介] 余淼杰（1976—），广东潮州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国际贸易和中国经济发展；崔晓敏（1991—），河南固始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贸易和中国经济。

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意义巨大。根据“十三五”规划，本文将“创新”作为“十三五”期间我国外贸发展战略的核心，并从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两个角度，产业结构调整、生产率和质量提升、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四个方向进行深入解析。讨论将回答三方面问题：如何通过进一步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提升我国的创新能力；我国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四个方向——“产业结构调整”、“生产率和质量提升”、“区域性自贸区建设”和“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创新对它们的影响；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存在怎样的内在联系。

一、以创新为基点

如何创新是我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问题。“十三五”规划表明未来我国将主要从“对内改

革”和“对外开放”以及宏观政策支持三个方面提升国内的创新能力。首先，“对内改革”是激发企业创新能力的基础。“对内改革”旨在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企业生产效率，促进产品质量提升。产业环境的改进和企业能力的提升为企业进行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只有处在技术前沿的高生产率企业才有通过研发创新谋取丰厚利润的动机。对于低生产率企业来说，它们可通过模仿学习前沿技术获利，因此其创新激励不足。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利于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激发企业的研发行为。

其次，“对外开放”为研发创新带来规模收益。随着贸易自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推出，我国的贸易市场和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逐步扩大。潜在市场规模的扩大有利于缩小企业进行研发的单位产出成本，进而鼓励企业的创新行为。国内

市场的开放一方面为我国企业带来了高质量、高技术的投入品，帮助企业从学习吸收国外新技术并创新；另一方面则加剧了企业间的竞争，激发企业为生存而竞争。

最后，创新行为的兴起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持。当前，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万众创新”和“科研创新”政策，并将在我国掀起工序和产品创新的浪潮。

二、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

“十三五”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从“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两个角度展开。对内改革行业资源配置方式，旨在将资源从产能过剩行业向新兴和高附加值行业转移，从一些低效的国有企业、“僵尸企业”向活力更高、盈利能力更强的中小企业转移，进而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和产品质量水平，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则是进一步增加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开放程度，加强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产业融合程度，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一些不具备成本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非洲和东南亚等地区转移，帮助我国逐步从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工厂向中高技术、资本密集型制造基地转移。本文从“产业结构调整”、“生产率和质量提升”、“区域性自贸区建设”和“对外直接投资”四个方向详解“十三五”期间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

（一）产业结构调整

2016~2020年，我国对内改革的重点在于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不仅影响各行业的产出能力，也关乎对外贸易模式的转变。“十三五”期间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主要集中在劳动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加工和一般贸易三个方面。

第一，劳动密集型行业将逐步缩小，资本密集型行业比重将提升。

劳动成本的上升促使一些企业开始将劳动密集型工序外包给非洲和东南亚等工资相对较低的国家。具体表现为我国对一些劳动丰富型国家的直接投资增加。国内企业在资本密集型行业的生产优势逐渐增加。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包行为使得部分劳动力得以流转到资本密集型行业。劳动投入的增加提高了这些行业资本的边际产出，而这又将吸

引更多的资本流入到资本密集型行业。我国在经济腾飞期间积累了大量的资本，这增加了我国在资本禀赋方面的比较优势。劳动成本的上升和巨额资本存量的支撑将促使我国的对外贸易模式逐步向资本密集型行业转变。

第二，制造业逐步升级，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

2015年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长期低于50（50以下表示恶化），尽管2016年有所提升，但仍然仅是在50附近徘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心中国将丧失其世界工厂的优势地位。但事实上，中国的制造业是在经历调整阵痛期，而并非逐渐消失。在这个过程中，低效、落后的企业将逐步被淘汰，资源逐步向高效高质的企业转移。制造业企业生产率两极分化现象也将增强。一方面依靠政府补贴存活的“僵尸企业”短期内仍然存在，另一方面一波具备国际影响力和创新能力的企业将迅速崛起，并在国际竞争中逐步胜出。

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并在吸收就业上发挥重要作用。事实上，无论是在整体经济发展中，还是在对外贸易中，服务业的影响力都在逐步提升。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逐步提高，我国逐渐成长为举足轻重的国际消费市场，对各项服务的需求也迅速膨胀。这从近两年来快递业在国内的兴起就可以看出。继网购潮流兴起，国内物流业呈现出爆发式增长。大大小小地物流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2005年快递量仅有2.29亿件，而2014年达到139.59亿件。2005~2014年，快递量年平均增长率达60%。“十三五”期间我国将着力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力主打造一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国内品牌，以解决国内有效供给不足、引导海外消费回流。

制造业的主导地位依然不容动摇。我国经历三十多年的经济腾飞才成长为世界生产工厂，制造业的核心优势应该要长期保持。这不仅是考虑到制造业在为第一和第二产业提供技术支撑方面作用，更是考虑到制造业对于展现国民经济实力、维系国际关系和争取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意义。且像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近期也提出了“重返制造业”、“工业4.0”的发展口号，可见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对大国发展依然保留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三，加工贸易比重下降，一般贸易重要性提升。

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加工贸易占总贸易额的比重一路下行。在出口方面，加工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从2007年的50%以上，下降到2015年的35.04%。与此同时，加工进口占总进口的比重也从2005年41.6%的历史高位下降到2015年的26.57%。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开放的初期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有效缓解国内幼稚产业受外国企业的冲击；另一方面则能够有效吸收我国的剩余劳动力，并为我国积累了大量具有生产经验和一定技术水平的工人，为我国逐步成为世界工厂奠定基础。此外，加工贸易还为我国企业带来了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和先进的生产技术。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加工贸易的弊端——人均工业增加值、资本劳动比及生产率较低、生产波动性更大等逐渐显露出来，并制约着我国对外贸易的转型升级。因而，加工贸易将会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一般贸易企业将逐步成长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中流砥柱。此外，我国外贸环境的变化也促使了一般贸易企业重要性提升。如今我国出口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逐步提高，促使其在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攀升、以及从国际代工向自主出口的转变。

（二）生产率和质量提升

我国“十三五”创新发展战略的另一个重点是——着力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水平。随着我国进一步开放和逐步融入全球产品供应链，无论是国内企业还是出口企业面临的竞争都更为激烈。这一方面淘汰低效企业、促使国内企业的平均生成效率逐步提高，另一方面使得我国出口的国内附加值不断攀升，出口产品质量也有望提升。

第一，企业生产率的提高是我国经济提质增效的关键。

随着贸易壁垒的减少和国际分工的加快，一国的企业不仅面临本国竞争对手，还将面临国外企业的激烈竞争。生产效率是关系企业能否屹立于国际市场的核心因素。要实现企业的生产效率的提高，首先，要继续扩大开放规模，引入竞争。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和产出关税显著负相关。即平均而言，关税水平较低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更高。

企业研发创新是促进其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来源。无论是智能机帝国苹果、搜索引擎老大谷歌，还是智能电动车新贵特斯拉，它们无一不是靠持续不断地创新，才得以牢牢把握大众需求和掌控未来

产业发展方向，使自身的产品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第二，促使低附加值企业向高附加值企业转变。

尽管加工贸易在我国发展初期作用巨大，但其生产效率和附加值通常较低，不符合我国提质增效的经济发展方向。通常而言，一般贸易企业的国内附加值比远高于加工贸易企业。因而，由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的转变将会促使我国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提升。事实上，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出口的加工贸易比重持续下降，一般贸易重要性逐步提升。需要说明的是，有研究指出当前我国一般贸易企业的国内附加值有下降趋势，但这主要是来自于短期因素的冲击。贸易自由化之后，我国一般贸易企业使用高质量的进口中间品的相对成本降低^①，这促使一些企业对进口投入品的短期需求迅速增加，从而拉低了其国内附加值比。但也要看到的是，投入品质量的提高，在长期也势必将带来我国出口品质量和附加值的提高。

第三，从低价竞争向高质量和高技术产品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品主要依靠价格低廉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胜出。然而，近年来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的价格优势逐步降低，这促使我国未来将从依靠低价竞争向高质量和高技术产品转变。事实上，加入WTO以来，我国贸易品质量情况逐步改善。2000~2011年我国燃料和润滑剂行业的出口品质量显著提高，食品和饮料、工业供给品行业的出口质量也小幅增加。与此同时，资本品和运输设备及其零配件行业的出口品质量则有所下降。这两类行业的资本密集度较高，与我国劳动要素较为富余的现状不相符合。但需要看到的是，随着我国资本要素的逐步积累，在资本密集型行业上的比较优势也将增加，届时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出口品质量或将提升。

在进口品质量方面，食品和饮料以及其它非耐用消费品的进口品质量也有所提升。运输设备及其零配件行业的进口品质量则显著提升。进口品质量的提高将预示着这些行业的出口品质量也将逐步攀升。而运输设备及零配件通常作为其他产品的中间投入，其质量的提高对其他行业的质量提升具有正

加工贸易企业进口原材料享受零关税的优惠，因此贸易自由化对其进口原材料相对价格的直接影响不大。

的外部效应。

（三）区域性自贸区建设

过去十五年中，我国的贸易自由化工作主要集中在融入世界性贸易组织，并通过与发达国家构建良好贸易往来，融入全球分工、促进经济发展。而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越来越突出。因而，未来5年我国对外开放的重点在于区域性自贸区以及与发展中国家自贸区建设上。

我国当前已形成良好的区域自贸区谈判势头，并将逐步建立多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区。这其中不得不提的是2010年全面建成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和仍在谈判中的中日韩自贸区。作为世界上三大区域经济合作区之一（另两个分别为欧盟和北美自贸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也是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根据世界银行，截至2015年，中国—东盟自贸区涵盖11个发展中国家，约20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达13.3万亿美元，出口总额占世界总出口额的17.0%^①。作为“东盟+中国”、“东盟+日本”、“东盟+韩国”自贸区的升级版“东盟+中国+日本+韩国”（以下简称“东盟10+3”）自贸区谈判、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以下简称RCEP^②）谈判也在陆续推出，并有望在下一个十年内达成。

无论是“东盟10+3”自贸区，还是RCEP谈判，中日韩三方谈判无疑都是其核心内容；中日韩三方谈判进展制约着RCEP谈判的推进。由于领土问题和在贸易自由化原则上的分歧，RCEP谈判尚未完全协调一致；中日韩自贸区具有巨大的规模效益。三国2015年的GDP总额约为16.4万亿美元，占东亚GDP总额的76.9%。中日韩自贸区将成为东亚最大、最重要的自由贸易区，并将极大地促进东亚、乃至东南亚经济发展和贸易往来。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具有重要的区域和国际影响。RCEP谈判有助于消除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壁垒，促进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往来；RCEP的建立有助于深化十六个成员国之间的产业整合程度。以往研究发现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扮演者“承上启下”的角色。我国未来将逐步转变为向一些东南亚国家供应配套零部件，并经由这些国家向美、欧出口最终消费品。RCEP的成员国经济规模总额较大，势

必对各个成员国的经济和产业结构都将产生重要影响。RECP将成为构建亚太贸易新秩序的一股重要力量。

（四）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十三五”发展规划的重要突破点。金融危机以前，贸易自由化是我国的对外开放的主要内容，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较小。与此同时，我国中西部发展仍然相对落后，招商引资仍是地方政府经济工作的主要内容。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我国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走出去”、“活商贸”、“一带一路”等经济战略逐步被政府和经济学家们认定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突破点。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不断推进是我国“十三五”对外投资策略的核心内容。“一带一路”战略将对我国及其它亚洲和欧洲国家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市场规模较大，经济影响巨大。“一带一路”具有重要的产业效应，能够实现我国与其它国家的经济双赢。“一带一路”从我国的西部、西南地区出发，这将有益于这些地区的发展和崛起，帮助我国从东部沿海一枝独秀的经济现状向东部和中、西部共同发展的局面转变。“一带一路”有助于我国技术、制度和文化的输出，有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一带一路”在对外输出产能时，势必也将把我国的制度、规范和文化带到这些国家，提高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此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金融机构的建立也将提高人民币在这些地方的认可度和普及度。“一带一路”提升了我国与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有助于冲销我国未加入TPP的负面影响。“一带一路”从中西部地区向欧亚辐射，尽管不予锁定亚洲和太平洋沿岸国家的TPP相冲突，但其市场规模和政治影响力都足与TPP相媲美。此外，“一带一路”还同我国的生产需要和生产能力密切关联，能够在短期发挥作用。

三、以开放推动改革，以改革促进开放

“十三五”发展规划中，对内改革和对外开

由于世界银行2015年统计数据中缺少文莱、缅甸和泰国的贸易数据，故该数值为余下八国贸易总额占世界总贸易额的比重。

包括东盟十国——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新加坡、菲律宾、泰国和越南，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六国。

放并非两个独立的发展方向，二者既相辅相成又相互促进。我们要力求以对外开放进一步推动对内改革，以对内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

以对外开放推动对内改革。自贸区建设和“一带一路”战略为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产品质量提供良好的政策支持。如自贸区建设有利于我国形成区域性生产链条，从价值链的低端逐步拾级而上。贸易自由化加剧了国内外市场的竞争，淘汰落后产能，引导资源向生产效率更高的企业配置，促使企业提高生产率水平。随着我国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外贸市场的逐步开放，企业出口的市场规模扩大，企业提升自身生产率和转向高质量产品将变得更加有力可图。具体而言，对外开放有助于扩大出口市场规模，缩减企业的单位研发成本，促进企业的研发和创新。而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对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提高产品的国内附加值和质量方面都具有正向作用。

以对内改革促进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成功推进，将为我国的对外开放提供经济基础。在贸易方面，对内改革将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为我国出口寻找新的增长点；对内改革有益于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高质量产品的生产，增强了在位企业的出口能力；对内改革提升了我国各行业的竞争优势，为我国自贸区谈判增添筹码。在对外投资方面，对内改革不仅有益于我国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的高效、

高质地输出，还将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形象和影响力，吸引更多的国家加入到“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中来，进而扩充我国的国际影响力。

[参考文献]

- [1] 戴觅, 余森杰, Madhura Maitra. 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之谜: 加工贸易的作用[J]. 经济学(季刊), 2014(2).
- [2] 余森杰. 加工贸易、企业生产率和关税减免——来自中国产品面的证据[J]. 经济学(季刊), 2011(4).
- [3] 余森杰, 王宾骆. 对外改革, 对内开放, 促进产业升级[J]. 国际经济评论, 2014(2).
- [4] Bergin, Paul R., Robert C. Feenstra and Gordon H. Hanson, Offshoring and Volatility: Evidence from Mexico's Maquiladora Industry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9, Vol. 99, 1664 - 1671.
- [5] Feenstra Robert C. and John Romalis, International Prices and Endogenous Quality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4, Vol. 129(2), pp.477 - 527.
- [6] Feenstra, Robert C. and Shang-Jin Wei, China's Growing Role in World Trade [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 [7] Gereffi, Gary and Olga Memedovic, The Global Apparel Value Chain: What Prospects for Upgrading by Developing Countries [M]. Vienna: 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2003.
- [8] Hiau Looi, Kee and Heiwai Tang, " Domestic Value Added in Exports: Theory and Firm Evidence from China "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6, Vol. 106(6), 1402 - 1436.
- [9] Koopman, Robert, Zhi Wang and Shang-Jin Wei, " How Much of Chinese Exports Is Really Made in China? Assessing Domestic Value-added When Processing Trade is Pervasive "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2, Vol. 99, 178 - 189.
- [10] Lileeva A, Trefler D., " Improved Access to Foreign Markets Raises Plant-Level Productivity... For Some Plants "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0, Vol. 125(3), 1051 - 1099.

The strategic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Trade in 13th Five-Year Plan

Yu Miaojie , Cui Xiaomin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of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During China's 13th Five-Year Plan,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situation becomes more and more complex and changeable, which also brings chances and challenges to China's development. Recently, China's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strategy is based on innovation, centered 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connected with popular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organically. Domestic reform and opening-up still are the two main strategies for China to maintain sustainable and high-speed development. What's more, more effort will be spent on adjust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improving productivity efficiency and product quality, building regional free-trade zone and promoting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o realizing high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finally.

Keywords: Innovation, Domestic Reform, Opening-up

(收稿日期: 2016-09-13 责任编辑: 垠喜)

【本期论题】

我国对美国服务贸易逆差问题研究

李俊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 中国对美国服务贸易逆差巨大, 逆差主要来源于旅游和知识产权收费等部门。服务业发展滞后是我国对美国服务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建议打破国内服务市场垄断, 促进服务业创新, 增进服务业企业竞争力。建立和完善服务贸易支撑体系也是推动我国服务出口发展, 增强服务贸易竞争力, 减缓服务贸易逆差扩大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 服务贸易 逆差 贸易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 F7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6)05-0037-04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5JJD810014)。

[作者简介] 李俊(1979—), 山东青岛人,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服务贸易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一、我国对美国服务贸易逆差现状

(一) 我国服务贸易逆差概况

加入WTO为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创造了广阔的外部市场环境, 服务贸易得到了迅速发展。服务贸易出口从2001年的329亿美元, 增加到2014年的2222亿美元, 年均增长率为14%。服务贸易进口从2001年的390亿美元, 增加到2014年的3821亿美元, 年均增长率为18%。伴随着服务贸易进口增速超过服务贸易出口增速, 服务贸易逆差迅速扩大。2001年, 服务贸易逆差仅为61亿美元, 到2014年增加到1599亿美元, 年均增长率达到26%。2009年金融危机后, 服务贸易出口和服务贸易进口之间的增长速度进一步拉大, 使得我国的服务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据世界贸易组织最新统计, 2014年中国服务出口额与进口

额的全球占比分别为4.6%和8.1%, 位居全球第五位和第二位, 并保持着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

(二) 我国对美国服务贸易逆差概况

中美之间的服务贸易发展趋势与中国总体服务贸易趋势一致。美国是中国五大服务贸易伙伴之一。随着中国加入WTO, 中美之间的经济交往越来越密切, 双边服务贸易发展迅速。中美之间的服务贸易进出口额2001年为90亿美元, 2014年为569亿美元, 14年间增长5.3倍。2014年中美服务贸易额占到中国服务贸易总额的9.5%。中国向美国的服务出口从36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144亿美元, 年均增长率为10%。同期中国从美国的服务进口从54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425亿美元, 年均增长率为16%。

中国从美国服务进口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向美国服务出口增长速度, 中美之间的服务贸易失衡因此不断加剧。2001年的中美服务贸易逆差为18亿

美元，2001年到2007年，中美服务贸易逆差较为稳定，在20亿美元以内。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服务贸易逆差增加到49亿美元，此后服务贸易逆差有加速增加的趋势，2014年的服务贸易逆差达到281亿美元。2008年到2014年服务贸易逆差年均增长达到了28%。2014年中美服务贸易逆差占中国服务贸易逆差的18%。美国成为中国服务贸易逆差的第一大来源国。

（三）中美服务贸易逆差部门结构

美国对与中国之间的服务贸易统计数据较为详细。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的服务贸易数据是根据《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2010版》进行部门划分和统计的，其主要的统计涵盖了四种服务贸易提供方式和9大主要服务部门^①，在表1中我们列出了这9大部门的中美服务贸易逆差。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出口发展比较均衡，在传统的服务贸易部门和资本技术密集型的服务贸易部门出口增长都十分迅速。中国对美国服务贸易出口主要集中在传统的服务贸易部门，2006年运输和旅游两个部门的出口占到总出口的比例达到84%。2014年这一比例有所下降，然而依然高达59%，而其他部门占比较少。中国主要向美国出口的是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贸易部门。

表1 中国对美国服务贸易差额的部门结构 单位：百万美元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总服务	-438	-1336	-4921	-7501	-11891	-16654	-19999	-23190	-28077
维护保养	-218	-310	-364	-481	-512	-533	-599	-650	-1106
运输	2989	2624	540	-131	-161	-637	-791	-743	-679
旅游	-435	-613	-1991	-3175	-5672	-8720	-12208	-14856	-17293
保险	-44	-43	-10	-54	-47	-58	-66	-95	-116
金融	-630	-850	-691	-1165	-1901	-1816	-1949	-2428	-2712
知识产权收费	-1460	-1825	-2164	-2074	-3242	-3959	-4413	-5485	-6541
电信计算机和信息	202	478	660	676	803	851	1088	1215	315
其他商业服务	-784	-733	-836	-1014	-1052	-1634	-847	118	379
政府服务	-60	-65	-66	-83	-108	-149	-215	-267	-326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BEA）。

中美双边的服务贸易失衡在不同部门有不同的体现。我国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这一服务部门，存在服务贸易顺差，在其他服务部门大多数时候都有服务贸易逆差。旅游、知识产权使用费以及金融三个部门一直是逆差的主要来源，2006年，三个部门的服务贸易逆差合计为2525百万美元，而当年的

服务贸易逆差才只有438百万美元。而到了2014年，这三个部门的逆差达到了26546百万美元，是中美服务贸易逆差的94%多。

从动态的角度看，2006~2014年中国各个服务部门的贸易差额呈现了不同的变化趋势。旅游和运输是我国传统优势部门，旅游部门服务贸易逆差在2008年后迅速扩大，并呈现急剧恶化的趋势。运输部门2009年也从服务贸易顺差转为服务贸易逆差。旅游服务贸易逆差扩大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国人均收入的大幅增加，引起人们对于境外旅游服务产品需求的增加；二是人民币的升值使得中国旅游服务贸易条件恶化，引起旅游服务贸易出口减少，进口增加。虽然2009年危机后的国际货物贸易有所复苏，我国运输部门的服务出口恢复增长，但是随着我国人工成本的上升，运输服务成本优势消失，导致在与美国的运输服务贸易中出现逆差。

与传统的服务贸易部门不同，部分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竞争力增强，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部门一直为顺差，这是我国IT产业的迅速发展，带动这一部门生产性服务的发展及竞争力提高的结果。其他商业服务这一部门2013年前逆差，2013年转为顺差，反应了我国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以及

制造业的升级改造，对生产服务业的带动作用。此外，金融、保险、知识产权使用费和政府服务等是我国传统的弱势部门，贸易逆差较为显著，并有扩大的趋势。知识产权使用费部门的逆差是与我国企业发展过程中大量采用国外先进研发成果，购买美国专利等产生的，也反映了我国这些年知识产权保护进步。保险、金融和政府服务部门由于我国垄

断程度较高，国际竞争力较弱，导致出现逆差。

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中美服务贸易中，我国除了其他商业服务和电信、计算机和信息部门存在少量的顺差外，大部分的部门都存在逆差，在旅

① 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涵盖了(1)跨境交付(2)境外消费(3)商业存在(4)自然人流动这四种服务贸易提供方式。

游、金融和知识产权收费三个部门的服务贸易逆差巨大，并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二、服务贸易逆差的形成原因分析

一是中美服务业发展差距巨大。服务业是服务贸易的产业基础，如果没有发达的服务业，就不可能有竞争力的服务贸易出口。美国服务业发展程度高，服务业增加值在三大产业中占绝对优势地位，如表2所示，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在整个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稳定在80%左右。虽然我国的服务业发展迅速，对GDP的贡献不断增强，但是无论是服务业总体规模还是服务业对GDP贡献度，中国相对于美国而言差距十分巨大。

同时应该看到，中国服务业的增长有其特殊特征。根据江小涓（2011）的分析，我国服务业的增长很大一部分是名义增长，包括两部分，一是由于服务业价格的提高表现出的服务业增长；二是制造业中服务业的剥离造成的。第一种名义增长主要体现在服务业收入弹性较高，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对服务业的需求增加更快，引起服务价格上升高于商品价格上涨，造成服务业产值的虚高。第二种名义增长是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很多企业把一些本属于企业自身的服务业剥离出来形成单独的服务业企业，实际上只是服务业从隐性变为显性而已，并没有实际的服务业的增加。因此如果刨除服务业名义增长，中国服务业与美国的差距就更大。服务业发展滞后是我国服务业竞争力不前，逆差扩大的主要原因。

二是经济增长带动对进口服务需求增加。服务需求主要是居民对于消费型服务的需求和企业对于生产性服务的需求。随着我国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人均收入水平增长迅速，中间收入群体扩大，这部分人服务收入弹性较大，收入增长引起的对服

务需求的增加较大，这突出体现在我国在这些年的对于旅游和教育等服务需求的大量增加，在国内相应的服务供给不能较好地满足需求的增加时，必然引起服务进口的大量增加。另一方面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企改革加速，企业生产的分段化和大量跨国公司在我国的绿地投资带来对生产性服务需求的迅速增加。企业要发展就需要借助于各种专业的生产服务，增加服务进口。

三是我国服务业供需结构失衡。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不仅仅是总量供给不足，也存在供需结构上的失衡。随着中国整体经济的不断增长，消费者和企业都在追求较高质量消费和生产服务，而我国的服务业企业依然在旧有的思想下维持重量不重质的供给模式。以旅游为例，中国的一些旅行社和景点，在提供旅游服务的过程中，往往只注重业务量，而不重视服务质量，造成旅游市场纠纷不断，客户旅游体验差。从生产性服务的角度看，很多服务领域仍然保持过多的市场准入限制，服务质量差，整体质量不高，造成我国服务业供给低水平重复服务。

四是我国服务市场主体竞争力不强。我国在服务业市场的改革较为缓慢，服务业垄断程度较高。比如金融、电信、新闻出版传媒等就是典型的垄断行业，产权不够清晰，效率低下。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服务业企业有较多是原国有企业集团剥离形成，与原来企业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较为稳固的业务关系，降低了竞争力。

五是我国服务贸易支撑体系不完善。我国长期以来重视制造业的发展和国际贸易，而对服务国际贸易重视不足。美国从1994年生效的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就涵盖了服务贸易的市场开放，探索服务贸易开放的形式和内容，并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服务贸易开放的规则。美国在其《国家出口战略》中，具体规定了服务贸易的战略、策略、政策和具体措施。我国服务贸易的开放较晚，缺少制定规则话语权。在对外服务贸易方面也缺少相应的服务贸易支撑体系和具体措施。

表2 中美服务业发展对比 单位：十亿美元

指标	国家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增加值	美国	10952	11452	11696	11687	12100	12468	12991	13352	13917
	中国	1144	1513	1956	2249	2670	3321	3850	4453	4984
贡献度 (%)	美国	79	79	79	81	81	80	80	80	80
	中国	42	43	43	44	44	44	46	47	48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和中国统计局数据整理计算。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中国对美国服务贸易逆差

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我国服务业产业本身的发展程度不高和服务供给质量较低造成对美国高质量服务需求的增加，引起中美服务贸易失衡。因此要推动我国的服务贸易出口，缓解中国的服务贸易逆差，本文建议：

1. 推动服务业供给侧改革，为服务贸易发展夯实产业基础

服务业发展要改变过去只重量，不重质的思路。继续发挥比较优势加快传统服务业发展，提高服务质量，增强传统服务业竞争力。支持发展与我国制造业相联系的现代服务业，例如金融、保险、知识产权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形成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良好互动发展，以制造业促服务业发展，以现代服务业带动制造业升级。

2. 降低服务业市场垄断，完善市场竞争机制

在新一轮国企改革过程中，要注意研究服务业企业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对服务业企业改革提出合理措施。降低服务业市场准入门槛，鼓励行业竞争，激发垄断行业企业活力，提高生产效率。以改革促竞争，以竞争促效率，提升现有服务业微观主体的国际竞争力，形成一批规模较大，能在国际市场上有较强竞争力服务业企业集团。

3. 改善政府职能，完善服务业管理体制

进一步减少服务业的市场准入限制和冗余的行政审批环节，大力培育新生服务业企业，开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引导和孵化一批有新思维、新观念的新型服务企业。鼓励服务业创业创新，对小规模的创新型服务企业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呵护和支持中小规模的服务企业成长，培育服务贸易的产业主体。

4. 扩大服务业开放，带动我国服务贸易出口

扩大服务贸易开放，促进我国服务市场的竞争，实现优胜劣汰，提高我国服务企业的效率。多方位开展服务贸易协定谈判，积极参与国际服务贸易开放的规则制定，保护我国的服务贸易利益。利用自贸区建设经验，在对外服务贸易协定中逐步研究实施服务业外资负面清单准入模式，并逐步扩大服务业外资规模。

5. 建立和完善服务贸易支撑体系，培育多元服务贸易出口主体

设立专门的服务贸易促进机构，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层面，促进跨部门的合作，共同研究和分析制约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因素，制定促进服务贸易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形成政府主导、教育科研机构为主体、服务企业参与的服务贸易研究机构，及时追踪和发现我国服务贸易中存在的问题，向国家和地方的相关部门建言献策。为中小企业参与服务贸易出口提供及时可靠的信息，并提供一些相关的服务出口方面的实用技术培训，促进更多企业参与到服务贸易出口中。

[参考文献]

- [1] 孟夏,于晓燕.论中国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与特点[J].国际贸易,2009(9):54-58.
- [2] 程大中.服务业就业与服务贸易出口:关于中国和美国的对比分析[J].世界经济,2000(11):49-52.
- [3] 王绍媛.美国服务贸易出口促进政策的启示[J].财政研究,2011(11):80-80.
- [4] 李俊.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出口研究——基于行业层面的考察[J].上海经济研究,2016(2):19-28.
- [5] 江小涓.服务业增长:真实含义、多重影响和发展趋势[J].经济研究,2011(4):4-14.
- [6] 夏杰长.打破垄断和完善规制:深化现代服务业改革的关键所在[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8(3):1-6.

A study on China's Deficit in Service Trade to the United States

Li Jun

(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Abstract: The United States is China's largest service trading partner, with the steady growth of China's economy; China imports a large number of servic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n order to reduce trade deficit in services, China need to further break the monopoly of the domestic service market, promote innovation in service industry,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service enterprises. Government guidance,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service trade support system are also important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ervice exports, to slow the expansion of service trade deficit.

Key words: trade in services, deficit, trade competitiveness

(收稿日期：2016-08-19 责任编辑：廖令鹏)

【开放论坛】

如何看待中国改革的南北差异*

王海东

(北京市海淀区双榆树居委会, 北京 100086)

[摘要] 中国改革的进程,在南方和北方有着一定的差异,呈现北慢南快的特点。这与我国的工业布局及计划经济的影响有关系。要进一步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本地区进一步扩大人民群众所拥有的经济自主权,扩大经济自治改革试验区规模,科学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权力,坚持先经后政的改革方针不动摇。

[关键词] 市场经济 南北差异 中国改革

[中图分类号] F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6)05-0041-04

[作者简介] 王海东(1953—),河北南皮人,高级经济师,曾任天津市北方调查策划事务所所长、天津市北方人才培训中心主任、天津市网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北京市索尔维斯企业管理咨询中心董事长兼总经理、中国建设银行企业文化部服务管理顾问,现已退休,研究方向: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一、中国改革的南北差异和由此产生的问题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历史起点的中国改革,很快就要走过第三十八个年头了。38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变,经济发展了,国力增强了,人民收入增加了,生活改善了。然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这一切,还会看到贫富差距、环境污染、腐败滋生这些令人担忧的社会现象,每一个中国改革的过来人都在想,中国改革怎么了?为什么在产生大量正面效应的同时又产生了这样一些负面效应?打开一幅中国地图,我们也许可以从中找到答案。在这幅地图上,中国南北的自然地理分界线似乎变成了改革的经济地理分界线。在南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已经大幅度减少,市场已经初步成为资源

配置的决定性因素,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已经初步形成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人们既能看到贫富差距、环境污染、腐败滋生现象,也能看到致富机会大量存在、环保产业迅速发展、腐败土壤日益减少的现象。虽然改革在国内所有地区都产生了大量的正面效应,但是在南方产生的正面效应似更加使人感到欢欣鼓舞。

那么,中国改革的南北差异又是怎样产生的呢?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从中国的工业布局说起。中国的工业布局具有北重南轻的特点。所谓北重南轻,就是北方重工业比重较高、南方轻工业比重较高的现象。这种工业布局的形成既有自然原因

*本文写作过程中,南开大学李罗力教授、唐杰教授和平安集团高级顾问王骥先生,都与本人进行了多次深入和广泛的讨论,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指导意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此文是集体智慧的产物。在这里再次对李罗力、唐杰、王骥先生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也有历史原因。从自然原因来看，中国的矿产资源主要分布在北方。因此，北方比南方更加有利于发展重工业。从历史原因来看，早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最早的兵工厂、冶炼厂、矿山采掘等重工业，就已经在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运动发起人主政的北方各省市纷纷出现。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掠夺中国资源的目的，也曾在中国东北地区步北洋军阀张作霖的后尘大力发展重工业。新中国成立之后，曾长期将东南沿海地区视为对敌斗争前线，又制定了在这一地区主要发展轻工业而不是重工业的战略方针。“一五”计划的56个重点项目，基本上都部署在东北、华北、华中等北方地区。这些重点项目的建成投产，不仅奠定了中国现代工业的发展基础，而且进一步强化了北重南轻的工业发展趋势。

由于发展重工业比发展轻工业具有更多的计划性，工业布局的特点必然会对中国的计划经济产生重要影响，计划经济在北方比在南方发展得更加完善。这样，中国的计划经济就具有了北强南弱的特点。所谓北强南弱，就是北方计划经济力量较强、南方计划经济力量较弱。由于改革的首要任务是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特点必然会对改革进程产生重要影响，改革在北方比在南方遇到了更大的阻力。这样一来，改革进程就具有了北慢南快的特点。由此可见，工业布局的特点决定了计划经济的特点，也就决定了改革进程的特点。中国改革的南北差异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虽然中国改革过去也有阻力，但是过去的改革阻力与现在大不一样。过去的改革想改什么就可以把什么改过来。改革方案实施之后，新事物就会随之产生，旧事物就会随之消失，改革就会变成新旧事物的分界线。现在的改革阻力大，想改什么未必能把什么改过来。改革方案实施之后，新事物可能会随之产生，旧事物却不一定随之消失。旧事物还有可能会钻进新事物之中，以新事物的面目出现。究其原因，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既得利益集团中有一部分人即是通过非法手段或貌似合法的非法手段先富起来的。这种问题不仅使一些改革难以产生应有的成果，而且可能要付出重复改革的代价。许多领域的改革都有一个需要深化的问题。中国改革怎么办？不管我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都

必须首先倾听一下人民群众的声音。人民群众的回答告诉我们，改革的社会信心在某些地方已经发生了动摇。

二、下决心打一场有进无退的改革决战

计划经济曾经根深蒂固。它像一道高耸于市场经济面前的防波堤，只有让市场经济浪潮漫过这道防波堤，才能使它永远葬身海底。我们到底有哪些办法呢？应当看到，虽然南方的改革步伐比北方要快一些，但还不够快，还远远不能满足本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改革需要，计划经济在许多经济领域特别是城市建设领域中仍然有许多表现。怎样才能彻底肃清计划经济的影响呢？

从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来看，计划经济从兴旺走向消亡的过程，与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具有密切联系。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又与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有的经济自主权具有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所拥有的经济自主权越多，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就越高，计划经济的衰亡速度就越快；人民群众所拥有的经济自主权越少，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就越低，计划经济的衰亡就越慢。要想彻底肃清计划经济的影响，就必须在本地区进一步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在本地区进一步扩大人民群众所拥有的经济自主权。

因此，当下的改革可以分三步走。

第一步，借鉴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及有关西方国家的地方自治经验，在中国南方建立经济自治改革试验区。将涉及地方事务的经济立法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地方有关政府机构有权依据中国宪法，自行制定、颁布和实施适用于本地区的经济法规；地方政府在自行制定、颁布和实施适用于本地区的经济法规之前，必须通过各种渠道广泛征求本地居民的意见。

第二步，在南方不断扩大经济自治改革试验区的规模，先建立市级经济自治改革试验区，再建立省级经济自治改革试验区；北方派遣各级领导干部到南方的经济自治改革试验区挂职学习，之后在本地区推广南方的经济自治改革经验；无论在南方还是在北方，经济自治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管理体制，都是为了形成一个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负其责、广大人民群众

拥有经济自主权的经济运行过程，而不是为了否定和削弱党的领导。因此，经济体制改革不能涉及政治内容，更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

第三步，根据改革需要，进一步科学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权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必须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行使经济管理权力，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于经济运行过程的调节作用。

三、坚持先经后政的改革既定方针不动摇

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就指出：中国改革有两个重要任务，一个是经济体制改革，另一个是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将计划经济转变成为市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加强现有政治体制的民主和法治建设。虽然这两个重要任务都需要完成，但是这两个重要任务却不可能同时进行。由于经济体制改革有利于推动生产力发展，又由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到目前为止中国改革始终采取先经后政的既定方针。所谓先经后政，就是首先集中力量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然后再根据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那么，这一既定方针是否正确呢？

有人认为，这一既定方针过去是正确的，现在是不正确的。现在，经济体制改革遇到了越来越大的阻力，已经很难继续向前推进了。由于这种越来越大的改革阻力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又来自于政治体制的不完善，现在必须把政治体制改革放到经济体制改革的前面了。

还有人认为，这一既定方针过去就是不正确的，现在更不正确了。因为，西方国家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只是进行过政治体制改革，从来就没有进行过什么经济体制改革。这一历史事实表明，只要完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也就自然而然地完成了。既然中国改革也是一种现代化进程，中国也应当像西方国家一样，只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不需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不难发现，这两种说法对改革既定方针的评价有所不同，但是这两种说法对当前改革形势的判断却完全相同。这个判断就是：中国改革已经到了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了。那么，中国改革是

否已经到了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呢？

必须指出，当经济体制改革遇到困难的时候，许多人把希望的目光投向政治体制改革，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似乎有一种经济体制改革所不具备的特殊性质。但是，这种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过分信任，却显示出对经济体制改革缺乏研究。从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来看，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一种民主改革，其最终目标，就是将人治民主转变成为法治民主。我们到底需要做些什么事情才能实现这种民主改革的最终目标呢？从中国国情来看，只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能行吗？显然是不行的。因为，法治民主通常具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表现形式是实体民主，另一种表现形式是程序民主。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者的区别在于：从实体民主来看，实体活动主要来源于社会成员的各种经济活动，所以实体民主的形成有利于实现经济民主。所谓经济民主，就是以经济活动的自由和平等作为产生基础的法治民主。实体民主的形成有利于实现经济民主，所以实体民主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将计划经济转变成为市场经济的改革过程，就是我们所说的经济体制改革。从程序民主来看，程序活动主要来源于社会成员的各种政治活动，程序民主的形成有利于实现政治民主。所谓政治民主，就是以政治活动的自由和平等作为产生基础的法治民主。由于程序民主的形成有利于实现政治民主，程序民主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加强现有政治体制的民主和法治建设的改革过程，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两者的联系在于，实体民主是程序民主产生的基础，程序民主是实体民主发展的方向。法治民主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从实体民主走向程序民主的社会发展过程，也就是一个不断从经济体制改革走向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

由此可见，虽然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一种民主改革，但是民主改革并非政治体制改革的专利。因为，经济体制改革也是一种民主改革。这两种民主改革的区别在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作用是通过程序民主的形成过程实现政治民主，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实体民主的形成过程实现经济民主。这两种民主改革的联系在于，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都具有民主改革的性质，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改革。这种具有中国特色民主改革产生的原因，来自于一种从未出现在西方国家的特

殊国情。西方国家在进行民主改革的时候，早已在自己的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了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虽然尚未通过程序民主的形成过程实现政治民主，但是早已通过实体民主的形成过程实现了经济民主。因此，西方国家既没有必要把民主改革分为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也没有必要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之前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在进行民主改革的时候，从未在自己的现代化进程中形成过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没有通过实体民主的形成过程实现经济民主。因此，中国不仅有必要将民主改革分为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而且有必要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之前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由此可见，我们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民主改革

经验。因为，中国进行民主改革的历史背景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中国改革之所以采取先经后政的既定方针，是由于中国必须首先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还清缺乏实体民主的历史欠账。这个历史欠账一天还不清，中国就一天不具备立即停止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条件，就一天不具备全面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基础。因此，先经后政的改革既定方针是正确的。不管改革出现了什么问题，不管改革遇到了什么困难，我们都必须坚持先经后政的中国改革既定方针不动摇。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才能成功，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才能成功。

The View of China' s Reform Gap between South and North

Wang Haidong

(Shuangyushu Neighborhood Committee of Haiding District, Beijing 100086)

Abstract: There exist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in China in terms of the promo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China' s reform. It is related to China' s industrial layout and the impact of planned economy.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economy and expand the economic sovereignty for local people, as well as expand economic scale autonomous reform pilot area, divide the economic management authority scientifically, and adhere the reform principle of economic priority.

Key Words: market economy, market economy, North South difference

(收稿日期：2016-09-23 责任编辑：靳叶)

【开放论坛】

产业视角下深圳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陈少兵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28)

[摘要] 本文从产业视角入手, 分析了美英等国(地区)在供给侧改革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认为产业视角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着眼点应该是产业、企业。深圳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四个问题, 即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主导产业的选择和培育、产业格局和人才问题。本文提出, 深圳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和关键应在生产领域。

[关键词] 产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建议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6)05-0045-03

[作者简介] 陈少兵(1966—), 湖北天门人,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副研究员, 工学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 科技管理与技术经济。

目前学界多重视从宏观政策的角度研究供给侧改革, 本文试图从产业角度, 对深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探索。

一、产业视角下境外供给侧改革的实践经验

纵观30多年来全球经济发展的轨迹,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地区), 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都在一定阶段, 以不同方式出现过。

美国和英国是成功的案例。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 美国通过结构性改革, 强化国内技术创新, 信息技术产业崛起。信息技术产业在供给侧扮演的动力作用特别明显, 以其为核心的美国科技产业, 不仅通过改善供给创造消费、引导消费, 而且引领消费习惯的调整, 以扩散和渗透主导结构转换, 全力打造新的工业技术产品生产体系, 持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而英国70年代末开始通过结构性改革, 将国有垄断企业逐步私有化, 并实施股权多元化, 提

升了经济发展能力, 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重要经济领域的市场结构和监管结构。

日本和台湾地区是失败的案例。80年代末开始, 两者都是通过外延扩展拖延结构改革。日本忽视了产业的供给侧提升, 把重点放在了产能的外移、市场的外移, 产业结构调整滞后, 最重要的表现是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技术竞争中完全丧失主导权。台湾地区也有同样的问题, 新竹科技园在80年代是仅次于硅谷的高科技产业园区, 信息技术产业高度发达, 但由于90年代后把重点放在扩展市场等方面, 忽视了与产业相关的供给侧如技术开发、人力资本等等的提升。目前台湾的信息产业已经远远落后于韩国和以色列。

无论是英美的成功还是日本、台湾的失败, 可以看出产业视角供给侧改革的着眼点都应该是产业、企业。政策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应激发企业创新能力, 改变供给结构与提升供给质量并重,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为全社会提供更多有效供给; 从产业

层面看，英国实质是对现有产业的优化，主要是存量调整；美国则是通过培育和提升新科技产业的发展，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主要是增量调整。核心均是效率的提升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在资本、劳动、人力资本和技术四个供给侧增长因子中，需要在改革推进时把技术作为核心因子。

二、从产业视角看深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问题

关于深圳产业发展是否存在结构性问题，大家的认识不很相同。大部分人认为，深圳经济发展已经走上了有质量的稳定发展阶段，目前经济结构合理，产业结构日益高级化，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企业充满活力，政府政策适宜，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深圳经济发展不存在结构性问题。这个观点确实有理论和实践依据支撑，但我认为，这种观点不够全面。每个经济体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存在自身特有的结构性问题，会在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时候，这类问题往往容易被掩盖，不为人重视，一旦结构性问题暴露出来，往往都是在危机发生之后。深圳经济高速发展，产业及时转型升级，成功跨入后工业化阶段，这样的成就除让人振奋外，我个人认为也容易让人产生错觉，看不到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另外，深圳跨越式产业升级没有留下明显的后遗症，这是一个奇迹，也是一个“运气”，深圳产业跨越式升级时隐藏的结构性问题被改革和发展的方法解决了，所以没有显现出来。但这并不表示当时没有结构性问题，也不表示目前隐藏的结构性问题未来不会显现出来。

我个人认为，从产业角度看，目前深圳供给侧方面主要存在如下几个问题：

一是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问题。产业升级是一个动态过程，需要持续不断地推进。产业发展，一个是内生动力，主要来源于产业的技术创新；一个是外部动力，主要来源于市场竞争。目前深圳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比较健全，但无论是内生动力还是外部动力都还存在不足，特别是内生动力方面。如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企业不愿意把资金更多地投入有风险的研发和创新，短期行为较为明显。

二是未来主导产业的选择与培育问题。很多人

认为深圳未来的主导产业相当清晰，不存在选择问题，我认为这种认识存在片面性。任何一个经济体的主导产业都不可能一成不变，同一个主导产业其产业内部也存在动态的进化方向选择问题。对于深圳未来主导产业的选择，一般都认为应该把战略性新兴产业放在第一位，但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了生物、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创意、新一代信息技术和节能环保七大新兴产业，这七大新兴产业内部又细分很多产业，可以说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由于科技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差异，这七个产业未来显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其中到底哪几个能够真正发挥对经济社会具有全局带动和重大引领作用，其实是需要细致地科学地选择。

三是缺乏经济腹地导致的产业格局问题。深圳自身缺少产业腹地，北面是东莞，西面和西北面是广州，南面是香港，选择非常有限，产业发展特别是先进制造业受到极大限制。

四是人才问题。深圳的人才问题是非常突出的，目前的人才结构显然满足不了高新技术产业和创新型城市建设的需要。深圳对人才的吸引力与前20年相比明显下降，主要原因是深圳在探索“人才红利”的实现途径方面，没有找到切实有效的办法。

三、几点建议

深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生产领域入手，核心就是高新技术产业和制造业产业。因此，落实改革的重点和关键抓手，就是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和制造业的供给侧增长因子。

具体来说，我有如下几点建议：

一是要解决好“谁兴科教”、“如何兴科教”问题。深圳在实施“科教兴市”战略方面的成效举世瞩目，但一直没有能够处理好“谁兴科教”、“如何兴科教”的问题，这也是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面临的最重要结构性问题。笔者上世纪90年代末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也引起了有关方面的关注，但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更没有很好地加以解决。个中原因是1995年以来深圳高新技术产业飞速发展，“中国硅谷”已经名扬四海，因此这一结构性问题目前仍然隐藏在背后。

“谁兴科教”、“如何兴科教”问题的实质是科技发展模式问题。当务之急，是要转变本地高等

教育发展方式，提升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要特别重视工科类专业的设置、培育，要彻底改革目前的教学大纲，根据主导产业的需求发展一批重点学科。深圳的各类院校也要转变观念。地方高校就是要当好本地产业的“发动机”，要服务主导产业，提供主导产业所需的人才、智力支撑，为本地企业摆脱“技术锁定”，提供技术解决方案等等。

二是提升科技产业的持续发展能力，尽快实现“领跑”目标。深圳要实现“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转换，只有自主创新才能实现，因此要着力推进自主创新，形成多主体、多层次、开放互动的创新机制和环境，提高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能力。目前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在研究和探索未来发展的重点战略领域，另一方面也积极构建和调整合理、高效的科研组织形式。对深圳来说，当前的科技创新已从“跟跑、并跑、领跑”并行的阶段，向“领跑为主、并跑为辅”的新阶段转换。从世界科技产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看，这种转换难度是非常大的，迄今为止成功实现这种转换的只有以色列、爱尔兰等屈指可数的案例，而且成功者都在发达国家和地区。深圳要实现这种转变，必须花大力气推进核心技术和重点领域的创新，对未来发展领域要超前布局，并且在科研组织体系布局上进行相应的调整。

三是解决好包括企业家资源和技能人才在内的人才供给问题。要形成人才“来得了、留得住、能折腾”的综合环境，积极探索适合深圳特点的“人才红利”实现方式与途径。也要高度重视外来企业家资源的引进，处理好自己培养与引进之间的关系。目前对深圳来说，引进企业家资源比自己培养更迫切，这在国际上有例可循，如尽管硅谷地区拥有斯坦福、伯克利等世界级名校，但统计表明美国出生的硅谷公司创办人中，前五位分别来自新泽西

州、密西根州、佐治亚州、弗吉利亚州和马塞诸塞州。深圳在这方面要有开阔的视野和宽广的胸怀。

四是解决好知识资本的供给问题。国外的研究表明，科技产业发达地区知识资本的供给，并不是完全由自身所在地区的大学解决。知识的供给依赖于知识的流动，各种学术交流平台、大学的研究平台、企业的研究平台以及公共技术平台，是吸引知识流入的重要媒介。我们要建设、发展、完善这些平台，而高水平的大学是所有这些平台的核心。对深圳而言，必须转变本地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要特别重视工科类专业的设置、培育，彻底改革目前的教学大纲，根据主导产业的需求发展一批重点学科。

五是解决好科技基础设施问题。建立竞争开放的科研体系，加大力度建设包括国家实验室在内的国家级创新中心。对目前已经建成的1283家国家、省、市级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载体，要强化管理，使之成为共性技术和行业技术的创新中心，真正起到“公共技术供应源”的作用，探索上述科技基础设施的运行方式和管理方式，最大限度地发挥科技基础设施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陈少兵. 汽车工业技术创新规律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 [2] 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战略与规划研究所译. [美] 加里·皮萨诺 (Gary P. Pisano), 威利·史. 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
- [3] 徐国柱, 龚贻 译. [瑞] R. 詹姆斯·布雷丁：创新的国度[M].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4.
- [4] 陈少兵. 转变贸易发展方式不应排斥加工贸易[N]. 南方日报, 2005-12-14.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Supply-side of Shenzh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y

Chen Shaobing

(Shenzhe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Guangdong Shenzhen 518028)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periences of the USA and the UK, Thinking that key points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re industry and enterprises. Then this paper study the shortcomings of Shenzhen's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including industry's dynamic mechanism, the selection of key-industry and the problem of talent. Finally, this paper gives the conclusion about shenzhen's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nd four Proposals about Shenzhen's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Key Words: Industry,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Proposal.

(收稿日期：2016-09-05 责任编辑：垠喜)

【开放论坛】

休闲体验时代澳门博彩旅游业的转型

曾 韬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65)

[摘要] 休闲体验时代下, 澳门博彩业面临博彩消费方式悄然向休闲体验转变、竞争激烈以及博彩业快速发展带来的诸多问题。本文基于访澳游客博彩动机视角, 论证博彩旅游传统赢利模式已不合时宜, 需主动向多元化休闲体验转型, 推进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

[关键词] 休闲体验 博彩旅游 博彩动机 多元化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件编号]** 1004-6623(2016)05-0048-04

[作者简介] 曾韬(1987—), 广东兴宁人,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管理学院博士, 研究方向: 旅游经济、旅游消费行为。

2016年4月, 澳门政府正式对外公布了回归以来首次编制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澳门特别行政区五年发展规划(2016—2020年)草案文本》(以下简称《规划》)。《规划》基于休闲体验时代来临, 明确提出澳门未来五年的发展定位是“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 并以此为基础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以休闲旅游为标志的澳门旅游多元化发展规划正式上升为国家特别行政区战略。然而, 多年来推动澳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博彩旅游主体产业, 却未能积极主动应对上述趋势进行转变, 导致博彩收入自2014年起一直快速下滑, 引发了澳门经济放缓、社会问题增多等一系列问题, 对澳门向“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转变造成障碍。为此, 基于《规划》的提出与面临博彩旅游严重下滑的形势, 研究休闲体验时代下澳门博彩旅游的多元化转型策略, 推进澳门旅游休闲中心建设, 保持澳门经济繁荣, 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澳门博彩旅游现状

在博彩全球化发展的推动下, 享有“东方赌城”美誉的澳门于2002年实行赌权开放, 引入外资与竞争机制, 大力发展以博彩为中心的综合旅游业, 推动了澳门博彩业的高速发展, 2004年澳门仅有寥寥数间娱乐场, 2015年时澳门已拥有36所各具特色的娱乐场。博彩收入也从2004年时的55亿美金高速增长至2014年的450亿美金, 相当于拉斯韦加斯的7倍。澳门博彩业的繁荣发展也让澳门人均GDP在2014年达到了713514美元, 在全世界名列前茅。

澳门博彩业在十多年来为澳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辉煌成绩, 然而, 其“井喷式”增长的背后也日益面临着诸多问题: 首先, 随着博彩的全球化发展, 澳门博彩旅游业面临着激烈竞争。澳门周边的国家如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陆续开放博彩业, 对澳门博彩客源与收入造成不少影响; 其次, 随着休闲体验时代的来临, 大众博彩游客的博

彩收入比重逐渐增加。然而,面对这种情况,澳门大部分博彩娱乐场仍然固守以往传统的博彩赢利运营模式,导致大众游客的休闲体验得不到多元化满足,重游意愿降低,进而影响着澳门博彩收入自2014~2016连续两年持续下跌,且每月跌幅大部分在30%以上;第三,澳门博彩业繁荣发展同时,也产生不可回避的负面效应,带来社会赌博化、病态赌徒问题等严峻的社会问题,不仅对澳门国际形象及影响力的提升产生负面影响,也对澳门向“世界旅游休闲目的地”形象的转变造成障碍。

二、澳门博彩游客动机分析

基于上述现状,本研究以澳门6家博彩持牌企业的36所博彩娱乐场为研究对象,从博彩游客动机的视角,通过实证研究剖析大众休闲旅游时代,游客前往澳门参与博彩旅游的不同动机,提出基于休闲体验时代下澳门博彩旅游向多元化转型的建议与策略,以期推进澳门博彩企业顺利转型,促进澳门博彩休闲旅游业的健康繁荣发展,加快建成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进程。

(一) 数据来源与分析过程

笔者通过对中外博彩游客动机文献回顾,构建了访澳游客博彩动机的量表,并采用方便抽样中的定额抽样方法,对澳门6家博彩持牌企业[澳门博彩股份有限公司;美高梅金殿超濠股份有限公司;永利渡假村(澳门)股份有限公司;新濠博亚(澳门)股份有限公司;银河娱乐场股份有限公司;威尼斯人(澳门)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36所娱乐场进行了调研,采集了1250份的第一手实证研究素材。

研究对调研数据进行SPSS统计分析,通过因子分析对游客博彩动机量表进行萃取,结果得出8个效度较好(因子符合量均在0.514~0.868之间)的成分,反映出澳门博彩旅游动机主要由该8种成分组成。第一个成分由博彩娱乐场的服务设施、环境与形象3方面内容组成,反映出访澳游客由于娱乐场的功能吸引而产生的消费动机,因此该成分属于“功能吸引动机”;第二个成分的内容为游客赢取金钱的动机,因此属于“赢钱动机”;第三个成分由放松、减压、逃离等内容组成,均表达了个体休闲放松的动机,属于“休闲动机”;第四个成分由追求

新奇感、愉悦感、刺激感等享乐方面的动机组成,因此命名为“享乐动机”;第五个成分反映了个体欲控制运气、结果等,从而形成了博彩动机,因此属于“控制动机”;第六个成分由娱乐场的美食与休闲娱乐活动(博彩、表演、购物等)内容组成,属于“美食娱乐吸引”;第七个成分由了解新知识、文化、开阔眼界等内容组成,反映了游客学习新知识的动机,据此属于“学习动机”;第八个成分由展示经历、增加交流时间、结识朋友等内容组成,因此属于“社交与声誉动机”。研究进一步通过比较游客博彩动机8个成分的因素分数权重,得出休闲动机、享乐动机、学习动机、功能吸引动机与美食娱乐吸引动机对总体动机的影响较高,赢钱动机的影响力较低。

(二) 分析结果

目前游客前往澳门参与博彩旅游的内在原因主要由休闲动机、赢钱动机、享乐动机、控制动机、学习动机、社交声誉动机、功能吸引动机、美食娱乐吸引动机。结果表明,随着体验时代的来临与休闲博彩全球化发展,人们的需求也产生多样化,以往参与博彩活动时单纯追求赢钱获利的目的已逐渐发生改变,呈现博彩动机多元化。

研究结果还揭示了,目前访澳游客正逐渐将博彩活动视为一种休闲活动,以往博彩赢利动机与参与博彩游戏的比重正逐渐下降,而更多地以体验休闲娱乐、增长见闻、感受博彩文化为动机参与博彩。然而,面对上述趋势,澳门博彩企业的大部分娱乐场没有主动积极进行应对与转型,固守以往单纯的博彩赢利模式。据2016年发布的《澳门幸运博彩经营权开放中期检讨报告》显示,澳门目前超过95%博彩娱乐场的博彩赢利收入占总收入的90%,反映出当时澳门博彩旅游发展的定位出现一定滞后,缺乏应对大众博彩游客正成为主要客源的对策,导致博彩收入持续下滑,而且,因沉迷博彩产生的病态赌徒与社会赌博化等问题有增无减,严重影响了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发展进程。

基于上述结果,澳门博彩企业应加快转型,改变单一的博彩盈利导向,推进“博彩多元化”的发展,尤其注重多元化休闲娱乐和高层次文化体验的提升,以更好地满足游客日益多样化的博彩动机。

三、澳门博彩旅游多元化发展对策

（一）以多元化体验为导向，丰富博彩企业非博彩元素

随着休闲体验时代的到来，博彩旅游成为一项体验博彩游戏、领略博彩文化，融愉悦、竞技、休闲、度假、观光、文化体验为一体的时尚多元旅游休闲活动。因此，博彩企业应时刻以游客多元化体验为导向，力求满足游客多方位的博彩动机，在供给对策方面提供多元化的非博彩元素，让游客的动机透过感官、审美、愉悦等全方位体验，得到有效满足与提升。因此，可实行以博彩为主体，融入大众休闲项目的博彩多元化对策，在调整博彩企业结构比重的同时，带动澳门相关产业的发展。比如，目前澳门大部分娱乐场的购物场所仅提供奢侈品的消费，导致不少大型娱乐场中的奢侈购物店“开业时热闹非凡，开业后门庭冷落”，更导致澳门购物业在周边特色鲜明的香港与珠海购物业的竞争下雪上加霜，建议澳门博彩企业尽快增加大众购物项目的数量，提升娱乐场购物区域的性价比，满足游客博彩休闲之余的购物等多元动机。

（二）以文化为生长点，拓展特色海洋文化

随着体验时代的来临，博彩大众游客以往的博彩赢利动机的重要性比重正逐渐下降，游客博彩动机正往多元化发展，而且更倾向于体验独特的文化，获得独一无二的主题式体验。近年来，澳门多家博彩企业正积极利用澳门中西文化荟萃一堂的优势，呈现博彩娱乐场多元化的文化主题，如威尼斯人以1:1比例打造威尼斯大运河景观，展现浓郁的意大利风情；新开业的新濠影汇以酷炫的双层摩天轮打造新奇的好莱坞影视元素等。同时，推出多项文化表演项目，如永利喷泉表演、新葡京“疯狂巴黎”表演、威尼斯人“太阳剧团”剧场表演等。然而仅仅在外观设施、表演项目等方面融入文化仍未能较好地满足游客日益丰富的深度文化体验动机，部分博彩企业打造的文化项目也并未充分挖掘澳门本土特色文化，导致游客得不到满意的文化休闲体验。2015年12月，国务院签署第665号国务院令，将澳门海域面积明确为85公里。澳门博彩旅游业可以此为契机，大力发展海洋特色文化体验项目，利用目前70%娱乐场坐落在沿海的优势，推出私人订制式

的个性化游艇文化项目，如举办“海上丝绸之路—从澳门出发”等活动，让游客在深入领略浓厚与多元的文化特色，在获得新奇丰富的文化体验同时，深刻认识澳门历史变迁与回归后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重现昔日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的繁荣场面，进澳门海洋文化魅力的传播与增强世界休闲目的地的形象。

（三）以创新为驱动，凸显个性化服务供给

澳门博彩企业需要保持服务供给的不断创新，对不同游客群体的特征，针对性地做出服务品质的提升对策与及时调整其资源投放的重心。针对青年游客较热衷于满足兴奋、新奇、刺激的动机，可通过高科技等手段塑造多种主题的如4D电影等高级游乐项目，举办万圣节、嘉年华等多种节事活动；针对中年游客大多拥有充足资金与休闲时间，其动机倾向追求多方位的体验，可在娱乐场室内或室外打造集博彩、购物、美食、康体活动等元素的主题步行街；针对老年游客收入较低，主要动机为休闲放松的特点，可提供专门的免费休息区域，营造娱乐场休闲舒心的环境氛围，同时提升服务人员的服务态度，尽力满足该群体的特殊需求。

（四）以区域合作为依托，打造澳门与珠海横琴联合开发休闲旅游的平台

基于《规划》提出的澳门5年内“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并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实施背景，目前越来越多的商务旅客来到澳门参加各类商务休闲活动，将成为澳门博彩多元化发展的重要客源与契机。横琴毗邻澳门，是国家级自贸区，从发展战略区位上具备聚集商务、生态、旅游、贸易等的优势。预计2017年港珠澳大桥开通后，横琴将通过高速公路与大桥相接，国内外的资本与游客能够更为畅通地来往于珠海、澳门与香港。澳门要把握这一发展机遇，充分发挥澳门目前高端酒店群聚效应的先天优势，瞄准来横琴参加商务等活动的旅客，加强与横琴共同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澳门也要以国际化城市的自身优势，促进横琴新区向国际化发展，加强跨区域合作，实现资源与服务的强强联合，共同申办或承办国际性、有影响力的商务会展活动。为商务会展人士提供完善的商务休闲产品与设施，使澳门主动成为横琴特区商务旅游休闲的连接区，共同塑造澳门和横琴商务休闲旅游目的地，构建“澳门—横琴”融合互补的“世界旅

游休闲中心”，促进澳门博彩多元化的转型。

（五）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打造负责任博彩文化

澳门博彩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还有赖于负责任博彩文化的进一步推广。博彩业的高速发展，伴随而来的是问题博彩情况的日益增加，社区博彩化的日益严重，澳门社会整体风气的日益恶化。这必然影响澳门社会多方面（生活、经济、教育、安全等）的发展，反过来制约博彩企业，甚至澳门世界休闲旅游中心的健康发展。

随着体验时代的来临，博彩大众游客的博彩赢利动机正逐渐下降，博彩动机往休闲、享乐、学习等多元化发展的客观现实。因此，澳门政府与博彩企业要以此为契机，倡导推广负责任博彩的文化，打造负责任博彩的市场，建立负责任博彩市场行业标准，形成负责任博彩的政府、社会、行业三位一体的协同管理机制。为游客创造安心休闲的享乐环境，提升澳门博彩娱乐场的整体形象，更可靠地保证澳门博彩旅游业多元化进程中的健康、繁荣与可持续发展，也进一步推动澳门世界级休闲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赵霞,姜秋爽. 体验经济时代休闲旅游的多元发展趋势[J]. 财经问题研究, 6, 140-145, 2013.
- [2] 阮建中. 欧美博彩旅游业研究述评[J]. 旅游学刊, 25(9), 89-95, 2010.
- [3] Tsai, H., Lo, A., & Cheung, C. Measuring Customer-Based Casino Brand Equity and its Consequences[J]. Journal of Travel & Tourism Marketing, 30(8), 806-824, 2013.
- [4] 郝雨凡,吴志良. 澳门经济社会发展报告(2010-2011)[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 [5] 澳门博彩监察协调局. 澳门全年博彩毛收入, 未出版之统计数据, 取自<http://www.dicj.gov.mo/web/cn/frontpage/index.html>, 2016.
- [6] 林双凤. 澳门博彩业发展的社会问题分析[M]. 广东社会科学, 2, 213-220, 2012.
- [7] 澳门大学. 澳门幸运博彩经营权开放中期检讨: 经济、社会、民生影响及承批公司营运状况研究报告[R]. 澳门大学博彩研究所, 2016.
- [8] 雷超,卫海英. 澳门零售业的品牌推广战略[J]. 现代管理科学, 11, 25-26, 2010.
- [9] 杨道匡. 围绕港珠澳大桥建成通行的三点思考[J]. 城市规划, 38(21), 49-51.
- [10] Breen, H., & Gainsbury, S. Aboriginal Gambling and Problem Gambling: A Review[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and Addiction, 11, 75-96, 2013.

Transition of Macao's Gambling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leisure experience Age

Zeng Tao

(Aculty of Management of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Guangdong, Guangzhou 510665)

Abstract: Under the coming of the experience age, the gaming industry in Macau is revealing more and more contradictions. Firstly, people are desirous of more and more different types of leisure activities from gaming patterns of consumption; secondly, the gaming industry is confronted with fierce competition both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 thirdly, the prosperity of Macao's gaming industry has unavoidably brought about negative effects which has resulted in severe social problems. Based on the reasons mentioned above, by taking perspective of gaming motivation, the present paper show that, the importance of gaining profits motivation of tourists in casinos is decreasing. From the present findings, Macao's gaming enterprises should advocate the tactics of gaming tourism diversified transition so as to create a better construction of Macao as a world-class leisure center.

Key words: Leisure and Experience; Gaming Tourism; Gaming Motivation; Diversified

(收稿日期: 2016-07-17 责任编辑: 廖令鹏)

【开放论坛】

资本账户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

公衍照

(山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山东 淄博 255012)

【摘要】 资本账户开放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 但人民币国际化不能成为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依据。盲目加快资本账户的开放, 不仅对人民币国际化的作用有限, 而且有害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面对全球资本大规模无序流动的现实, 放弃资本账户完全开放的目标, 坚持开放和管制的相机抉择, 加快国内经济转型和产业调整, 完善国内市场经济体制, 实现实体经济的持续发展, 才能更好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关键词】 人民币国际化 跨境人民币结算 离岸人民币市场 资本管制

【中图分类号】 F8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 (2016) 05-0052-05

【作者简介】 公衍照 (1967—), 山东蒙阴人, 山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国际货币与金融。

自2009年来, 人民币跨境结算不断推进, 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取得了突破。由此, 不少人对人民币国际化表现乐观, 很多人提出加快资本账户开放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此种观点十分有害。

一、货币国际化与资本账户管制

(一) 货币国际化与国际货币

货币国际化是指一国货币在国际范围内逐步发挥计价、结算和价值储藏职能, 成为各国贸易和投资的计价、支付货币, 以及私人机构的价值储藏和官方国际储备货币的过程。一国货币国际化是一国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在世界范围内崛起的漫长过程, 如英镑、美元, 而欧元也不是一步到位的, 它是从欧洲货币单位甚至可以说是德国马克演变而来。历史经验表明, 一个主权货币要么是通过实体经济发展和金融深化来推进货币国际化, 如英镑;

要么是通过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安排来实现本币国际化, 如布雷顿体系下的美元; 要么是通过区域货币制度安排来实现, 如欧元。可以直观判断, 人民币国际化将沿用第一种模式, 而受既有国际货币的网络外部性、历史惯性以及国际政治因素的制约, 人民币国际化将是一个渐进过程。

国际货币的最基本的特征有三, 一是可自由兑换; 二是成为交易双方之外的第三方货币而被广泛使用, 即所谓的载体货币 (Vehicle Currency)。以美元为例, 在全球美元外汇交易中接近80%属于“第三方交易”。从这一点上讲, 人民币跨境结算只涉及中外交易双方, 与此相差甚远; 三是作为各国重要的储备货币。从国际货币层次上看, 居于核心的是国际核心货币, 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最重要的计价、结算和国际储备功能, 与该货币之间的汇率是各国最重要的双边汇率, 或者是各国汇率安排中的锚货币或参考货币, 而且拥有最大份额的离岸货币市

场，如美元；其次非核心的国际货币，如欧元、日元和英镑等。从市场演进的逻辑和市场对效率的选择角度，国际核心货币只有一个，没有其次。

（二）资本账户放开与货币国际化的关系

从政策的结果上论，一个完全国际化的货币必然是可自由兑换货币，资本账户必然放开。但是，资本账户放开的货币未必是国际化货币，全球实现资本账户自由化的货币比比皆是，国际货币却屈指可数。所以，资本管制不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障碍，通过进一步放开资本账户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逻辑上讲不通，如果人民币国际化的其他条件真正成熟，资本管制也早就没有必要了。

从政策的动力机制上看，前者是以供给为导向的，后者则是以需求为导向的，即前者是一国根据国情而主动决策的过程，后者则主要是由非居民的需求偏好决定的，虽然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延缓或者加速这一进程。资本账户开放和货币国际化都强调资本的自由进出，强调货币的自由兑换，但后者强调的是实现本币的境内外输出输入，特别是本币的境外循环，而这主要取决于非居民的需求。

从过程上讲，货币国际化进程并不以资本账户的完全放开为条件。因为资本账户的自由化，不仅服务于货币国际化进程，而且还受制于一系列国内宏观微观经济条件，事实上也往往滞后于货币国际化的需求。历史经验表明，在货币国际化初期，一国也往往伴随着必要的资本管制，只是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资本管制变得越来越无效或没有必要，一国当局便顺势取消。相反，如果以货币国际化为导向，不适当的加快资本账户自由化，结果适得其反，损害一国货币国际化。

二、资本管制视角下的跨境人民币结算

（一）跨境人民币结算是有条件的资本账户开放

跨境人民币结算和离岸人民币市场本质上就是资本账户的开放，属于货币自由化措施。它允许资本跨境进出，但必须是通过人民币的形式，而不是通过其他货币如美元等形式，而且必须服务于跨境贸易和直接投资。由此，境外输入的人民币总量是可控的，因为这些人民币必定是先前货币互换和贸易投资结算输出的。如果说，以人民币形式的资本

流动对国内有什么冲击的话，理论上仍是可控的。

（二）人民币跨境结算和资本项目开放之间有很大的替代性

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项目下，境外短期资本可以更方便地利用贸易账户进出，如人民币升值期间或升值预期下，高报出口/低报进口人民币价格可实现短期资本的流入，人民币贬值期间或贬值预期下，则相反；而离岸人民币市场对于短期资金进出国内提供了更直接的途径。因而跨境结算尤其是间接投资的人民币跨境结算本质上就是资本账户的双向放开，境外人民币市场越大，短期资本进出国内的规模就越大，因此人民币跨境结算实质上使原有的资本管制部分失效。

（三）人民币跨境结算和离岸人民币具有无法克服的矛盾

跨境人民币结算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措施，其实质是基于政策推动的，并在一定的资本管制条件下实施的。其原因是国内市场化改革远未完成，特别是利率市场化和汇率机制仍不完善，而且国内资本市场依旧十分幼稚和脆弱。毋庸置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境内外人民币利率和汇率必然存在差异，并随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项下的虚假套汇，以及离岸和在岸人民币市场间的套利和套汇将无法避免，人民币国际化随着在岸和离岸之间的利率和汇率波动，会出现加快和延缓的反复循环，这种状况将难以避免。

众多的研究表明，以人民币输出入指标衡量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与延缓，与人民币贬值与升值导致的贸易结算货币不断转化直接相关，也与在岸与离岸人民币市场之间的套利和套汇活动相关，很难说人民币国际化是由非居民真实的贸易和投资需求推动的。如果人民币升值或存在升值预期下，人民币的吸引力增强，跨境结算更多的会出现在进口端，人民币的输出增加而输入减少，人民币国际化表现为加快，但在我国目前国际收支整体保持顺差的条件下，这必然导致我国国际储备增加，而人民币升值将导致国际储备价值缩水，这种赔本赚吆喝的货币国际化动力很难持久。而在人民币贬值期间，跨境人民币结算更多的出现在出口端，人民币输入增加而输出减少，与人民币国际化初衷相悖。

（四）目前进一步放松资本管制对人民币国际化作用有限

1. 人民币跨境结算及离岸人民币市场等措施不等同于人民币国际化

准确地说，人民币跨境结算实质上是跨境结算的人民币化，是基于供给层面，而非基于非居民需求层面的制度安排，是为摆脱货币错配对我国涉外经济的掣肘所主动采取的措施。作为供给层面的制度安排，第一步是官方之间的货币互换，具体的实施是在现有的资本管制条件下进行的，而且是服务于中方与相关国家之间双边贸易和投资，至于实际交易中人民币是否作计价和结算货币，则取决于中外交易双方，更可能是外方的选择。目前，人民币要成为各国经济交易中普遍使用的“载体货币”的条件并不完全具备，尤其是在欧美国家市场，人民币作为计价和结算货币的意愿很低。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建设也依旧是政策推动的，非居民投资需求仍不是基础的推动因素。从参与市场的主体上看，人民币债券的发行主体由最初的内地金融机构扩大到非金融企业及国际金融机构，但发行主体中80%是大陆居民。历史经验表明，离岸市场建设与发展不是货币国际化的因，而是果。由于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基于政策推动，人民币离岸市场无法支撑起足够体量的人民币境外循环，越来越呈“纯往返型”离岸市场特征（本国居民之间借助离岸市场实现资金融通），而且相关政策偏重于人民币回流，这和典型的“纯离岸型”（资金的来源方和运用方都是非居民），和“国际借贷流出型”（资金从居民流向非居民）离岸货币市场完全不同。

2. 人民币跨境结算下的人民币国际化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从人民币的输出资本账户机制上看，根据央行统计，人民币的输出是依靠跨境贸易结算中的对外支付，即进口实现的，资本账户下人民币基本上是净输入。概括地讲，人民币是通过经常账户实现货币输出，资本账户实现货币输入。理论上，如果要在我国对外贸易和直接投资中完全采用人民币结算，人民币通过经常账户输出、资本账户输入的模式必然导致我国国际收支结构呈现： $-CA+KA$ （不含储备变动），即经常账户逆差、资本金融账户顺差。然而，依靠金融账户持续为经常账户融资是不可持续的，这样的国际收支结构长期必然导致一国货币贬值和信誉扫地，不是金融危机就是经济危机，货币国际化根基就垮掉了，事实上我国目前不会容忍长

期大规模的经常账户赤字。这样的情况只在一种条件下可行，即金本位破产进入信用货币时代后，一国完成货币国际化并成为国际核心货币后的美元，但长期看美元仍然受到这个规则的约束，其表现就是“特里芬难题”。货币国际化的典型模式是通过资本账户实现货币输出，经常账户实现货币输入，国际收支必然是 $+CA-KA$ （不含储备变动），历史上的英镑、早期的美元、后来的日元和马克概莫能外。

3. 资本账户的进一步开放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实质作用有限

因此，对人民币跨境结算不要抱有过高的期待，而资本账户的进一步开放对人民币国际化也不会带来实质的推动作用。从人民币国际化的视角下看，再加快资本账户的开放，唯一的理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市场需求（非居民需求）已经超越目前的人民币跨境结算所能提供的发展空间，资本管制已成为人民币输出入的主要障碍，这显然不是事实。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列出的资本项目40项中，我国已经开放了35项，其他5项涉及短期资本流动的项目，虽有管制但没有一项是完全封闭的。可以断定，在我国国内金融市场建设滞后，相关配套改革未完成之前，再加大加快资本账户的开放步伐，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人民币国际化不但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反而大大刺激了短期资本投机，造成利率、汇率的无序波动，给国内经济造成极大的干扰，增加宏观调控的难度。

三、人民币国际化不能主导资本账户的进一步开放

（一）人民币国际化不可大跃进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的制造业、对外贸易和投资在世界中的比重远没有达到英镑和美元称霸时的水平，对外开放面临着新的挑战。从内外部因素看，人民币国际化短期内难有实质作为，我国央行大量持有美元储备的局面在较长时期内难以改变，对人民币国际化抱有过高期望，甚至以替代美元为目标的国际化，都是不合实际的，而以资本账户开放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是错开药方。

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远未完成，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的差距，国内经济失衡问题依然严重，

产业结构、地区结构以及收入分配失调，服务业滞后，就业压力依然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人口老龄化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于社会发展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制造业虽获得巨大发展，但在国际分工中未占据产业链高端，比较优势在不断弱化，基于出口和粗放式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还未根本改变；经济增长与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依旧突出，可持续性发展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更重要的是我国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宏观经济的调控机制并不完善，一些重要的生产要素和公共产品的市场化并不彻底，利率市场化以及人民币汇率机制建设尚在完善，资本市场无论是规模还是质量，距离成熟的市场相距甚远。中国的根本问题依旧是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人民币国际化并不能为解决以上问题提供直接的帮助。很难想象在以上问题得到解决前，人民币国际化会有多大的发展。

从外部看，人民币国际化面对诸多挑战。首先，人民币面对的既有的国际货币的寡头格局，除非发生颠覆性的技术革命和重大的国际政治冲突导致国际政治格局的改变，国际货币体系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的对外经济不可能摆脱美元的影响，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国际货币演变的历史经验表明，无论是货币霸权的更迭抑或一国货币的国际化都要经历漫长演变过程，英镑被美元所替代，以及后来的马克和欧元，都是经历了几十年，日元相对时间短一些，但是正是日元国际化中急功近利导致日元国际化的失败。其次，除了经济因素之外，国际货币的网络外部性和历史惯性，货币霸权国对新生国际货币的打压，也是不可忽视的障碍。当今美国采取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在地缘政治上不断挤压中国的战略空间，在经济上通过主导经贸规则（如TPP以及TTIP等）来围堵人民币，对人民币国际化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二）以人民币国际化倒逼资本账户加快开放将加剧内外均衡冲突

克鲁格曼之三元悖论表明，开放经济体系只能在货币政策自主、资本流动和汇率稳定之间三选二，而只有在资本管制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汇率稳定及货币政策较大程度的独立性，而这正是中国目前及未来相当一段时间所必须的。放松资本管制，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是人民币国际化之必须，但却与中国目前及未来相当长时期国内经济发展的要

求冲突。面对经济转型的艰巨任务，我国更需要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能力，减少外部经济冲击。而人民币国际化的加快以及资本账户的放开，首先是扰乱了国内货币供给和利率政策，其次是导致汇率的双向波动将严重干扰我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甚至出现过国际收支的大幅度波动；而价格、利率以及汇率的波动将大大刺激对实体经济毫无意义的投机，尤其是在转型期，缺乏经济拉动因素、实体投资乏力的情况下，必将加大经济风险而损害真实资本的积累，最终销蚀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2015年以来欧美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出现明显的分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面临更多困扰。随着美国货币政策的预期收紧，我国将面临资本外流的压力，人民币将处于贬值趋势或贬值预期下，不但人民币跨境结算可能出现逆转，国内资本市场很可能发生强烈震荡。201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以及我国国际储备的波动深刻佐证了这一点。为此，资本账户不但不可加快开放，反而应该适当收紧。

（三）资本账户加快开放带来巨大的潜在风险

上个世纪80年代，短期资本大规模流动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经济增长乏力下主要国家货币政策滥用导致信用膨胀和投机的泛滥，成为全球和各国经济稳定的重大威胁。短期资本在地缘政治和频繁多变的政策的刺激下横冲直撞，一些国家往往处于资本流入催生资产泡沫、资本流出导致泡沫破裂的循环之中。资本管制的盲目放松结果往往是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发展中国家往往沦为西方金融资本剪羊毛的对象。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历次危机深刻揭示了资本账户开放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因果联系，也深刻表明了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带来的风险和收益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性。面对觊觎中国经济增长红利而虎视眈眈的金融大鳄，我们应该做的不是加快资本管制放松，而是扎好篱笆防患于未然。

资本账户的基本管制之地位应高于人民币国际化，合理有效的资本管制应是我国长期的政策选择。要根据具体的资本流动项目和性质，开放与管制相结合，甚至必要时政策可以完全逆转。事实上，过去倡导资本自由流动的IMF，近年来认为资本账户管制应该与宏观经济政策、宏观审慎监管一起，构成新兴市场国家管理资本异常流动的工具箱。而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完全开放资

本账户的国家又重启资本管制，如巴西、韩国等，值得我们深思。面对高度一体化和越来越金融化的全球市场，资本账户管制政策作为我国应对外部冲击的终极手段，在资本管制政策上要坚持自主、有序与可控的原则，宁可慢一点甚至保守一点，万不可激进而冒险。

四、总结

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把货币国际化作为一国发展的重要目标。不顾宏观经济条件，以人民币国际化为导向开放资本账户是非常危险的。人民币国际化必须以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为依托，不能制定不切实际的目标。就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的动因来考察，恰恰是以往过度依赖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造成了中国较高的对外依存度，凸显了货币错配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制约作用，从而强化了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强烈需求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动机，但这一切都是在我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未实现根本改变，以及其他国内经济条件和制度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发生的，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早产儿”，而人民币跨境结算只不过是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下我国的一个次优选择。

人民币国际化不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良方，没有国内经济条件支持的人民币国际化也是不可持续的。要从中国经济发展总体战略审视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账户的开放，将国内经济增长、经济金融安全和人民币国际化以及资本管制政策统筹考虑，不要舍此求彼；要坚持资本管制和放松结合，确保我国经济安全，实现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从而更有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全方位的开展跨境结算的实质意义不大，加快资本账户开放也不是明智之举。目前的跨境人民币结算应该结合一带一路战略，立足于构建我国区域经贸网络、推动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装备出口和投资、缓解过剩产能为国内经济调整创造空间。中国经济面临的种种问题，诸如过高的贸易依存度、国际收支失衡以及国内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乏力，应当着眼于内部政策的调整，特别是要大幅消除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提高工资水平，即通过内部升值来逐渐平衡国际收支，降低对外依存度并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作用；长期看，建立以创新驱动型的发展模式，深化市场化改革，稳步推动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完善资本市场，实现区域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从而增强中国经济应对内外冲击的弹性，资本账户的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就顺理成章。

[参考文献]

- [1]吴念鲁,杨海平,陈颖.论人民币可兑换与国际化[J].国际金融研究,2009.11:4-12.
- [2]曹玉瑾,于晓莉.主要货币国际化的历史经验[J].经济研究参,2014.9:43-59.
- [3]戴晓兵.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业务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探析[J].国际金融,2013(12):49-51.
- [4]张明,何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在岸离岸套利现象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12(10):47-54.
- [5]牛薇薇.完善我国跨境贸易RMB计价结算的理性思考[J].西南金融,2013.11:11-14.
- [6]殷剑峰.人民币国际化：“贸易结算+离岸市场”还是“资本输出+跨国企业”？——以日元国际化的教训为例[J].国际经济评论,2011.4:53-68.
- [7]张明.谨慎推进资本账户全面开放[J].金融博览(财富),2015.09:18-19.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Opening of the Capital account and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Gong Yanzhao

(Business Schoo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ibo Shandong 255012)

Abstract: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is prerequisite for currency internationalization, but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MB cannot provide good basis for speeding up opening of the capital account. Aggressively speeding up the opening of capital account will not be only of limited positive effect, but also likely detrimental to 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RMB. Facing the reality of disorderly flows of large scale global capital, to ensure China's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ecurity, we should give up the target of complete liberalization of capital account while sticking to discretionary rule in the option of liberalization and regulation. Only through the domestic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improving the market economy system, can we achiev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to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MB.

Key words: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RMB cross-border settlement; offshore RMB market; capital control

(收稿日期:2016-06-16 责任编辑:垠喜)

【开放论坛】

中外绿色债券发展比较

张浩良, 安然

[广东省产业发展研究院, 广东 广州 510030;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 广东 深圳 518029]

[摘要] 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日益关注绿色债券, 将绿色债券纳入到本国绿色金融政策体系之中。中国绿色债券市场起步晚, 但发展迅速, 市场前景广阔。中外绿色债券在标准体系、项目认定、信息披露、外部认证、激励措施等方面存在差异。为推动中国绿色债券发展, 本文就项目口径认定、绿色认证体系、信息披露、激励措施、发行主体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 绿色债券 绿色金融 可持续发展 国际比较

[中图分类号] F8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6)05-0057-05

[作者简介] 张浩良(1987—), 广东佛山人, 广东省产业发展研究院, 经济师, 注册会计师(非执业), 研究方向: 投资经济、产业金融; 安然(1982—), 河南洛阳人,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 区域经济、海洋经济。

全球气候变化将进一步导致碳排放增加或气温升高, 加大气候投资刻不容缓。据国际能源署(IEA)估计, 为使全球步入气温上升不高于2℃的轨道, 未来能源供应和能源效率领域的累计投资需求高达53万亿美元^①。绿色经济正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 特别是巴黎气候大会目标的实现很大程度上要仰仗绿色金融支持。近年来, 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不遗余力地推动绿色债券市场发展, 全球绿色债券发行规模呈爆发式增长。在国内, 中央明确将绿色发展列入五大发展理念之一, 相应地为绿色发展提供支持的绿色金融被赋予更多的责任和使命。作为服务绿色经济的重要金融工具, 中国发展绿色债券正当其时。

一、中外绿色债券市场发展的最新动态

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BI)对绿色债券的统计口径有狭义、广义之分, 狭义绿色债券仅指贴标绿色债券, 其资金用途具有明确的“绿色”属性, 所筹资金全部投向“气候债券分类方案”所认定的项目或资产; 在广义概念中, 涵盖所有与改善气候、保护环境相关的债券, 亦称气候相关债券。

(一) 国际绿色债券市场发展历程与特征

从整体规模看, 经历从无到有的爆发式发展。自全球第一只贴标绿色债券于2007年由欧洲投资银行(EIB)成功发行以来, 全球绿色债券市场发展先

① IEA.(2014). World Energy Investment Outlook. www.worldenergyoutlook.org/investment.

后经历了前期的温和发展阶段、2013年以来的迅速发展阶段。2007~2015年，全球贴标绿色债券累计发行1018亿美元，9年间增长了40余倍；特别是近两年发行规模在高位运行，2014、2015年分别发行了370亿、418亿美元的贴标绿色债券。广义绿色债券（气候相关债券）市场规模更为庞大，根据气候债券倡议组织估计，全球气候相关债券市场规模接近6000亿美元，包括407个发行人所发行的2769只相关债券；其中贴标绿色债券占比不到7%。

从发行主体看，发行人类型日趋多元化。贴标绿色债券发行主体范围从最初的多边或区域性开发银行逐步拓展至地方政府、商业银行、企业等。多边或区域性开发银行仍然是重要的主导力量，2007年以来累计债券融资量占比过半，排在前三的分别是欧洲投资银行（116亿美元）、世界银行（80亿美元）、德国复兴信贷银行（40亿欧元），亚洲的一些开发银行如亚洲开发银行、日本开发银行等也开始尝试发行贴标绿色债券。2014年中期以来市政绿色债券发行规模大幅扩大，如麻省理工学院、辛辛那提大学等发行用于绿色建筑项目的绿色债券，以及华盛顿、芝加哥、印第安纳等州市市政部门发行的水资源绿色债券。自2013年起以企业为主体发行的绿色债券规模迅速增长，当前与开发银行绿色债券规模相当。商业银行也开始成为绿色债券市场的新兴主体，如法国农业信贷银行、挪威银行、美国银行、印度Yes Bank、澳大利亚国民银行、澳新银行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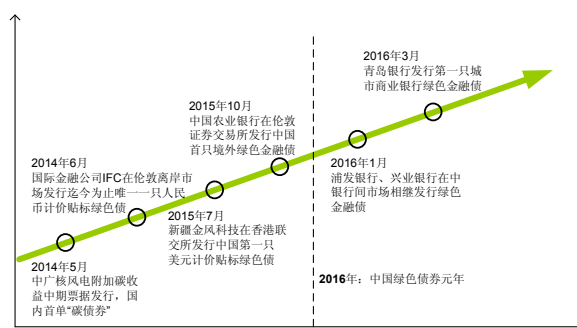
从资金投向看，运输和能源占据主导地位。从广义绿色债券看，运输主题债券（4188亿美元）发行规模最大，市场份额高达70%；能源主题债券（1184亿美元）作为第二大债券，占据20%的市场份额；建筑与工业主题债券（196亿美元）是第三大债券；水（32亿美元）、废弃物与污染（71亿美元）、农林（23亿美元）等其他主题也是十分重要的投资领域。从贴标绿色债券看，可再生能源领域集中了超过1/3（38%）的绿色债券资金，2015年至今，维斯塔斯风力技术集团（5亿欧元）、Terraform Power（8亿美元）、德国复兴信贷银行（6亿澳元）全部投向于可再生能源领域；其他依次是建筑与工业（27.5%）、运输（10.2%）、水（9.7%）、废弃物与污染（6.2%）、气候适应（4.3%）、农林（3.9%）。从贴标情况看，水、建筑与工业两个领

域的贴标绿色债券占比较高，分别为98%和45%，其他领域的贴标率偏低。

从发行国别看，新兴经济体市场潜力巨大。从全球气候相关债券的国别分布看，排在前五的依次是中国（33%）、美国（12%）、英国（9%）、法国（9%）、超国家组织（6%）。近年来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致力于推动绿色债券加快发展，其中中国以33%的市场份额占据首位。2015年印度Yes Bank发行100亿印度卢比（1.615亿美元）的贴标绿色债券，印度由此成为新兴经济体中首个发行贴标绿色债券的国家。贴标绿色债券的国别分布主要集中在美国和欧元区，这是由于新兴经济体国家发行的气候相关债券标准化和透明度偏低，很难被第三方机构认定为贴标绿色债券。

（二）中国绿色债券市场发展状况与前景展望

绿色债券作为中长期直接融资工具，超过六成是10年期以上债券（万志宏、曾刚，2016），能够较好地规避过去绿色信贷的期限错配风险，是中国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重要领域。近年来，中国绿色债券市场处于起步阶段，但发展迅速。自2014年以来，中广核风电、新疆金风科技、中国农业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青岛银行等相继在海内外成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图1 中国绿色债券发展实践的主要事件

功发行各类绿色债券，涉及不同发行主体、不同计价货币、海内外两个市场、贴标与未贴标等，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应。随着2015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相继出台绿色债券发行的规范性文件，国内绿色债券市场正式启动，贴标绿色债券发行将掀起新一轮热潮。

我们可从供需两侧来评估中国绿色债券市场前景。从需求侧看，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十三五”中国将进入多数污染物排放“峰值

期”、生态环境质量转变“拐点期”，节能环保、碳减排等绿色领域所催生的绿色债券市场前景广阔。国研中心与IISD的合作研究显示，2015~2020年中国绿色产业年投资需求约为2.9万亿元，而中央及地方财政资金仅能覆盖10%~15%的绿色投资需求；马中、陆琼等（2016）对2014~2020年中国绿色金融资金的有效需求进行高、中、低三种方案的情景预测，“中方案”情景下的年均资金需求达2.8万亿元。上述两种预测方法得出的结果十分接近。从供给侧看，由于绿色债券募集资金首要用于贷款再融资，决定绿色债券发行的潜在关键因素是未偿清的、可用于发行绿色债券的绿色信贷数额，目前国内这一规模约5.3万亿元，包括：工业节能环保（4576亿元）、自然保护、生态修复及灾害防控（1716亿元）、垃圾处理及污染防治（2860亿元）、可再生能源及清洁能源（1.6万亿元）、绿色交通运输（2.75万亿元）^①。绿色贷款再融资的潜在规模也催生了国内绿色债券市场庞大的发展空间。

二、中外绿色债券的政策框架比较

（一）标准体系

国内外绿色债券发展主要呈现两种不同的路径导向，相应地形成各自的与绿色债券相关的标准体系。国际上两份主要标准文件——绿色债券原则（GBP）^②和气候债券倡议组织标准，是由市场主体自发形成、自愿参与，在参与主体日益广泛、市场实践日趋成熟的基础上由发行方、投资方、承销机构共同建立的自愿准则，体现的是“自下而上”的市场导向。国内决策层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推动绿色债券发展，由监管部门制定规范性文件明确项目范围、资金管理、信息披露各环节，促进绿色债券市场规范、有序发展。2015年底，中国人民银行第39号公告及相配套的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简称《目录》），成为国内绿色债券发行的重要规范文件；国家发展改革委《绿色债券发行指引》（简称《指引》），规定了监管权限内企业绿色债券对应的绿色项目范围，并附有相关激励措施；另外，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证监会正在加快研究制定非上市公司绿色债务融资工具业务指引、绿色公司债券指引，将在未来合适时机公开发布。

（二）项目认定

国际、国内的主要标准体系在绿色项目认定上存在大量重叠，但各有侧重。绿色债券原则概括性地列明八个类别的绿色项目；气候债券倡议组织标准主要对绿色债券原则下的项目分类（尤其是低碳领域）进行了细化，是细分程度最高的国际标准体系。从国内看，《目录》、《指引》的项目分类，以绿色债券原则为参照，更加体现中国的产业特点、立法原则、行业分类习惯等实际，同时强调所支持项目类别的动态开放性（王遥、徐楠，2016）。与国际标准相比，国内标准的最大区别在于：第一，绿色债券原则、气候债券倡议组织标准更侧重项目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削减、气候变化适应等领域，均将化石能源相关项目排除在外；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能源消费结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故《目录》、《指引》准许绿色债券涉及化石能源相关领域，将煤炭和石油的高效清洁利用作为重点扶持的绿色项目。第二，作为自愿性准则，国际标准并未涉及具体的技术标准；《目录》依照国家标准和行业政策，制定了具体、严格的技术标准，包括节能技术改造项目的技术类别、新能源开发项目的能源转化效率等；《指引》立足于国家发展改革委的部门职能，提出了一些综合性开发项目，包括绿色城镇化项目、低碳发展试点示范项目、低碳产业项目、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实验项目。

（三）信息披露

绿色债券原则对信息披露做出限定，要求发行人提供至少每年一次的项目清单（包括项目信息、资金分配、环境效益等）；建议使用定性指标的描述，如可行，对温室气体减排量、清洁能源惠及人口等环境效益指标作出定量描述。与绿色债券原则高度一致，人民银行《公告》要求发行人披露每季度露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等信息，但信息披露要求相对简略，信息披露的标准化、规范化水平偏低。相较而言，气候债券倡议组织标准未明确发行人的信息披露义务，更多强调的是发行人自主信息披露，在实践中，气候债券倡议组织开展的认证服务及相应的专项标准应用，均以自主信息披露信息为基

数据来源：银监会绿色信贷统计表11个分类项目的绿色信贷数据以及Chan & Kuang（2015）中提及的7个新兴产业的绿色信贷数据。

《绿色债券原则》（Green Bond Principles, GBP）是在2014年由花旗银行、摩根大通银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和美银美林共同发起制定的，现在由国际资本市场协会主导，并于2015年3月出台第二版。

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指引》也未对信息披露作出限定要求。

（四）外部认证

除《指引》未提及外部认证外，其他标准均提出鼓励第三方认证的方式来甄别绿色债券。绿色债券原则列举的外部认证类型和层次包括：出具“第二意见”（Second Opinion）^①、审计或第三方认证，来确保绿色债券发行及后续资金使用符合绿色债券定义和要求。气候债券倡议组织作为第二意见机构，也可开展认证程序监督。人民银行《公告》鼓励发行人提交独立第三方机构的认证评估报告，在债券存续期内出具每年度一次的第三方评估报告，对绿色金融债支持绿色产业项目发展及其环境效益等开展持续跟踪评估。

（五）激励措施

国际市场自发形成的绿色债券原则、气候债券倡议组织标准等共识性约束，没有涉及激励措施；与之相比，国内绿色债券标准体系“自上而下”的政策导向，必须要有激励措施的配合实施。人民银行《公告》将商业银行发行的绿色金融债列入相关货币政策操作的抵（质）押品范围，能够增强国内绿色金融债的市场认可度、市场流动性。《指引》则从发行准入环节、结构设计等提出激励措施，包括简化债券审核程序、放宽准入条件，提高资金使用、期限设计、还本付息等环节的灵活性。《公告》、《指引》均鼓励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出台支持绿色债券发行的优惠措施；均鼓励发展各类金融机构、证券投资基金、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绿色债券投资者群体。

三、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主要结论

中国发展绿色债券正开展一系列有益尝试，已具备充分的发展条件。在全球绿色债券市场蓬勃兴起之际，受决策层“自上而下”政策推动，中国绿色债券也开始崭露头角。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受资本市场发展滞后、金融创新动力不足、专业人才匮乏和中介机构配套不健全等市场性因素制约，中国绿色债券市场的发展还不十分成熟，但考虑到国内绿色经济转型的庞大资金需求，未来中国绿色债券发展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近年来人民银行、国

家发改委等部门相继出台绿色债券发行的规范性文件，但在顶层设计和具体实施规则上，缺乏有效衔接，债券市场的分割、监管部门的不同，也对绿色项目、绿色债券的认定和相关业务指引预期等均造成较大的困惑。

（二）政策启示

一是统一项目认定口径，促进国内绿色债券标准规范“互认互通”。通过国际合作协议等方式促进《目录》、《指引》等国内规范性文件与国际标准接轨，能够增强国内绿色债券的流动性，促进中国在国际绿色债券市场的话语权进一步提高。由于国内债券市场分割，绿色金融债、绿色公司债、绿色企业债、非金融企业绿色债务融资工具等债券品种，对应不同的监管部门或自律部门，在项目认定口径上均有差别，且缺少互相的认可，对发行人、投资者等均造成一定困扰。建议以人民银行牵头，加强绿色债券相关监管部门或自律部门的沟通合作，逐步建立起国内统一的绿色债券项目分类规范，提高国内标准的权威性。

二是发展绿色认证体系，发展具有专业能力、国际化的第三方认证机构。绿色债券发行涉及较复杂的技术领域，其发行认证及存续期内所开展的可描述、可量化的环境效益评估均需要专业技术评估支持。根据王遥等（2016）的研究，约20%国内债券具备贴上绿标的条件，但国内尚未有专门开展绿色认证业务的独立第三方机构。亟需在国内建立起相对完善的绿色认证体系：一方面，明确准入标准，加快引进国际化独立认证机构；另一方面，依托国内科研院所和高校，扶持发展本土第二意见机构、第三方认证机构，提高本土独立机构接轨国际专业的专业评估能力。

三是提高信息披露质量，重视对发行人“洗绿”行为的有效监管与约束。规范化的信息披露制度是绿色债券市场有序发展的必要条件。建议有关监管部门除继续完善绿色债券发行业务指引外，还应研究制定全周期的信息披露指引，改变目前重事前、轻事后的现象。市场主体是逐利的，很难排除个别非绿色项目以绿色债券名义融资，或在债券发

① 独立的专业机构出具的对募集资金使用方向的绿色认证，即“第二意见”。国际上专业提供“第二意见”的机构有四类：（1）学术类机构，如国际气候与环境研究中心（CICERO）；（2）传统的环境社会风险管理咨询机构，如VIGEO；（3）传统认证机构，如DNLGL集团；（4）评级机构，如OEKOM研究中心；（5）传统审计机构，如毕马威、安永等。

行后改变资金用途以支持污染性项目，这种现象一旦累积有可能造成“劣币驱逐良币”后果。为此，针对发行人减少或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应当建立起责令整改、罚款、监管谈话、公开谴责、通报批评等多种非行政处罚性监管措施，严重情形可考虑暂停债券上市交易。

四是出台差别化激励措施，从发行、认购等环节激发绿色债券市场活力。绿色债券因其特殊性，如评估认证、材料审核和信息披露等方面的要求有别于普通债券，额外增加绿色企业的融资成本、时间成本，挫伤了企业发债积极性。建议国家部委、地方政府上下发力，制定差别化激励措施，推动绿色债券市场有序启动。鼓励地方政府通过担保补贴、贴息等手段，如设立地方绿色债券担保基金，支持绿色债券发行。财政部对认购绿色债券的机构投资者，参考执行与购买国债类似的免税政策，即利息收入部分全额免征企业所得税；银监会对投资绿色债券的商业银行，可以适当降低其持有绿色债券所对应的风险资产占用比例；证监会可以适当提高绿色公司债券的质押比例。

五是推动发行主体多元化，依托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开展绿色债券发行试点。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国有企业等信用评级高的大型机构将成为推动国内绿色债券市场早期发展的重要主体。以国家开发银行为例，涉足清洁能源、节能

减排、污染防治、城市综合管廊等领域，具备较好的绿色信贷资产再融资条件，项目运作经验丰富、环境风险防控能力突出、项目资产质量良好。应当鼓励国家开发银行等国内政策性银行在海内外两个市场探索发行绿色债券。国内商业银行绿色信贷再融资规模巨大，为引导商业银行腾挪出更多资金来支持绿色企业、绿色项目，应鼓励商业银行发行透明度更高、报告要求更严格的绿色金融债券。此外，应当鼓励承担城市开发、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地方融资平台等国有企业试点发行绿色企业债券。

[参考文献]

- [1] Climate Bond Initiative(CBI), 2016. Bonds and Climate Change: The State of the Market in 2015[EB/OL]. <http://www.climatebonds.net/resources>.
- [2] ICMA. Principles G B, 2015: Voluntary Process Guidelines for Issuing Green Bonds[S]. March 27, 2015.
- [3]马中, 陆琼, 昌敦虎. 我国绿色金融资金的有效需求(2014-2020年)[J]. 环境保护, 2016, 44(7).
- [4]秦绪红. 发达国家推进绿色债券发展的主要做法及对我国的启示[J]. 金融理论与实践, 2015(12):98-100.
- [5]王志宏, 曾刚. 国际绿色债券市场:现状、经验与启示[J]. 金融论坛, 2016(2).
- [6]王彤宇. 推动绿色金融机制创新的思考[J]. 宏观经济管理, 2014(1):46-48.
- [7]王遥, 徐楠. 中国绿色债券发展及中外标准比较研究[J]. 金融论坛, 2016(2).

Comparison of Green Bond Development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Zhang Haoliang, An Ra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gency of Guangdong Provinc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30;

China Development Institute, Guangdong Shenzhen 518029)

Abstract: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emerging economies are increasingly concerned about green bonds, and bring green bonds into their green financial policy system. Compared with foreign countries, domestic green bond market started late, but it develop rapidly and has broad prospects these years. Green bonds in China and abroad exist difference including the standard system, project classificati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ternal certification, incentives and other aspects. This paper put forward policy advices among unifying identification standard, establishing a green certification system, improvement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s, differentiation of incentive measures and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issuer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green bonds.

Key words: green bond; green financ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收稿日期 : 2016-08-15 责任编辑 : 廖令鹏)

【开放论坛】

一份值得重视的智库期刊

——简评《开放导报》

何放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主办的《开放导报》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地带较早创办的一家智库型学术期刊。该刊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一直发挥着主动探索的精神，并显示出它为政府在科学决策中不断提供“智慧之资”的独特作用。

最近，我重点翻阅了几期《开放导报》所刊发的文论，直觉它作为政府智库期刊确有自己的特点。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导向明确。一般地说，智库研究可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三类。毫无疑问，综合开发研究院主要是进行政策研究的机构。即面对一个问题，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它和它的期刊的存在应具有满足“需求方”（政府或企业等）的功能。因为任何机关的决策都有风险，特别是决策者有着承担决策失误的严重后果的压力。作为“供应方”的智库及其期刊应有着独立判断的眼光和能力而充当“需求方”的“智囊”和“外脑”。《开放导报》的刊名叫得好。立足改革开放，但始终坚持科学导向。它的每期文论，都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总题目笼罩下展开。这完全符合建立国家意识形态和在国家对外竞争中提供支撑作用的要求。因为它属体制内刊物，具有信息便利的条件，对政府或企业的决策和实际运作一般都能切实把握，因此，它给出的咨政建言大都建立在“应该怎样”的知识和逻辑推导上。从它的一些论题如《“新常态”增长的路径和支撑》、《城市治理主体的职责定位》、《一带一路需要把握的重大原则》等，即可看出智库期刊是如何客观研判问题、诊断问题的，是如何为政府或企业决策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性建议的。

第二，视野新锐。智库期刊与社会上一般人文期刊不同的地方即在于，它要求“专业化”程度高、资政性强。这就要求办好这份刊物要建立起超越单纯“技术理性”和“人文情怀”分离的惯性思维，实现融合、多维、客观，确保能相对客观敏锐地观察问题、诊断问题，给出切实可行的咨政建言。《开放导报》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栏目，即每期都有一个中心论题，如《新常态与增长方式转换》（2014.6）、《城市治理现代化路径探索》（2015.3）、《一带一路推进与风险防范》（2015.4），而且多见知名学者（如樊纲等）撰文。这些文论，紧贴社会的热点、焦点、难点，都涉国家的大决策、大战略，视野新锐精准。所论之道，都是为中国人找痛点、找差距、找路径、找归属、找信仰。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一种文化自信。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开放导报》不只是做对策，它也产生思想，也有运作。因而它是真正属于智慧层面的刊物。

第三，它有综合性的特点。《开放导报》每期都有八个栏目，视野很广。它有开放论坛、创新策略、产业政策和金融研究等方面的论题，这种综合性在科学意义上并没有“扼死”，这就可能有突破。因为智库的功能是多元化的，所以政府有什么需求，都应有相应的智库及其期刊来满足，这就是市场的观念。瞩望《开放导报》能一心一意地按照智库的任务、专业做法来做对策研究和建设性研究，继续主动去探索，不断扩大它在社会上的积极影响。

（原载深圳市新闻出版广电局《深圳出版审读与管理》2016年第1期）

【社会建设】

社会诚信体系建构中的制度供给

鲍宗豪，王晗

（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上海 200237）

[摘要] 我国诚信制度供给面临基础性制度不完善、地方诚信治理制度保障不足、激励与惩戒的有效联动协同机制匮乏“三大短板”，其原因在于诚信制度建设机制不完善、制度供给与不同利益主体需求差异等因素影响。应构建诚信制度供给的“政府主导协同”机制，发挥地方诚信治理的制度竞争力，实现守信联合激励与失信联合惩戒的部门整体运作、互联互通、协作共享，以及政府主导格局下与市场、社会的有效整合，推进社会诚信体系构建。

[关键词] 社会诚信体系 制度供给 机制优化 实施路径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 (2016) 05-0063-06

[作者简介] 鲍宗豪（1949—），浙江奉化人，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文明、文化、社会现代化；王晗（1985—），山东聊城人，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诚信、企业社会责任。

社会诚信体系是以诚信制度为本质的规则体系，制度供给是诚信体系建构的核心与保障。当前中国诚信制度供给面临基础性制度不完善、地方诚信治理制度保障不足、激励与惩戒的有效联动协同机制匮乏三大短板，呈现国家权威性不足和社会自主性缺乏的双重特征。探索适应中国国情的诚信制度供给机制与实施路径，是弥补诚信制度供给短缺、实现社会诚信资本^①综合建构的必然选择。

一、中国诚信制度供给需破解“三大短板”

当前中国诚信制度供给正逐步接近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诚信体系演化的一般规律得到了体现。然而，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仍面临诚信的基础性制度不完善、地方诚信治理制度保障不

足、激励与惩戒的有效联动协同机制匮乏“三大短板”。

短板之一：诚信建设的制度性基础设施尚不完善，产权无法得到有效保护，影响了诚信的发展以及制度规则体系的构建。

当前中国诚信制度建设正处于不断强化和完善的过程中，基础性制度设施的短缺与不足是中国诚信体系演化进程中最薄弱的环节。其中，产权是推动诚信产生与发展的基础性经济制度，通过提供一种普适性的激励、约束和保护机制，可以为经济主体诚信的养成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当前中国保护产权的基础性制度仍然相对薄弱，民法典编纂工

① “社会资本”的概念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正式提出。使这一概念受到广泛关注的是罗伯特·普特南在《使民主政治运转起来》一书中对社会资本的界定：“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在一个继承了大量社会资本的共同体内，自愿的合作更容易出现”。

作尚处于起步阶段，诚信相关的基础性法律制度还存在显著的结构空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诚信的发展以及诚信制度规则体系的构建。

短板之二：地方诚信制度建设发展不平衡且总体水平较低，诚信治理的制度保障不足，在国家层面配套制度安排滞后的情况下，地方难以有针对性地解决当地重点领域诚信问题。

伴随着信用产品创新、信用活动数量急剧增加、信用活动方式多元化，需要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大量新的诚信配套制度供给，配套制度不及时或实施细则缺乏现实可操作性的现象就较为常见。在当前国家层面配套制度缺失的背景下，各地诚信建设发展尚不平衡，地方性诚信法规制度建设总体进展较为缓慢。地方针对个人以及企业的信用信息征集、查询、信用信息安全和主体权益保护等无法可依、无章可循、边界模糊，“红黑名单”制度的实施与管理也缺乏相应的标准依据，地方政府无法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治理社会诚信失范问题。

短板之三：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的有效联动协同机制匮乏，无法实现信用信息的互联互通与交换共享，导致诚信治理的联合激励与惩戒措施无法落实。

守信联合激励、失信联合惩戒是治理中国社会诚信失范问题的关键措施，通过形成褒扬诚信、惩戒失信的制度机制，有利于提升社会诚信治理水平，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当前中国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的有效联动协同机制尚未建立，一方面表现为信用信息共享和使用机制尚不成熟，不少地方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相对滞后，另一方面，有关失信行为联合惩戒等方面的立法尚不完善，联合激励与惩戒工作缺乏明确的操作规范，信用约束和协同监管构架尚未找到最佳模式，导致激励与惩戒措施落实不到位，对失信的可置信惩戒威胁无法形成，无法真正实现有效的社会诚信资本整合。

二、诚信制度供给出现短板的根本原因

伴随着市场规模持续变化，个体偏好不断改变，制度本身的相对稳定性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性会导致制度供给短缺与滞后成为一种常态。

一是利益主体共同参与诚信制度建设的协同机

制尚不成熟，导致一些企业游离于诚信制度建设之外。

中国是一个有着科层治理传统的国家，中央政府在政治力量和资源配置权力对比中均处于优势地位，在制度供给中具备较强的宏观调控能力与资源动员能力。地方政府有着自身独立的利益目标，但对诚信制度供给的影响通常是有限的。同时，由于企业尚未发展为成熟的信用主体，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也处于逐步完善中，在博弈过程中的谈判力量往往小而分散。可见，与征信国家不同，中国诚信制度建设是由中央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决策过程，利益主体共同参与的有效协同机制尚未发展成熟。在利益主体博弈过程中，中央政府主导着诚信制度供给的方向、形式以及战略安排。

二是国家层面制度供给与不同利益主体的需求差异，导致微观层面企业失信违规现象出现。

长期以来地方立法权有限，一方面导致在国家层面专门配套法规缺失的情况下，地方无法通过立法为当地诚信体系建设提供因地制宜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导致国家层面制度供给与地方利益主体的实际需求之间难免存在差异。由于地方政府是追求GDP或税收收入最大化的利益主体，在利益博弈中往往基于发展当地经济的局部利益目标贯彻执行诚信制度，打擦边球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各执行部门为降低治理成本，有时会放宽监管或执法尺度；部门之间互联互通、协作共享的机制往往无法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制度执行和社会诚信资本整合的效果。

不少企业的产权关系、产权结构仍处于改革中，模糊的产权更容易导致政府主导的制度供给与企业的诚信制度需求不一致。当差异存在时，未受到有效约束和经济制裁的企业往往因失信成本较低而将诚信要求置于次席，并利用自身决策的主动性和比较信息优势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结果导致微观层面企业失信违约现象大量出现，反过来又进一步增加了执行部门诚信治理的成本和难度。

三是诚信制度供给还受到供给主体知识结构、知识存量、技术以及偏好等因素的影响，导致诚信制度供给质量的弱化。

中国诚信基础性制度的缺失以及配套制度机制的滞后都与供给主体有关。虽然对知识结构、知识存量的优化可以提升政府制度供给的质量，但由

于有限理性的存在，制度设计本身总会有潜在的不足。同时，由于中国司法和监管系统尚处在转型之中，执行人员专业知识的不足和技术手段的缺陷对诚信制度的有效执行构成限制，阻碍了守信联合激励与失信联合惩戒工作的进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司法和监管的权威及公信力。

四是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思维和行为习惯，弱化了诚信道德规范的内在需求。

长期以来，整个社会形成的依赖行政计划的思维习惯，降低了对诚信道德规范的需求，导致计划经济时期积淀下来的诚信因素逐渐磨损，不仅中断了中国社会诚信体系的自然演化进程，使得当前的诚信基础性制度建设更加面临复杂性和紧迫性；同时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制的封闭性和独立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部门之间互联互通互动联动机制的构建，无法实现有效的社会诚信的系统综合治理。

三、强化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有效制度供给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破解诚信制度供给中的“三大短板”，必须强化制度供给对社会诚信体系建构的积极作用。

（一）强化主体诚信价值的理性认知

制度作为规范化、明确化的规则和交往关系结构，具有强化主体诚信理性认知、塑造主体诚信人格的功能，有利于促进主体诚信道德品质的养成。一方面，要通过褒扬诚信、惩戒失信等制度手段，向主体施加强有力的合法化影响，使主体认识到守信的收益与失信的代价，实现由“义利对立”观向“义利统一”观的转变，达到抑制主体本能性机会主义、塑造主体诚信人格的目的；另一方面，诚信制度通过提供值得信赖的规范基点与价值观，促进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的营造，使人们对诚信的认同成为一种内在的价值需求。

（二）强化诚信体系建设的法律保障

有效的制度安排可以为良好社会诚信秩序的形成奠定坚实的法治基础。一方面，通过强化地方诚信立法以及相应实施细则的完善，为信用活动提供规范化、明确化的法律依据，使社会信用管理与服务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从而减少信用活动的不确定性，保障社会秩序和市场经济良好运行；另一方

面，通过联合激励和联合奖惩机制的有效实施，使有关诚信的法律法规能真正的约束、规范各种信用活动，切实有效保障守信者因守信而获得回报，失信者因失信而受到惩罚，最终以提高违约成本的方式规范主体行为，保障诚信契约的履行。

（三）强化诚信体系建设的道德支撑

社会诚信制度是以道德为支撑的规则体系，通过培育公民诚信的道德情感，提供诚信道德的非正式约束，有利于增强公民道德意志、实现公民诚信自律。中央文明委在《关于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的意见》中明确强调，要坚持德法并举、刚柔相济，把道德教化作为诚信治理的有效手段。通过加强诚信道德教育与文化建设，使诚信道德观念以理性的、稳定的形态呈现于社会，从而增强人们对诚信价值合理性的认同，发挥道德内生力量对主体行为的约束作用。

（四）强化社会诚信资源的统筹整合

制度又是社会治理过程中沟通、协调、执行及调控的重要手段。在诚信治理中，良好的制度安排和设计可以起到统筹整合、沟通协调的作用。通过诚信制度的顶层设计，针对中国和各地诚信建设现状进行区域战略布局和宏观调控，有利于统筹区域间诚信资源，促进相关法律法规有效实施；通过建立部门之间的联动机制，可以实现信息的互联互通和交换共享，增强部门之间的协同性与一致性，并在此基础上运用行政性、市场性、行业性、社会性的多种手段，达成有效的政府整合以及社会共同参与，实现社会诚信资源的综合治理。

在社会诚信体系建构中，强化制度有效供给，可以有效解决市场经济秩序混乱与社会诚信失范问题，提供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社会诚信资本。有效的制度供给是社会诚信体系建构的核心与保障。

四、诚信制度供给的机制与实施路径

（一）诚信制度供给的“政府主导协同”机制

“政府主导协同”（state-centric relational）的概念由斯蒂芬·贝尔和安德鲁·辛德摩尔在《反思治理：国家在现代社会的中心地位》一书中提出。本文将这一概念移植到诚信制度供给机制建构中，一是强调地方政府在社会诚信治理中的作用，通过垂直方向上的集权与放权，将国家对诚信制度建设

的宏观调控能力置于核心地位，保留科层制机制在强化诚信基础制度中的优势；另一方面通过合理运用地方立法权，以及建立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推进基层诚信治理的民主化、科学化与法治化。二是突出诚信治理有效联动协同机制的重要性，通过水平方向上的互动与协作，建立部门之间高效配合的联动机制，实现守信联合激励与失信联合惩戒的整体运作、互联互通、协作共享；另一方面融合市场、社区参与、协会联合、社会游说等协同机制（见图1），使市场与社会参与到制度供给的博弈过程中，从而加速非正式规则的健康演化，并为正式制度的建立和有效实施提供有力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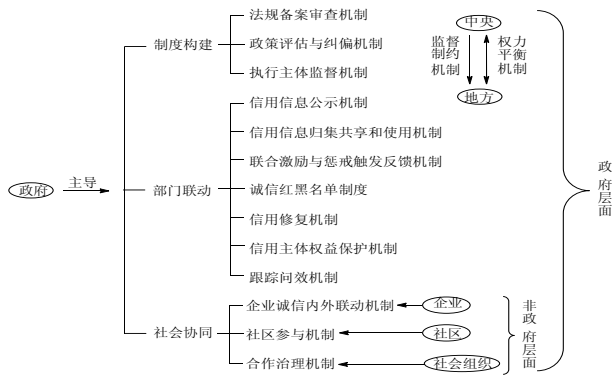


图1 诚信制度供给的政府主导协同机制

政府扮演了两种不同的角色。首先，政府作为诚信制度的供给者，在优化相关知识存量和积累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提高理性建构的成效建立健全正式制度规则和部门有效联动机制，主导诚信制度的演化进程。其次，政府作为社会诚信的治理者，通过制定规则、主导协作、加强控制等方式介入市场、社会组织的运行中，以其独特的制度、方法和文化促进市场经济主体自我约束与激励机制的完善，帮助社会提高内在诚信供给的运行能力，从而促进市场、社会组织在诚信制度供给中发挥作用，推动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诚信机制的形成。

（二）政府主导协同机制的实施路径

1. 健全诚信制度规则与部门联动机制

完善产权制度，加快基础性诚信制度建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交易的实质是产权的交换，明晰的产权可以使人们对未来形成较稳定的预期，

降低运用市场机制建立经济联系的交易成本。政府要加快国家层面的基础性诚信制度建设，推动完善中国民法以及相关法律对于财产权、债权等权益保护的规定，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建立权、责、利统一的现代企业制度，从而为经济主体行为和信用行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为良好社会诚信秩序的形成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优化诚信建设顶层设计，提高地方诚信治理制度竞争力。在制度设计中，政府首先应提高对信用活动内在规律的认识，界定信用活动合法或非法的边界，使制度有效覆盖信用活动主体，防范信用活动脱离实体经济或偏离其内在规律；其次要了解不同利益主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内在诚信需求，在制度安排中调节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评估制度变迁对既有利益格局的影响；再次要强化制度的惩戒功能，对违法、违规行为增加切实可行的惩戒性安排，保证制度惩戒带来的成本高于失信行为带来的收益。

同时，通过完善制度政策的评估与纠偏机制，防范具体政策措施与诚信建设相背离。在地方层面，一方面通过运用地方立法权，加快制定信用信息记录制度、信用信息分级管理制度、诚信红黑名单制度、有奖举报制度等诚信法规和政府规章，为个人、企业信用信息的征集、使用和“红黑名单”发布、奖惩等工作提供有效制度保障，并通过实施财政性资金项目安排、招商引资配套优惠政策等各类政府优惠政策，加大对诚信市场主体的扶持力度。另一方面加强对地方立法的监督，切实执行法规备案审查机制，从而保证地方诚信立法的质量，并与上位法保持一致，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深化司法监管体制改革，完善司法监管制度框架。应通过优化司法、监管机构设置，保证两大系统的相对独立性，避免宗教、社会团体、特别是地方政府基于局部利益影响司法判决，避免行业发展目标对监管尺度产生不良影响。其次，针对有法不依、执行不严、执法腐败、执法力度差异大等问题，应加强对司法系统和监管机构的内外部监督，通过建立健全执行主体监督机制，减少执行主体权力寻租的可能，保证两类系统按照各自的职责和使命运行。再次，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优化司法、监管系统的基础制度结构设计，保障制度的实施效

果，如根据市场经济活动中诚信需求的本质特征及发展动向修订完善监管制度，减少形成系统性风险的诱因，以及完善司法判决中对申辩的保护和复核制度，使失信违约行为受到应有的惩戒，同时尽量避免惩罚不公的发生。

构建部门有效联动机制，推动社会诚信资本整合。政府应推动建立互联互通互动的联动机制，形成守信联合激励与失信联合惩戒的制度执行合力。完善全国及地方信用信息平台、各行业信用信息系统，形成信用信息公示、共享与使用机制，消除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信息孤岛”；建立联合激励与惩戒措施清单制度以及触发反馈机制，形成跨部门、跨领域的诚信综合治理与整体运作，实现社会诚信资本有效整合；明确各类失信行为的联合惩戒期限，鼓励失信者在规定期限内通过社会公益服务等方式纠正失信行为，建立有利于自我纠错的信用修复机制。此外，在守信联合激励与失信联合惩戒实施过程中，应依托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的信息管理系统，建立联合激励与惩戒的跟踪、监测、统计、评估机制，以及相应的督查和考核制度，保障激励与惩戒的制度措施有效落实。

2. 发挥市场与社会协同治理功能

加强市场性约束与惩戒，培育诚信市场主体。对于企业主体，政府要针对结构转型期企业诚信推进过程中呈现的问题，推动建立合乎企业经济理性、有效统一企业“义”、“利”关系的企业诚信内外联动机制；鼓励金融机构、商业销售机构以企业信用信息和信用评级为依据，给予诚信企业更多的市场优惠和便利，引导商业银行等机构对失信企业提高贷款利率或限制向其提供贷款，使诚信成为市场资源配置中的重要考量因素。针对个人信用活动方式的多元化以及频发的失信行为，应推动建立个人诚信档案，督促个人履行法定义务，对有履行能力但拒不履行的严重失信个人实施限制出境等惩戒措施，强化对个人的诚信约束。此外，在市场诚信的培育中，政府还应制定科学的金融发展规划，优化适应国际形势的货币政策，并建立信用风险危机管理机制，从而保持信用总量的适度，避免信用总量的过度扩张。

鼓励公众参与联合激励与联合惩戒，营造社会诚信文化氛围。要通过加强社会诚信文化营造促进公民内在诚信理念的转换和提升。一是通过多种诚

信道德教育实践，加强对失信个人的教育和帮助，引导其及时纠正失信行为。特别是开展诚信家庭教育以及校园诚信思想道德建设活动，培育青少年阶段的诚信价值观与法治理念；开展诚信职业道德建设，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职业责任感。二是利用各种信息传播媒介加大诚信宣传和舆论监督力度，通过正面宣传和负面曝光，使失信者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并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的诚信道德取向；对于社会影响恶劣的失信案件，通过开展公众讨论、评议等活动，形成鞭挞严重失信行为的舆论压力。三是通过完善失信举报制度，鼓励公众举报严重的社会失信行为，引导公众参与到对失信行为的联合惩戒中。

健全征信及信用信息服务机构，促进行业协会、商会合作治理。针对信用评估机构，政府应建立和完善包括信用信息管理、评级、发布等在内的各类信用评估制度和惩戒规则，促进公众对评估机构的信任，并通过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提高信用评估专业化水平。针对征信系统，政府应明确公共征信与民营征信机构的分工，引导征信系统实现信用信息共享，为正式制度的执行提供有力支持；针对行业协会、商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和团体，政府应推动完善行业自律公约和职业道德准则，引导行业协会、商会建立内部信用信息采集与共享机制，将严重失信行为记入会员信用档案并给予警告、批评、劝退等惩戒，发挥它们在诚信制度供给中的自律管理功能。此外，还应重视信用管理专业的教育，加大对信用管理研究的资金投入，通过正规教育和专业化培训，培养信用管理人才。

3. 规范政府权力运作

在路径选择上，首先应理性定位政府的角色，界定各级政府的职权，尽量减少政府盈利性交易行为，避免将政府行为同垄断国企的商业行为混同，防范政企不分、政府信用扩张难以抑制的现象。其次是通过制度制约将政府的权力运行纳入法制轨道。除了以立法的形式规定政府的权限范围、行政责任等，还应加强对政府权力的人大监督、司法监督和舆论监督，从而确保政府诚实地履行职责，充分发挥政府在诚信制度供给中的作用。再次，通过将法律法规、会议决策、个人财产和重大事项、评议活动等进行公布的方式，促进政府管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此外，中央政府在其主导的

制度安排中应考虑地方政府的利益动因，满足地方政府的合理利益诉求，并通过权力监督、制衡与协调机制的建立，减少地方政府基于局部利益影响制度执行，从而使诚信制度在地方得以有效贯彻落实。

[参考文献]

[1] 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102.

[2] 王小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丛书.诚信篇[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252.

[3] 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11.

[4] Stephen B,AndrewH.RethinkingGovernance:the centrality of the state in modern society[M].Melbourn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10.

[5] 德姆塞茨.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4：97.

Institutional Suppl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Credit System

BaoZonghao, Wang Han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Research,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literature, institutional supply in social credit system construction faces great challenges, such as institutional deficiency, inefficient local governance, and malfunction of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Actually, these problems spring from some realistic obstacles, such as defective supply mechanism and imbalance between institutional supply and social inherent demands. Our analysis has yielded a ‘State-centric relational’ account of institutional supply in credit system construction. Through strengthening state’s own institutional and legal capacities and developing closer relations with non-state actors, it is possible to enhance state’s capacity in social credit governance, as well as to push forward credit institutional supply through motivation, restriction and social integration.

Key words: Social Credit System, institutional supply, mechanism optimization, path analysis

(收稿日期：2016-09-12 责任编辑：垠喜)

【社会建设】

论家庭福利保障制度构建

——基于国家与地方双重视角

卢晓莉

(成都市社会科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32)

[摘要] 本文分析了全面二孩政策下家庭所面临的挑战与需求, 提出我国应该在国家层面与地方层面构建家庭保障制度的途径: 国家层面应构建家庭法律法规体系、改革家庭税收制度、扩展义务教育范围、完善公民假期制度; 地方层面应加强对家庭的津贴补助、设立家庭服务机构、引入社区老人儿童服务的新形式、推进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

[关键词] 新人口政策 家庭政策 家庭福利 家庭公共服务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6)05-0069-04

[基金项目] 成都市社会科学院2016年度院级课题资助项目(编号: cdssky201605)。

[作者简介] 卢晓莉(1977—), 女, 四川乐山人, 成都市社会科学院社会与法制学所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 社会福利、公共服务。

目前中国人整体生育意愿不高, 最主要的原因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抚养孩子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大大增加, 而我国尚没有明文制定家庭保障政策, 对家庭的支持体系薄弱。因此, 制定家庭支持政策, 可减轻家庭经济压力, 提升家庭抗风险能力; 缓解老龄化社会的家庭养老保障问题; 推动普惠型儿童福利发展, 为儿童创造良好的家庭成长环境; 降低家庭离婚率, 提升家庭幸福度; 提升家庭性别平等, 有助于职业妇女更好地平衡家庭与事业。

一、社会转型与新人口政策背景下 家庭所面临的挑战与需求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 随着经济体制的变

革和社会的全面转型, 人们的文化观念、思想意识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投射到家庭, 则引起了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家庭功能的重大变迁。

(一) 家庭规模小型化、结构核心化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我国家庭形态出现了日益小型化趋势。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 目前我国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10人^①, 家庭户规模呈下降趋势。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家庭户中一代户的比例为21.1%, 两代户的比例为59.3%^②, 核心家庭成为家庭类型的主流。核心家庭一方面可以简化家庭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国家数据<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zb=A0306&sj=2014>

刘中一, 《现阶段我国家庭发展的新变化与公共政策的应对》, 载于《调研世界》2012年第10期。

但另一方面也削弱了家庭抚养子女与照料老人的功能，从而产生“空巢”老人、独居老人等新的社会问题。

（二）家庭关系平等化，不稳定性增强

据调查显示，当前我国绝大多数家庭中，夫妻双方均为在职人员，夫妻在家庭生活中经济地位平等，共同参与家庭日常事务。这一变化显示了，随着中国女性就业结构不断改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比重日益增加，夫妻之间不再是人身依附关系，而是平等的个体。传统意义上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关系模式被打破，现代女性较难独立完成抚育子女的责任，由女性主导的家庭养育模式开始转变，导致隔代养育成为很多家庭的选择，父母在儿童早期教育方面的参与逐渐减少，容易产生亲子疏离，也容易造成家庭分歧。

家庭关系的另一个趋势是不稳定性日益增强。国家民政部最新统计显示：2014年全国共依法办理离婚登记363.7万对，比上年增长3.9%。这意味着自2003年以来，我国离婚率已经连续12年呈递增状态^①。家庭关系的不稳定给家庭成员特别是儿童带来的伤害是巨大的，大量的实证材料证明，不完整的家庭或者不幸福的家庭，对儿童的心理发展、性格成长极易产生负面影响，导致儿童产生心理失调和社会适应不良等问题，更有甚者，会滋生犯罪行为。

（三）家庭成为家庭成员社会福利的主要提供者

目前，家庭的生活保障已成为社会保障不可或缺的补充。虽然我国已建立了离退休、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儿童互助金等制度，但家庭成员的生活照料主要由家庭内部来承担，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老年人的养老经济来源与日常照料都主要依赖子女、亲属。此外，由于“陌生人”社区的形成^②，邻里人际互动减少，关系疏离，家庭成为人们情感需求的重要载体。

随着新人口政策的实施，我国的家庭又将会出现以下变化：首先是由于抚养二胎子女的需要，许多核心家庭将重新转变为联合家庭，隔代直系家庭的数量将有所增加。但现在的联合家庭与以往的大家庭又有所区别，特别是对于双方均为独生子女且生育二胎的家庭来说，“四二二”的家庭结构（即由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四人，父亲、母亲二人和两个小孩构成的家庭），“上有老下有

小”，年轻人的生活负担会越来越重。其次会导致家庭关系的改变，二孩政策将在扩大家庭规模的同时对家庭养育质量提出严重挑战。特别是对0—3岁的小孩来说，在目前公共托儿场所普遍缺乏的情况下，家庭是其成长的重要场所，家人特别是母亲的照顾是幼儿健康成长的重要支柱，在此情况下，夫妻双方必有一方需要在家庭中投入更多的精力。在现实中，一般都是女性回归家庭，要么成为家庭全职主妇，要么选择有利于照顾家庭、照顾小孩的工作，真正能够做到事业与家庭完全平衡的女性是极其少数的。由此，原本男女平等的家庭关系会被打破，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便会产生微妙的变化，这也是多数女性特别是职业女性不愿意生育二胎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方面，社会的稳定和谐需要每个家庭的和谐稳定，而另一方面，家庭的和谐稳定离不开社会、政府的大力支持。家庭问题往往是个人及社会环境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有鉴于此，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一直致力于帮助家庭及其成员履行家庭义务。当前，中国已经逐渐呈现出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特征，进入了家庭变迁的关键时期^③，家庭自我保障与自我发展的能力受到严重冲击，迫切需要外力的帮扶。

二、我国家庭福利政策与公共服务的局限性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实行的是福利全包政策，由国家承担了所有的福利，但这时的福利仅限于国有企业的职工，或者是机关事业单位的人员。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和集体通过转制、放权，从保障体系中逐渐退出，将原来由国家或集体承担的全部或者大部分责任，逐渐释放给社会组织、市场组织或者家庭。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没有关于支持家庭的政策措施，我国关于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方面的政策也是对家庭的支持，只是我国没有直接以家庭为对象来制定福利政策。从政策科学角度审视我国目前的家庭福利政策体系，主要存在几个方

^① “凤凰网资讯”2015年6月29日，http://news.ifeng.com/a/20150629/44064095_0.shtml?_share=weixin

^② 随着住房结构的调整和商品房改革，城镇居民打破了以往以单位为核心的住宅方式，购买商品房成为主流，从而由从前的“单位人”“熟人”社区转变为“陌生人”社区。

^③ 吴帆，《第二次人口转变下的中国家庭变迁及政策思考》，载于《广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面的问题:

(一) 家庭政策以补缺型为主

受经济发展的限制及福利传统的制约,目前,我国的家庭福利政策表现为补缺型的福利模式,还不具有普惠性,福利对象主要为残疾人士、困难群众、弱势群体和问题家庭,如孤儿、弃婴、“五保户”等。相比较而言,在西方一些福利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如法国、瑞典、丹麦则形成了较为系统和完整的家庭保障体系,家庭福利对象不仅包括特殊困难家庭或者问题家庭,还包括普通家庭,将每一个普通家庭都视为国家支持和帮助的对象,为家庭提供经济支持、亲子福利、配套服务。

(二) 政策整体性与衔接性较差

家庭福利涉及面广,制定家庭政策的部门也比较分散,导致政策“碎片化”现象严重,缺乏将家庭整体作为基本福利对象的家庭政策,各领域政策之间的整体性与衔接性较差,甚至出现了政策重复或者相互矛盾的情况。以儿童福利领域为例,民政部、财政部、卫生部、教育部、残联等都出台了不少优惠政策,这些专项政策非常具体、可操作性强,但是部门分割的政策体系也导致资源呈现碎片化,难以整合和有效配置。

(三) 政策手段与功能比较单一

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增大、经济结构的完善、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不再满足于基本的生存需求,而是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方式。而我国目前的福利政策还处于经济保障阶段,政策内容与服务手段都无法满足家庭的发展性需求。

总体看来,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以家庭整体为福利对象的社会福利理念,家庭的重要价值还没有得到全社会特别是政策制定者的高度关注,现行的福利模式已无法适应家庭快速变迁的要求,无法满足家庭多元发展的需求。

三、国家层面家庭福利保障政策的构建与完善

基于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不同设置,家庭福利保障政策的制定与完善也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从中央政府层面来看,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改革和完善。

(一) 法律法规支持保障

目前我国家庭福利的法制建设还很薄弱,各项法律法规比较零散,政策之间相互制约乃至冲突的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与实际效果。应尽快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等法规的修订工作,依法增设二孩育儿假、二孩子女补助金等,减轻二孩母亲育儿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缓解维护女职工孕期、产期、哺乳期“三期”权益与企业发展之间的矛盾。出台专门的家庭福利法,强化法律和政策对婚姻家庭的保护,进一步明确国家对家庭的保障与服务,厘清政府、市场、家庭在家庭福利供给中的责任边界,确定各个福利提供主体在不同类型家庭的主要任务,提升家庭福利保障制度的法治效力。

(二) 改革家庭税收制度

我国实行的是居民个人作为申报单位缴纳所得税的制度,只要个人每月收入超过起征点,就按相应税率纳税。这一税收制度的主要优点是简便、易计算、征税成本较低。但是,这种税收制度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就是没有体现纳税人的差异性,没有将纳税人的家庭负担做为税收减免的依据。在很多西方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是以家庭为单位纳税,或者根据家庭负担状况的不同纳税。如美国、英国、日本在制定个人所得税制度时,都是将老年人赡养问题、未成年抚养及残疾人照顾等费用扣除,不包括在纳税额当中。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覆盖全国的人口信息系统,税务部门也已经建设了庞大的信息网络,实现以家庭收入为个税计税是可行的。应实行按家庭负担与赡养人口综合征税的制度,可以从儿童税收优惠、教育税收优惠、家庭结构税收优惠、残疾人税收优惠入手,对我国个人所得税制进行必要的调整与完善。

(三) 扩展基础性义务教育保障

教育改革以后,教育支出成为家庭生活最大的一笔支出。据统计,2012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总额超过2万亿元,首次占GDP比重达到4%^①。而英国早在2006年,教育投入经费即占国民收入的5.6%^②。与发达国家相比较,4%的教育投入只是一个及格线,仅满足了基本需求,还没有满足充分需求,教育投入仍需进一步加大。目前我国浙江、山东、深圳、福州、珠海等地已经进行了十二年义务

人民网, <http://edu.people.com.cn/GB/8216/358943/index.html>
《英国教育改革投入巨资》,载于《中国教育咨询报》,2002年8月7日。

教育的试点，可借鉴这些地方经验，在全国全面普及高中义务教育。另一方面，对学龄前儿童，即0—6岁的儿童也应普及义务教育，大力推动幼儿教育事业发展，为家庭解决儿童抚养的困难，提高我国公民受教育年限，提升我国人力资本质量。

（四）实施公民家庭假期管理

我国可以从有利于儿童成长的角度，在不同阶段给予父母适当的假期，以陪伴儿童特别是幼儿的成长。应延长目前的产假，赋予夫妻双方相同的产假，支持男性参与到育儿中；增加育儿假，母亲可享受一年的哺乳假；增设儿童节假期，让父母能够陪伴儿童过儿童节；完善寒假暑假陪伴制度，增加儿童在寒暑假期间与父母的相处时间。

四、地方性家庭福利服务政策的增进路径

在家庭福利政策体系的构建中，涉及具体的服务层面，需要各个地方根据本地财政、社会发展水平、文化传统等，来确定家庭福利服务政策，重点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增加对各种特殊家庭的津贴补助

保障家庭经济安全，是维护家庭稳定最基本的要求。政府应结合现行人口政策，加强对弱势家庭（包括独生子女家庭、二孩家庭、儿童家庭、老人家庭、残疾人家庭、慢病家庭）的经济扶助，减轻相关家庭的经济负担。对收入较低的计划生育家庭以及二孩家庭发放生育津贴，为“二孩母亲”按当地平均工资的80%提供经济补贴，对住房困难的二孩家庭优先提供廉租房或经济适用房。

（二）在城乡社区设立专业的家庭服务机构

在目前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的基础上，设置社区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社区家庭服务站和社区家庭服务信息点三个层次的服务机构，将社区服务做细，建立网络化的服务体系，使得社区中的每个家庭都能得到实际的支持与服务。同时，在社区中配备婚姻咨询、法律顾问、家庭教育、心理辅导、家庭关系调解等专业社会工作者，帮助解决家庭内部纠纷与困扰，提高家庭稳定性与凝聚力。

（三）引入社区老人儿童服务新形式

老人和儿童是整个社会最应该关注与照顾的两大群体。各地方应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大力推动老年人养老服务，形成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的养老服务体系，重点开拓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服务新形态，不仅为老年人提供身体照顾、生活照料等日常服务，还要提供精神慰藉、心理抚慰、出游陪伴等服务，使老年人能够在家中安享晚年。在儿童教育方面，应普及社区托儿所、幼儿园、日托中心、课后托管机构、课外艺术培训机构，通过免费或低收费的方式为儿童提供托管、课外学习的途径，以降低儿童教育成本，提高儿童素质教育水平。

（四）推进家庭福利领域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

政府可以通过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方式，将涉及妇女儿童和家庭的创业就业、心理疏导、大病救助、法律援助、居家养老等公共服务纳入购买内容及指导目录，一方面可以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关注家庭问题，另一方面也能培养一批专业化的社工服务队伍，为家庭的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On the Construction of Family Welfare Guarantee System — Based on the Dual Perspective of State and Local

Lu Xiaoli

(Chengdu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engdu Sichuan 610032)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and needs of the family under the new population policy.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our country should construct the family security system in two aspects of the state and local: The state should build a system of family laws and regulations, reform the family tax system, expand the scope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and improve the civil holiday system. The local should strengthen the family allowance, establish family service agencies, new forms of service for the elderly and children in the community,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Key Word: New Population Policy, Family Policy, Family Welfare, Family Public Service

(收稿日期：2016-08-09 责任编辑：垠喜)

【社会建设】

城中村的存续与再生

孙林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25)

[摘要] 城中村的形成既源于城乡差距导致的穷人进城,也植根于我国严格的城市管理制度、城乡二元土地制度。传统城中村改造由政府主导,容易过于追求速度,见物不见人,耗资巨大,成为“绅士化运动”。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在政府对庞大新移民住房保障仍有困难的情况下,应探讨城中村存续下的再生策略,通过借鉴“城市针灸法”来改善城中村基础设施、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以实现原地再生。

[关键词] 城中村 存续 新型城镇化 城市针灸法 再生

[中图分类号] F2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6)05-0073-04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框架设计研究”(15ZDA050)。

[作者简介] 孙林(1981—),湖南邵阳人,仲恺农业工程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师,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行政管理、社会政策。

一、对传统城镇化背景下城中村改造的反思

城中村是一个物与人相结合的多面向议题,其存在有合理性亦有争议性。在传统城镇化这种土地城镇化思路下,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各地拉开了城中村改造序幕。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有必要对这种传统改造模式存在问题与实质进行反思。

(一) 传统城镇化背景下城中村改造存在的主要问题

1. 改造主要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不足

我国传统城中村改造,尽管通过一些个案研究概括出村委会主导、开发商主导和政府主导等多种改造模式,但这主要是基于改造具体工作概括出的结论,如果进一步深究城中村整个改造过程,发现无论是改造目标的确定,改造计划的制定,改造方

案的审批还是改造进度的实施,无一例外都体现着地方政府意志。

城中村改造本质上不仅是一个生产要素重新组织与集聚的生产过程,而且是一个利益的重新协调与分配的过程,城中村改造背后有着社会公平、公正,居住权、财产权等多重议题。但在现实改造过程中,城中村改造被严格限制在拆迁补偿这样的经济议题上,在改造过程中村集体和村民凭借着手里掌握着土地使用权,尚能够作为利益相关者获得相应的利益补偿,而在此经营与生活的外来企业主和外来移民,完全被置于这场改造活动之外。

2. 改造过于追求速度,往往欲速不达

如珠海市2000年曾计划用三年时间改造完26个城中村,广州市在2000年曾计划用10年时间改造完138个城中村,北京市2005年曾计划用三年时间改造171个城中村,昆明市2008年开始先后共将382个城

城中村纳入其五年改造计划，郑州市曾计划到2015年完成市内228个城中村的改造任务。这种过分追求速度的城中村改造计划明显低估改造实际困难，忽视城中村存在的深层次社会基础，改造计划在现实中遇到了不少问题，不得不反复调整与修改，如广州城中村改造目标在2004年、2009年分别进行调整；昆明市改造中面临“拆得多、建得少、回迁少”等现实问题，在改造计划无法落实后的2015年不得不重新调整改造思路，用更为稳妥思路，给城中村改造“降温”。

3. 改造重物理空间轻社会空间

在我国当前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地方政府仍然普遍追求土地价值再实现和建筑景观改善这些物理与地理空间层面问题，而较少去留意村民对邻里生活需求和认同需要的生活有机性，较少去考虑其拆迁后面临的经济、社会与政治不安全感，更少考虑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原村民的城市新移民，因拆迁搬家而导致生活成本上升带来的无奈情绪。

4. 改造成为“项目”而非系统工程，耗费巨大难以推广

城中村改造本来是一个牵涉到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但是在赶超型改造目标的驱动下，为了达到想象中的改造效果和预期改造目标，被化约成一个个改造项目进行分头实施，通过政府的政策优惠吸外来资本强势进入来推动城中村的快速改造，使得改造成本日益高涨，难以具备推广与复制的价值。

5. 改造成为“绅士化运动”

城中村改造是由政府主导与策划的，却表现出一定的“城市绅士化”特征。城中村的握手楼、贴面楼变成了花园式的住宅小区，变成了商业中心甚至新CBD区域，使得租金直接上升，随着中产阶级等中高收入阶层进驻，原村民尚能凭借着村民身份和宅基地使用权得到相应的补偿，但大量在此租房居住的城市新移民因此被迫搬迁却没有任何补偿甚至关心，面临着选择蜗居到更偏远，公共服务更差，通勤成本更高的城中村，还是群租到市区抑或逃离城市的新困惑。

（二）传统城镇化背景下城中村改造的实质：转移而非系统解决问题

城中村作为城市“低成本生活区”，显著降低了城市门槛与运营成本，像城市的“生态湿地”一样滋养着城市，对工业化、城市化发挥着重要作

用。城中村的出现和形成是传统土地城镇化最大的“意外后果”，成就了中国经济奇迹、城市奇迹乃至经济奇迹和体制奇迹。城中村产生和存在的背后，有着深层面的经济与社会根源，已经发展成为城市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城中村是中国地区差距、阶层差异、贫穷差别在城市的一个集中呈现。在传统城镇化思维下对城中村改造大拆大建，关注建筑的物质形态更新，较少关心城市有机性与多样性，实质上只是在转移甚至是掩盖问题，而不是在系统地解决问题。表面上因为某一个城中村改造项目会使城市某一个点或局部景观有所改善，但其损害的是城市社会生态平衡。这种改造没有解决社会贫富差距问题，没有给因改造被搬迁的中低收入阶层更好的住房条件。

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 城中村改造的进一步讨论

城中村作为城市低成本生活区，已经深深嵌入城市的功能体系，成为难以割舍的一部分，传统城镇化背景下城中村改造虽然能够局部改善城市景观，但却在损伤城市社会肌理。新型城镇化提出以人为本的城市化理念，在这一背景与理念下，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城中村的功能与作用，寻找一条城中村存续下的再生道路。

（一）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中村存续的必要性

从城市长期发展来看，城市离不开城中村这样的功能区。在城中村生活可能只是一部分城市新移民阶段性与过渡性生存状态，但却可能是城市永久状态。在没有建成有较高住房保障水平的福利社会之前，城中村作为城市低成本生活的功能区绝不可能消失，大拆大建的物理改造不利于城市的发展。

从短期来看，城中村的功能亦不可替代。一是短期内保障性住房覆盖率难有较大增长。新型城镇化要实现人的城镇化，要从过去单一注重城镇生产功能转到更加侧重城镇分配功能，让更多进入城镇的人能够共享城镇化红利。要将城镇基本公共服务逐渐覆盖到全部常住人口，采取廉租房、公租房以及租赁补贴等多种方式来改善农民工群体的居住条件。国家城镇化理念的升级与调整我们自然是喜闻乐见，但是据新型城镇化规划，到2020年城镇常住人口保障性住房覆盖率，仅能够从2012年的12.5%增

加到“≥23%”，这样一个目标定位足够让我们保持警醒：农民工问题的解决非一日之功，绝非通过运动方式能够简单解决的，注定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短期内农民工群体的住房仍然需要城中村。

二是短期内地方政府仍然缺乏大规模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动力。在当前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架构中，中央政府在政策层面提出要解决农民工等城市新移民住房，改善其公共服务享有程度，但最终落实显然要依靠地方政府来实现。

三是现阶段有限保障性住房存在安居与乐业平衡的难题。即使假设未来政府的保障性住房有了较大幅度增长，但保障性住房地理位置的分布绝难做到像城中村那样均匀分布，保障性住房虽然可能在居住面积与硬件设施方面会有较大改善，但却会因偏僻的地理位置带来公共基础设施薄弱与公共服务稀缺，加上高昂的通勤成本，使这些城市中低收入者安居与乐业两者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尖锐，进而导致工作机会受限，更难以去实现梦想，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毕竟就业而非居住才是实现社会流动的的必要条件。

在可以预计的将来，城镇化过程中穷人进城是不可避免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阶层分化与贫富差距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在地方政府保障性住房生产动力不足、供给短缺，且难以在功能上真正满足中低收入阶层需要的情况下，城中村作为事实上的城市低成本生活区，虽然在景观上显得和城市格格不入，尽管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在功能上已经和城市融为一体，作为城市社会肌理上的“生态湿地”对城市进行哺育与滋养，仍会像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贫民窟一起顽强地存在，并成为城市重要功能区和有机体的一部分。因此城中村存续有非常强的合理性，其未来改造应该侧重机能上的改善而非物理上的消灭。

（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中村再生：针灸式改造及其实践

“城市针灸”（urban acupuncture）作为一种实现城市渐进式、小规模城市更新策略，是由西班牙城市学家与建筑师M·S·莫拉勒斯（Manuel de Sola Morales）结合20世纪80年代巴塞罗那城市再生战略创造的一个概念，强调城市更新是在加以仔细限制，具有短期实现可能性并有扩大影响面能力前提下的一种“小尺度介入战略”，既注重更新的直接

作用直接反应，也注重对周边带动作用，其理由是认为城市皮肤与人体肌肤一样，不管粗糙还是光滑，都形成一个有特性的网络系统。城市针灸这种通过小规模改造以促进城市整体机能的思路与现代主义大拆大建这种“手术刀”式物理消灭思路形成鲜明对比。

当前虽然城中村在建筑景观、消防治安与环境卫生方面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其生机与活力程度显然是有目共睹的，并不存在衰败或失控问题，所以推进城中村改造最需要解决的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足与超载并存问题，基础设施方面譬如对现有消防通道改造与改建，对城中村管线进行安全改造，将其上下水纳入市政体系以改善城中村的居住环境；公共服务方面按照常住人口数量相应增加教育与医疗资源，以及流动人口的管理队伍配比等，在这方面广州城中村改造近年开始进行类似的实践。

广州拥有中国最典型的城中村，全市共有304条城中村，村域面积达716平方公里，占总面积7434.4平方公里的10%以上，居住着近600万人口，其中包括500万外来人员，在经历长期的改造探索以后，2012年，针对城中村改造难题与僵局，广州首次提出要对部分城中村进行试点，通过完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和局部整治改造，而不是整体搬迁的办法将其改造成城市的低成本生活区。2014年5月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上审议并通过了《广州市城中村安全隐患整治3年行动计划2014年-2016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是为了遏制城中村存在的安全隐患，进一步改善城中村的居住环境，计划对广州市内的城中村进行整治。“行动计划”用3年时间，通过分类整治，分四个阶段完成全市城中村安全隐患整治工作，整治内容包括消防、管线、燃气、给排水、垃圾分类和网格化管理六大任务，整治类型分为全面改造和非全面改造两项，其中全面改造就先用应急的方式，对消防安全、用电安全进行整治。100亿元的整治资金将按照“政府出一点、企业出一点、村社出一点”的思路，多渠道筹集资金，同时动员和引导经营单位和受益者承担一部分费用。广州的城中村改造新思路与新尝试虽然没有提“针灸式改造”的概念，但事实上是在践行着这一理念，有望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我国城中村改造提供好的经验与启示。

三、结语

城中村作为我国特色的城市低成本生活区，既源于城乡差距导致穷人进城这样的人口迁移，也根植于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制度，是社会分化和居住分化的直接结果，城中村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我国的城市奇迹乃至体制奇迹。传统城镇化背景下的改造无视城中村正面功能和存在合理性，其实质是在掩盖或转移问题而非解决问题，正在撕裂城市的社会肌理。新型城镇化提出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城中村改造必须跳出传统大拆大建改造思路，探索一条存续下的再生策略，针灸式改造不失为一种可借鉴的思路与方法。

[参考文献]

- [1] 张玥,黄河.深圳新土改:城中村“更新”博弈[N].南方周末,2014-08-15.
- [2] 道格·桑德斯.落脚城市[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 [3] 李津逵.城中村的真问题[J].开放导报,2005(03):43-48.
- [4] 蓝宇蕴.城中村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功能分析——基于城中

村空间改造的思考[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8(12):30-35.

[5] 魏立华,阎小培.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城市非正式移民聚居区——“城中村”的形成与演进——以珠江三角洲诸城市为例[J].管理世界,2005(08):48-57.

[6] 魏立华,阎小培.“城中村”:存续前提下的转型——兼论“城中村”改造的可行性模式[J].城市规划,2005(07):9-13+56.

[7] 陈映芳.城市开发的正当性危机与合理性空间[J].社会学研究,2008(03):29-55+243.

[8] 毛丹,王燕锋.市农民为什么不愿做市民——城郊农民的安全经济学[J].社会学研究,2006(06):45-73+244.

[9] 蔡禾.从统治到治理: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大城市社会管理[J].公共行政评论,2013(6):1-18.

[10] 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J].中国社会科学,2012(5):113-130.

[11] 袁征,卢道典.广州猎德城中村改造模式思考[J].中国名城,2011(12):17-21.

[12] 宋伟轩.西方城市绅士化理论纷争及启示[J].人文地理,2013(1):32-35.

[13] 孙林.农民工居住权视角下城中村改造问题的思考[J].城市观察,2015(1):125-134.

[14] 吴盈颖,王竹.城市针灸:贫民窟“再生”的催化研究[J].华中建筑,2016(1):29-33.

[15] 肯尼斯·弗莱普顿.千年七题:一个不适时的宣言 国际建协第20届大会主旨报告[J].建筑学报,1999(8):11-15.

Survival and Regeneration of Urban Village

Sun Li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Zhongkai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Engineer, Guangzhou, Guangdong Province 610032)

Abstract: The urban village is due to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s also rooted in our strict system of urban management, urban and rural dual land system and rural "reservoir" function, it has become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lums." The urban village has become the "life circle" of the landless villagers, the arrival city of the new immigrants, the city's low-cost living areas, but there are shortage and overloading of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services. Tradi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urban village is dominated by the government, over the pursuit of speed, see things but not people, costly, become "gentrification". New urbanization is people-oriented urbanization, under the government of huge new immigrant housing security problem still powerless situation must regeneration strategy of existence of the urban village, by referring to the urban acupuncture to improve the village infrastructure, improve the level of public service, to realize the regeneration in situ.

Key words: The urban village ; Existence; The new urbanization; The urban acupuncture; Regeneration

(收稿日期:2016-06-15 责任编辑:垠喜)

【地方发展】

广西农村电商物流发展对策

马小雅

(云南大学, 云南 昆明 650091; 广西师范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1)

[摘要] 广西农村电商物流发展较快, 但物流末端配送滞后成为瓶颈。文章从广西农村电商物流发展现状出发, 通过甄别制约其发展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打造“三月三”文化节, 构建农村特色农产品品牌物流产业链, 继续加大政府对农村电商物流基础设施的投入, 构建第三方农村集合性配送中心, 多维度引进农村电商物流人才五个具有针对性的发展对策。

[关键词] 互联网+ 农村物流 农村电商 农村电商物流

[中图分类号] F30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6)05-0077-04

[基金项目] 广西教育厅高校中青年教师基础能力提升项目: “新形势下广西生鲜电商与冷链物流产业链协同发展研究”(KY2016YB270); 广西协科立项研究课题项目: “‘互联网+’背景下广西农村电商与物流产业融合发展对策研究”(桂科协[2016]Z-02)。

[作者简介] 马小雅(1981—), 女, 云南昆明人, 云南大学博士研究生, 广西师范学院物流管理与工程学院教师, 研究方向: 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

在“互联网+”背景下, 加大改善物流设施建设, 加强村企合作, 建立大众配送模式, 是发展电商和提高农村电商物流快速发展的迫切需要。本文通过对广西整体电商发展现状, 农村物流发展现状和农村电商物流发展现状递进式分析, 剖析制约农村电商物流发展存在的问题, 在借鉴浙江遂昌、浙江丽水、吉林通榆、江苏沙集、河北清河等成功模式的基础上, 提出了符合广西农村电商物流发展实际的对策。

一、广西农村电商物流发展现状

(一) 农村发展状况

1. 农村基本发展情况

2014年广西乡村人口4351.47万, 乡镇752个, 村民委员会14046个, 乡村从业人员数量达2469.46万。近5年来, 乡镇村户数、村人口和从业人员逐年增加。2014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为1450万, 粮食作物产量有1534.41万吨^①。截至2015年末, 第一产业增加值为2565.97亿元, 比2014年增长4.0%。

2. 农村邮电通信发展状况

2014年, 广西总人口为5475万, 农村人口占比重79.48%。2015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9467元, 比2014年名义增长9.0%, 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7.4%。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为2.79, 比2014

广西统计年鉴2015

年缩小0.05^①。广西邮政通信水平基本覆盖各乡镇农村，平均每人每年的发件数和订报数都在缓慢增加，总体来看，广西农村的经济在平稳发展，农村电商物流发展潜力巨大。

3. 农业经济发展状况

“十二五”以来，广西主要经济作物面积继续保持稳定增长，促使农作物产量增长稳定。稻谷产量一直排在全国第8位，水果产量一直排在全国第6位。2015年全区粮食播种面积3059.3千公顷，粮食总产量1524.8万吨，比2010年增加112.48万吨，年均增长1.5%。水果产量达1720.08万吨，比2010年增加625.67万吨，“十二五”期间年均增长9.5%，水果产量实现“五连增”。蔬菜产量2786.08万吨，比2010年增加656.64万吨，年均增长5.5%。食用菌产量达54.0万吨，比2010年增加25.5万吨，增长89.3%^②。近5年来，广西区农林牧渔业总量稳步增加，年均增长4.6%。总体而言，广西农业经济发展迅速，为农村电商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持。

（二）农村电商物流发展状况

1. 电子商务整体发展现状

“电商广西，电商东盟”工程实施以来，广西电子商务发展异军突起，2015年上半年，电商交易额实现1939.7亿元，同比大幅增长84.7%。2015年6月25日正式启动南宁跨境贸易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平台，当天完成跨境电子商务出口96单；社区电商试点稳步推进，桂林市象翌微链社区试点项目、社区直供平台管家网、易菜篮等成为先行者；巴马瑶族自治县、贵港等地建成“农邮通”三农服务站点919个，其中建成“电子商务进万村”标准化示范服务点131个，京东集团建设良庆区电商服务中心，启动广西农村电商业务；同时，新上线的淘宝特色中国广西馆、钦州东盟商贸城、柳州阿里产业带等一批电子商务平台项目也开始发力。2015年7月14日，商务部公布2014、2015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名单中，广西的巴马、靖西、浦北、东兴、柳城、桂平、灌阳、荔浦8个县（市）上榜^③。这些情况说明广西电子商务潜力巨大，正在进入快速扩张的新阶段，成为拉动广西消费需求增加、促进传统产业向现代创业升级、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引擎。

2. 农村物流发展现状

目前广西农村物流正在由传统物流向现代物流迈进，一是企业主体多元化发展。企业主体从快

递、邮政、运输、仓储等行业向生产、流通加工等行业扩展，尤其是向农产品原料加工到产品销售迈进。从广西现阶段农村物流发展看，生产主体主要为农民与农业生产企业，农村供应与销售物流主体比较多，如批发市场、供销合作社等。二是农村物流不断得到政策支持。2015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促进快递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到2020年，产业规模跃上新台阶。快递市场规模稳居世界首位，基本实现乡乡有网点、村村通快递。2015年6月广西区供销合作社与广西区商务厅在南宁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拟通过相互支持、密切配合、优势互补，推动在流通网络规划、项目建设、农产品市场建设和管理、电子商务等领域的合作，共同推进广西农村现代流通服务业的发展。三是物流发展与农村经济状况存在矛盾。物流是社会专业化和服务发展到一定水平的结果，广西农村经济呈现自给自足模式，与农村物流发展社会化的要求不相适应。一方面，自给自足的模式使规模化难以实现，服务能力较差；另一方面，农产品生产不能形成特色，刺激不了农村物流的扩张。

3. 农村电商物流发展现状

广西近海又毗邻外国，南宁是东盟的永久举办地，是中国向东盟的辐射地带，在“互联网+”和电商下乡浪潮推动下，广西农村电商物流得到日益关注。自治区政府与阿里巴巴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在云计算和大数据等领域广泛开展合作，以大数据驱动现代物流，帮助广西打造覆盖全自治区、影响西南和辐射东盟的智能物流骨干网络。京东下乡“3F”战略、淘宝的千县万村计划、乐村淘、邮乐购等陆续进驻广西农村，电商物流服务质量和创新能力有望显著提升，电商物流成为快递生力军。据统计，2015年全区邮政业务总量完成39.41亿元，其中快递业务收入占邮政全行业比重不断提高，拉动邮政业务快速增长^④。在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农村物流设施基础薄弱，村镇快递布点成本过高，出于利润考虑大部分物流和快递公司都不愿意涉足村镇快递网点建设，严重制约了广西农村

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2015年广西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十二五”时期广西农业农村经济运行状况分析。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xzf.gov.cn/zjgx/jrgx/201507/t20150716_474639.htm
广西统计局. 运输生产低速增长 邮电增速不断加快——2015年1-11月广西运输邮电业经济运行情况分析http://www.gxtj.gov.cn/tjxx/jdtx/qg/201512/t20151228_116035.html

电商物流的快速发展。

二、广西农村电商物流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电商物流模式尚未形成

2014年诸多公司纷纷试水农村电商，2015年形成了全国电商下乡高峰，但在规模化建设的同时，缺乏实际运营管理能力，导致发展不平衡。广西农村电商物流运作模式主要靠国内四通一达快递企业，各快递分销渠道下沉到村的物流节点不完善，电商企业与物流企业不能协同发展，尚未形成良好的适合广西农村电商物流发展的模式。

（二）电商物流设施落后

目前，广西“村村通”工程已经有较大发展，但在较偏远的少数农村基本交通道路还没有通水泥路。已通的农村道路基础维护不足，损坏程度严重。大多数的物流企业仅把网店分布到县或者交通道路和经济情况相对发达的乡镇。广西农村固话逐年减少，电信公司为了节约成本，不愿意向农村地区布局宽带线路。设施的落后致使电商物流企业难以生存。交通环境落后和宽带普及低是广西农村电商物流发展进展缓慢的首要原因，也是农村电商物流设施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三）居民居住地分散

广西农村山地面积居多，村民居住分散，村到村、组到组、屯到屯距离较远，有的达到10公里。分散的村落格局使得电商物流企业不能集中配送，设置自提点也难以解决交通不便利的配送问题。加之农民工作时间不定，货物送达没人签收，配送时效性低下。

（四）电商物流人才缺乏

广西农村电商物流硬件基础设施自2015年以来得到了高速加快建设，但具有专业知识懂得实践操作的电商物流人才极其缺乏。现实中，很多有高学历的电商物流人才不愿意到农村工作。而外出务工的众多农村青年返乡创业不如出外工作收入多，返乡创业的意愿也不强。

三、推进广西农村电商物流发展的若干对策

（一）打造农村电商“三月三文化节”

“三月三”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特有的文化。

广西农村电商物流发展可借力此节日特色，促使电商与文化结合，打造一个农村电商“三月三文化节”。政府可与企业合作，加大力度对“农产品+电商+三月三”主题宣传。通过网上预定、个性化定制农产品、三月三团购优惠、三月三农产品线上线下展览会、送礼套装以及农园采摘游等多种方式，挖掘农产品销售途径。通过本土农产品及衍生品，突出壮乡农产品优势，以“三月三”文化让全国各地人们对广西农产品产生文化共鸣，促进农产品成交，带动广西农村电商物流的发展。

（二）构建特色农产品电商品牌产业链

“互联网+”时代，各行业都在拥抱“互联网+”，期望借助它创造一番新天地。在电商与农产品结合快速发展的今天，整合特色农产品形成地区品牌必将成为一个趋势，这不仅能让优质农产品销售到各地，还能监督维护食品的安全，推广生态农产品。广西有着独特的气候条件优势，出产各种热带水果和各类蔬菜等优质农产品，如容县沙田柚、田阳芒果、融安金桔、仁东香蒜头等。农村电商物流要发展得更好，必须整合优质农产品，实现特色优质农产品品牌化，打造乡村农产品产业链。可通过供销社与电商物流企业、农产品加工企业合作，引导农民规模化种植优质农产品，借助地域特色找出差异化，挖掘产品的特色卖点，进行专业化的品牌化包装销售，从而形成具有广西特色、以农产品品牌化带动农村物流发展的电商物流产业链模式。

（三）政府加大对农村电商物流的扶持和关注

纵观国内比较成功的电商物流模式，不管是沙集模式、杨陵模式、遂昌模式、成县模式、通榆模式、大洼模式还是明水模式，他们无一不靠政府的关注与扶持。广西农村基础设施落后，需要政府与企业共同完善电商物流基础设施，可从交通、宽带、电商物流配套设施入手。交通是推进农村电商物流发展的基础，加大推进“村村通”进程，可大大降低农村电商物流成本，增加企业的服务覆盖面积；全力推进宽带网络覆盖基础建设，没有宽带的支持，就没有互联网可言，宽带是连接农村与电商物流企业的枢纽，是完善信息网络系统的前提；加强与电商物流行业领头企业合作，加大物流配套设施如计算机、通讯设备及车辆的投入。县镇政府应该加强宣传，吸引电商物流企业进驻农村，对走出去的电商企业和走进来的民营电商物流企业予以财

政扶持，不断开拓广西农村电商物流市场。

（四）建设第三方农村集合型物流配送中心

以县为物流网络配送体系中心，在县城建设第三方农村集合型物流配送中心，集合所有来自电商交易产生的商品，再由第三方农村集合性物流配送中心根据配送地理位置进行快件分拨。建设这样的配送中心有利于整合物流网络配送资源，在解决物流快件时效性低下问题的同时，推进产销对接，实现农产品规模化生产经营，保障农产品质量和安全，提高电商物流的服务水平，促进广西农村电商物流发展。

（五）加强电子商务物流人才培养

当前广西加强人才培养、留住农村电商物流人才刻不容缓。一是加强高校与农村电商物流企业的合作，建立高校电商物流实验室。校企合作可以为企业培养需要的人才，能有效进行人才对接，实现农村人才资源合理分配。二是通过创业政策红利和亲情温暖等方式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在城市务工过的农民工熟悉网络，了解并能接受电商交易方

式，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不仅能降低农村电商企业培养人才的成本，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当前农村留守老人和儿童的社会问题，还原真实有活力的农村。三是电商物流企业增强农村电商物流内部人员培训。四是聘请电商物流专家为农村农民培训，真正提高农民参与电商物流的能力。

【参考文献】

- [1] 詹斌,谷孜琪,李阳. “互联网+”背景下电商物流“最后一公里”配送模式优化研究[J]. 物流技术,2016,01:1-4.
- [2] 张夏恒. 我国县乡电商物流网络协同策略[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5,08:21-25.
- [3] 鲁锡杰. TOC理论在电商物流末端配送优化中的应用[J]. 物流技术,2015,04:155-157.
- [4] 高盛. 关于长尾理论的我国农村电商物流发展研究[J]. 中国储运,2015,07:124-126.
- [5] 宋剑. 宽带中国计划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发展潜力影响研究[J]. 物流技术, 2014,09: 332-334.
- [6] 程贤立. 广西农垦电子商务与农产品物流发展初探[J]. 中国农垦,2005,10:48-49.
- [7] 宋巍. 河南省农村物流网络建设与运营模式分析[D]. 郑州大学,2013.

Strategy of Guangxi Rural Electronic Commerce Logistics Development

Ma Xiaoya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Guangxi Teachers Education University, Nanning 530299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Guangxi rural electronic commerce logistics development is rapid, the end of the logistics distribution has become the bottleneck of its development.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and the problems of Guangxi rural electronic commerce logistics, Put forward five practic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proposed to create "March three" Cultural Festival, construct rur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logistics industry chain brand, continue to increase government investment in rural logistics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 rural areas, construct the third party collection and distribution center, introduction multi-dimension qualified electronic commerce logistics talents .

Keywords: Internet +; rural logistics; rural e-commerce; rural e-commerce logistics

(收稿日期：2016-08-31 责任编辑 垠喜)

【地方发展】

河南：农业产能向国外转移路径

安晓明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 目前, 河南农业向国外转移速度加快, 投资主体、转移目的地和方式等呈现多元化特点, 但仍存在一些问题。要尽快搭建农业产能转移平台, 为河南农业产能向国外转移提供统筹协调; 创新政府绩效考核方式; 通过基金支持、融资便利、税收优惠等方式帮助企业破解资金缺乏难题; 从投资风险评估、风险监测和投资保险等方面积极防控企业投资风险; 积极开展人才培养计划; 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为河南农业产能向国外转移营造良好形象。

[关键词] 河南 农业 产能转移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 (2016) 05-0081-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补偿机制设计与政策优化研究”(15BJY027)、河南省软科学项目“‘十三五’加快推进河南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162400410082)、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基本科研费项目“河南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模式探索与路径选择”(16E1009)。

[作者简介] 安晓明(1985—), 女, 湖南新化人, 经济学博士,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 区域经济、农村经济。

一、河南农业产能向国外转移的重大意义

通过产能向国外转移不仅能优化河南农业产业供给结构, 化解农业富余产能, 促进农业供需匹配, 有利于促进河南农业内部和三次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也是扩大河南农业品牌影响力, 实施中国农业大省“走出去”的有益尝试。

1. 优化农业供给结构, 是河南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必然选择

河南农业产能向国外转移, 有利于优化河南农业供给结构, 促进“供需错配”向“供需匹配”转变, 是河南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必然选择。一方面,

有利于化解河南的农业富余产能。目前, 河南的农业机械, 生产资料(农药、种子、化肥等)等产能远远超过当前的市场需求。河南农业产能向中亚、非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 能大幅度提升当地的农业生产能力, 河南农业产能转移具有广阔的市场。另一方面, 有利于提升河南农产品供给品质。河南的农业产能向国外生态环境优良、土壤无污染、水源纯净的地方转移, 将有利于以较低成本生产绿色、有机农产品, 这部分农产品回销国内可以提升农产品的供给质量, 满足人们对高品质农产品的需求。

2. 优化产业内部结构, 是新常态下河南经济转型的重要方式

河南农业产能向国外转移,有利于优化河南农业内部结构和三次产业内部结构,是新常态下促进河南经济转型的重要方式。一是优化农业产业内部结构。2015年河南省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约70%,其他作物仅占30%。如果在海外建立粮食生产基地,这部分粮食全部或者部分计入河南省的粮食生产总量,则在保障完成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任务的前提下,可以实现油料、瓜果、蔬菜、药材、花卉、菌类等农产品的增长,实现省内农作物种植结构的优化。二是优化三次产业内部结构。河南的农业富余产能向国外转移,意味着能腾出更多的产业发展空间,为其他更具有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进驻提供空间,进而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这有点类似沿海发达地区的“腾笼换鸟”战略,相比起来,推动河南的农业富余产能向国外转移,能充分调动企业的开拓精神,更容易被企业接受。

3. 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是我国农业大省“走出去”的有益尝试

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持续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河南农业产能向国外转移,有助于避开各种贸易壁垒,降低交易成本,扩大农机、农药、化肥、种子等产品的出口。更为重要的是,河南作为我国第一农业大省和农业人口大省,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拥有众多技术娴熟的农业劳动者,同时也有大量的富余农业劳动力。河南农业产能向国外转移,以更开放、更主动的姿态参与国际贸易与分工,以开拓者的姿态寻求新的市场,在农业产能向国外转移的过程中,也带动大量的农业专业技术人员和富有创业精神的农民在海外就业创业,不仅是河南对外开放水平的新跨越,也是我国农业大省“走出去”的有益尝试。

二、河南农业产能向国外转移现状

1. 河南农业产能向国外转移进展迅速,效果显著

河南农业产能转移正处于快速发展期。目前,河南不仅在海外建立了大量农机生产基地,如一拖入驻白俄罗斯首批中白工业园区,还在很多国家都建立了农业园区,如土库曼斯坦有机棉生产基地、莫桑比克棉花种植园区、老挝木薯种植园区及橡胶林种植园区、柬埔寨和印尼水稻示范园区、澳

大利亚农牧园区等等。据河南省农业厅调查显示,目前全省在境外设立农业企业17家,涉及农牧林等行业和农产品加工、贸易等产业链,覆盖五大洲11个国家和地区^①。河南农业产能转移的效果也很显著。以河南农业产能向塔吉克斯坦转移为例。2013年,黄泛区农场与经研银海种业在“高山之国”塔吉克斯坦合资建起了经研银海黄泛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2014年即迎来了投资后的第一个小麦丰收年,单位产量达到当地农民产量的3倍,2015年更是开启了塔吉克斯坦农业“一年两熟”的先河,不仅赢得了塔方的高度认可,打响了河南农业品牌,也为河南赢得了更多的农业产能合作项目。

2. 河南农业产能向国外转移具有多元性特点

一是投资主体的多元性。河南农业产能向国外转移的投资主体中不仅有国有企业,如黄泛区农场是省属国营农场;也有民营企业,如双汇集团、贵友实业、经研银海种业有限公司等;还有混合制企业,如河南省黄泛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河南省经研银海种业有限公司在塔吉克斯坦合资成立经研银海黄泛区农业科技公司。二是转移目的地的多元性。既有市场需求旺盛具有竞争力的欧美发达国家,也有农业生产能力较落后但有巨大发展潜力的中亚、非洲国家。三是转移方式的多元性。有企业海外投资建厂、企业海外并购、政府共建农业园区、承包农场,等等。四是转移产业的多元性。从粮食、棉花、香菇、肉类等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到农药、化肥、种子等生产资料和农业机械等等,都是河南农业产能向国外转移的重点产业。在塔吉克斯坦等国家,河南农业产能转移已经基本具备全产业链转移的特点。

3. 政府大力支持河南农业产能向国外转移

一是从河南省层面与东道国对接,签署合作协议。如河南和塔吉克斯坦签署了农业产业合作谅解备忘录,建设中塔(河南)农业产业园区,相关项目包括化肥厂、面粉厂、榨油厂、饲料厂、农机制造厂等。在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河南省与塔吉克斯坦经济合作协调推进工作方案》中,也指出要加强豫塔农业合作,着力发展粮食生产,打造棉花、畜牧、蔬菜三条产业链。二是政策支持。从《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对外开放“走出去”的

卢松. 农业发展势头强劲[N]. 河南日报, 2015-07-22.

指导意见》(豫政〔2011〕68号)到《河南省参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实施方案》、《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实施方案的通知》(豫政〔2016〕2号)等文件中,河南省都对农业“走出去”特别是其中的产能转移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三是通过专项基金支持农业产能转移。河南利用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对农业境外投资给予补贴。对在国外实施农业项目、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企业从国内购买的大型农机予以补贴^①。

虽然河南农业产能向国外转移进展迅速,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还存在不少问题或者说是制约河南农业产能向国外转移的因素。

一是尚缺乏全省层面的对于河南农业产能转移的顶层设计,难以对全省的农业产能向国外转移进行综合统筹指导与协调。据消息称,河南省的农业对外投资发展规划正在制定中,有望今年出台。需加快河南农业对外投资发展规划的制定实施,以便尽快指导全省的农业产能向国外转移,形成全省农业企业抱团出海的格局。

二是尚缺乏对于河南农业产能向国外转移的正确、理性认识。一些地方政府还没有正确认识河南农业产能向国外转移对于本地发展的重要意义,推动不积极;一些企业热情有余,理性不足,缺乏对项目实施地的全面考察,影响项目实施的效果;境外创业或者就业的较高回报对于农业产业工人和农民有吸引力,但是仍然有很多人对于国外特别是非洲一些国家持怀疑、恐惧态度,不愿意前往这些国家工作。

三是河南农业产能向国外转移面临资金、经验、人才的不足。农业投资多属于投资量大,周期长的项目,境外农业投资更是如此,因此,河南农业企业境外投资的资金压力非常大。由于河南农业产能向国外转移尚处于起步阶段,农业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经验不足,对投资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农业产业政策、农业劳动者素质、农产品市场潜力、风俗习惯等情况了解甚少,导致一些投资项目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农业企业对外投资合作人才也很匮乏。不仅熟练掌握外语、了解国际规则、熟悉东道国相关政策的跨国经营管理人员十分缺乏,既具备相关专业技术、又有意愿在国外特别是中东、非洲一些国家工作的农业专业技术人员也非常缺乏。

四是尚未建立河南农业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规避体系。境外农业项目建设和生产周期长,受自然条件、技术适应性、农产品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大,还受投资国政治局势变动、经济政策变化等特殊风险的影响。因此,项目执行风险相对比较大,很可能因为政治因素的影响,就导致项目暂停甚至终止。目前,河南尚未建立完善的河南农业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规避体系,不仅缺乏海外投资风险评估机构对项目进行客观的风险评估,政府也没有开展针对“非常风险”的农业对外投资保险,帮助企业规避风险的功能还很弱^②。

三、河南农业产能向国外转移的政策建议

综合考虑河南农业产能向国外转移的现状和国内外环境,河南农业产能向国外转移的发展思路应当是:以农业企业为主体,政府综合统筹指导并给予相关的政策支持,以充足的资金和灵活便捷的融资方式、完善的风险防控体系、大量的跨国经营管理人才、农业专业技术人员、农业产业工人和具有创业、开拓精神的农民为保障,相关一二三产业融合、全省企业抱团出海。因此,以下几个方面可作为政策重点。

1. 搭建农业产能转移平台,为河南农业产能向国外转移提供统筹协调

一是尽快出台河南农业对外投资发展规划,从全省层面对河南农业产能转移进行总体的规划设计,统筹协调,推动企业抱团,形成合力,在国际上打响河南农业的品牌。二是建立对外农业投资合作信息平台。为农业企业境外投资提供客观、全面的国际市场环境、投资环境以及国别投资指南,避免企业盲目转移、无序竞争,降低投资风险。同时为河南农业企业抱团进行境外农业开发搭建桥梁。三是积极推动政府层面的合作对接,通过对外农业援助、友好城市等外交活动为河南农业企业在境外投资营造良好投资环境。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既能避免被渲染成“新殖民主义”,也能使农业企业境外投资更有底气。如河南与塔吉克斯坦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建中塔(河南)农业园区,大大加快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实施方案的通知,河南省人民政府公报,2016-02-10。

陈前恒,张黎华,王金晶.农业“走出去”:现状、问题与对策[J].国际经济合作,2009,(2).

河南农业产能向塔吉克斯坦转移的进度。

2. 创新政府绩效考核方式，为河南农业产能向国外转移提供动力支持

农业企业留在本地能创造GDP，如果企业向国外转移将意味着GDP将减少，这就使得地方政府没有推动企业走出国门的动力，甚至可能为企业去境外投资设置障碍。因此，地方政府要解放思想，提高认识，正确理解河南农业产能转移的重大意义，政府绩效考核方式更是要在这方面有所创新。一是可以将农业产能转移至国外从而化解本地农业富余产能作为一项政绩考核指标，化解多少富余产能、带动多少跨国就业都计算入内；二是可以将在国外生产的粮食回销河南，如有可能，可有条件地计入河南省的粮食产量；三是参考跨国公司经营管理的办法，可以将境外企业创造的财富以分成形式计入河南企业总部，从而计入所属当地政府GDP核算体系。通过创新政府绩效考核方式，为地方政府支持河南农业产能向国外转移提供动力。

3. 破解企业资金缺乏难题，为河南农业产能向国外转移提供资金支持

资金不足是很多农业企业在境外投资中遇到的大难题，政府可以通过基金支持、融资便利、税收优惠等方式帮助农业企业破解资金缺乏的难题。首先，政府可以通过河南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对河南农业企业在境外从事农业生产进行补贴、贴息和紧急援助，并支持河南的农业企业合理申请利用相关基金，如丝路基金、中非基金等。其次，政府也要鼓励农业企业以合资、民间融资的方式弥补境外投资资金的不足，创新农业企业融资方式，放宽融资条件，简化相关审批程序，优先推荐其进入资本市场上市融资，支持和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最后，要完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河南农业产能向国外转移。对于农业企业境外投资项目需出口的生产资料、农机设备等，应提供通关便利，减免出口环节税费。

4. 积极防控企业投资风险，为河南农业产能向国外转移提供风险规避

风险规避体系包括投资风险评估、风险监测和投资保险等方面。首先，农业企业在境外投资项目之前，必须通过第三方机构进行项目可行性分析和投资风险评估，充分了解投资国的自然地理、资源条件、市场状况、法律法规、人文环境、农业发

展、政治宗教等情况，建立相应的管理机制，尽可能地防范和规避风险。其次，政府要建立农业企业境外投资信息服务系统，密切跟踪企业项目运营状况，及时监测国际政治局势和经济环境的变化、国外相关法律法规的调整、国际农产品市场变动情况，为农业企业适时调整进行指导，降低项目运营中的风险。最后，要建立和完善农业企业境外投资的保险体系。政府通过补贴支持的方式鼓励保险公司设立专门针对农业企业境外投资的保险险种，主要承保企业在境外农业投资之后可能发生的“非常风险”。

5. 积极开展人才培养计划，为河南农业产能向国外转移提供人才支持

优秀的跨国经营管理人才和农业专业技术人才的缺乏是河南农业产能向国外转移的又一短板。政府可充分调动资源，帮助农业企业补齐人才的短板。首先，要通过媒体、互联网等手段对河南农业产能向国外转移的重要意义进行宣传，客观地呈现境外投资就业的环境，消除人们视一些国家和地区为“洪水猛兽”的错误认识，能正确、理性地看待境外投资和就业。其次，搭建一个培训和培养农业跨国经营管理人才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带动社会培训机构为有意向进行境外农业投资和就业的人员进行客观、准确、专业的知识培训，包括投资国的自然地理、人文社会环境，甚至风俗礼仪、语言的培训，等等。再次，引导有条件的普通高等学校、职业技术学院在专业设置中增加涉外农业，或者在课程教学中增加涉外农业知识的讲授。为境外投资企业和普通高等学校、职业技术学院牵线搭桥，实现农业专业技术人才的供需对接。

6. 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为河南农业产能向国外转移营造良好形象

一是要注重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生态环境具有脆弱性，一旦遭遇破坏或者污染就难以恢复。即使最贫穷的国家在接受外国援助、外国投资时都会要求依法保护生态环境，反对野蛮的掠夺式开发。并且，对于农业发展来说，良好的生态环境、纯净的水源、未被污染的土地，是生产高品质的有机农产品最为重要的优势。因此，河南在推动农业产能向国外转移时要特别规范农业企业经营行为，始终坚持绿色、清洁生产，注重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实现农业企业在当地的可持续、健康运营。保护当

地的生态环境，坚持绿色发展，这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企业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二是要积极帮助当地民众脱贫致富。中亚、非洲的一些欠发达国家是河南农业产能转移的主要对象，双方在农业生产技术、农业科技等方面存在很强的互补性。但是这些国家同时也非常需要通过国外投资者的投资项目缓解贫困。因此，这些国家将国外投资和改善贫困是联系在一起的。河南农业产能向国外转移，一定要让农业企业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在项目实施中积极帮助当地民众脱贫致富。

[参考文献]

[1]安晓明,王海龙. 当前我国国际产能合作的几个认识误区[J].

工业经济论坛,2016,(3).

[2]安晓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特点与未来政策走向[J].区域经济评论,2015,(5).

[3]安晓明.我国“一带一路”研究脉络与进展[J].区域经济评论,2016,(2).

[4]陈建东,龚国祥,罗志萍.农业“走出去”非洲粮食投资合作的机遇与挑战[J].世界农业2013,(11).

[5]陈前恒,张黎华,王金晶.农业“走出去”：现状、问题与对策[J].国际经济合作2009,(2).

[6]郭志远.非对称性区域生态补偿的多目标设计模型——基于EKC非对称性的分析[J].区域经济评论,2015,(2).

[7]雷瑛.河南加快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的思考[J].中外企业家,2012,(14).

[8]杨易,李嘉莉,刘志颐.中国中部地区农业“走出去”特点、启示与政策建议——以安徽省为例[J].世界农业2014,(5).

The Transfer Path of Agricultural Capacity Relocate Abroad in Henan Province

An Xiaoming

(He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enan Zhengzhou 450002)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speed of the capacity relocation is very quick. The main body of investment, the destination and ways of the capacity relocation show diversified characteristics. The government also strongly supports the agricultural capacity relocate abroad.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The government should set up platform as soon as possible in order to providing co-ordination for agricultural capacity relocation, innovate the governmen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methods, through the fund support, financing facilities, tax incentives and other ways to help companies crack the lack of funding problems, from the investment risk assessment, risk monitoring and investment insurance and other aspects to control and prevent the enterprise investment risk, carry out personnel training plan actively, and guide enterprises to fulfill their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order to creating a good image for the agricultural capacity of Henan relocating abroad.

Keywords: Henan; Agriculture; capacity relocation

(收稿日期：2016-08-19 责任编辑：廖令鹏)

【地方发展】

苏州优势传统产业的创新发展

韩祥宗，沈能

(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江苏 苏州 215021)

[摘要] 苏州的优势传统产业正面临严峻挑战。传统的经济发展思路和发展路径让苏州优势传统产业遇到了瓶颈，现阶段急需探索可持续性发展道路，提高传统产业的创新发展能力，增强产业的核心竞争力。苏州传统领先产业需要高度重视自身创新能力的提升，加快落后产业的改造和提升技术进步的速度，为未来苏州经济增长提供强力支撑。

[关键词] 传统产业 创新能力 对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6)05-0086-03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373169)、江苏省苏州市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课题(SRD201506)。

[作者简介] 韩祥宗(1983—)，山东莱芜人，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创新管理；沈能(1976—)，浙江平湖人，博士，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创新管理。

一、苏州优势传统产业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30多年，苏州经济备受瞩目。传统产业是苏州经济发展最强劲的推动力。2013年，苏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3015.7亿元，其中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高达30276.29亿元，苏州的六大优势传统支柱产业中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达到26762.57亿元，占比超过了88%。可以看出，优势传统支柱产业的发展，对苏州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近年来苏州传统产业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开始凸显出来，其一是发展方式和路径仍然比较粗放，投资仍然是拉动苏州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力量；其二是优势产业核心竞争力不强，具有自主品牌和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很少；其三是产品附加

值低下，六大传统产业中很多大部分产品仍然是处于行业的低端位置，产品的可替代性很强，利润率较低。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呈现新趋势，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在保持合理增速的基础上大力推动自主创新，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和必然选择。因此，探索苏州优势传统产业未来发展模式和创新发展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二、苏州优势传统产业创新发展的重点

1. 加快与新兴产业融合，开拓新的增长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紧密结合，可以提升苏州优势传统产业的创新发展能力，帮助传统产业寻找新的利润点，与新兴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发展，可以倒

表1 苏州市优势传统产业的产出总量变化情况

序号	产业内容	2010年总量 (万元)	2013年总量 (万元)	年均增长率 (%)
1	电子信息产业	8947.92	10135.00	4.24%
2	装备制造业	4522.28	7050.93	15.96%
3	纺织化纤业	3137.87	3548.12	4.18%
4	冶金业	2731.29	4091.01	14.42%
5	轻工业	2438.01	4147.36	19.37%
6	化工业	1734.72	2978.30	19.74%

表2 苏州市优势传统产业分布

产业	主要涉及行业门类
电子信息产业	电信、互联网、软件与计算值、广播电视与卫星传输服务等
装备制造产业	通用设备制造和专用设备制造、电器装备及器材制造、仪器仪表制造、金属制造、汽车零部件制造等
轻工产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制造业、木材加工、家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等
化工产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塑料制品业等
冶金产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等
纺织产业	纺织业、服装、鞋、帽加工及制造业等

逼优势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借用国际新技术、新工艺，实现跨越式发展。

2. 优化产业布局，形成产业集聚发展。要继续以集约发展为导向，调整优化产业布局，促进生产要素加速集聚，提升、构建一批战略增长极，以沪宁高速、苏嘉杭高速公路以及“两轴三带”为重点区域，构建苏州产业的分布格局，逐步形成产业集聚分布区。

3. 加强节能减排，发展低碳循环经济。要转变只关注GDP增长的思维方式，提升优势传统产业的创新发展能力，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的企业，加快节能减排，发展低碳循环经济，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好准备。

三、苏州优势传统产业创新发展对策

(一) 加强企业创新能力培育，形成技术驱动发展模式

1. 支持企业的自主创新和技术改造。优势传统产业中很多企业技术落后，尤其是纺织企业，差距更加明显。苏州的棉纺企业，几乎所有的生产设备都远远低于国际水平，可替代性极强。未来，苏州的纺织业要抓紧开展新技术改造升级，淘汰落后生产设备以及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工艺装备，引进纳米改性等国际新技术，积极扩大推广自动络筒机、无梭织机，提高苏州纺织行业的整体产出效率，增加经济附加值，增强国际竞争力。

2. 加强传统产业创新系统主体间合作关系。在风险约束和市场利益驱动下，开展产学研紧密合作，从实质上解决企业的技术困难问题。通过创新系统主体间的合作，实现创新资源共享，资源最大程度的利用，促进企业集聚发展。

(二)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的创新发展环境

1. 加快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依托产业集聚区信息、咨询、开发、试验、推广以及产品研制、设计、加工、检测等公共技术支持服务平台，全方位为苏州六大优势传统产业提供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行业技术共享等方面的技术服务，解决企业的燃眉之需。

2. 扎实推进人才队伍建设。大力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吸引行业领军人才，积极推进落实“姑苏领军人才计划”和推进“1010工程”，最终形成有苏州特色的人才引进方式，打造苏州招牌；积极引导人才队伍结构调整，大力引进和培育行业领军人才，在保证人才队伍数量和质量提高的同时，积极引导人才合理和有序流动；注重本土人才的培育工作，提高本土人才的创新能力。

(三) 发展大型品牌企业，保持优势产业支柱性地位

1. 进一步壮大优势传统产业规模。重视扶持重大项目和重点企业的发展，围绕传统产业的主导产品，着力引进一批在行业中具有强劲带头作用的龙头企业，促进产业内部的竞争，快速提升苏州传统产业能级；高度重视本土自主品牌的发展，加大奖励和支持力度，鼓励企业开展品牌战略，重视品牌经营，增加竞争力。

2. 加快产业结构高端发展。重点推动现代冶金行业向高附加值和深加工产品方向拓展；积极推动轻纺工业实现精品发展和高端制造发展；推进化工

行业向研发生产一体化、智能化等方向延伸发展，大力发展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制造企业；电子信息行业向国际分工高端延伸，重点发展数字化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等现代高端技术；装备制造业向自动化、网络化、技术化和集约化的发展；纺织行业向无污染、新技术、新工艺等方向发展。

3. 加快产业的集聚群发展。苏州工业是按“东融上海、西育太湖、优化沿江、提升两轴”的布局进行规划和发展的，优势传统产业应加快产业进一步聚集。沿江三市要重点打造装备制造业基地，建设高端装备制造集聚区；苏嘉杭南北发展轴要利用好现有的优势，以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常熟经济技术开发区两大国家级开发区为主要的载体，重点承接高技术含量的产业，如电子信息产业、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高端纺织产业、新材料产业等，努力建设成为苏州南北向的高端产业复合集聚带；沿江发展区域以张家港经济开发区、常熟东南经济开发区、常熟经济开发区、太仓港经济开发区为主要载体，承接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高端精密机器加工产

业。

[参考文献]

- [1] 苏州市统计局. 苏州市统计年鉴2013[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 [2] 苏州市统计局. 苏州市统计年鉴2014[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
- [3] 黄雪丽. 上海、苏州工业内部产业结构的比较与分析[J]. 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2:15-20.
- [4] 徐大入,王洪军. 辽宁传统产业创新驱动发展模式研究[J]. 北方经贸,2015,01:79-81.
- [5] 张银银,邓玲. 创新驱动传统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型升级:机理与路径[J]. 经济体制改革,2013,05:97-101.
- [6] 胡宇杰,李哲,敬嘉,张学超,王来.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宁波路径研究[J]. 经济丛刊,2012,03:4-11.
- [7] 陆立军,于斌斌. 传统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合演化及政府行为:理论与实证[J]. 中国软科学,2012,05:28-39.
- [8] 于欢. 我国企业自主创新创新能力问题研究[D]. 沈阳工业大学, 2013.
- [9] 黄亮. 苏州工业结构转型研究[D]. 苏州大学,2012.
- [10] 王晓燕. 苏州地区产业集群政策研究[D].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07.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Industries in Soochow

HanXiangzong, Shen Neng

(Dongwu Business School of Soochow University, Jiangsu Suzhou 215021)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ly advantaged industries in Soochow are facing serious problems. The old development path and the local firms' narrow minds have constraine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se Soochow's traditionally advantaged industries. Therefore, we need to explore new ways of development. That is, we need to develop industries by advanc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hancing innovation, and promoting the core competence. To adapt ourselves to the new environment, the six advantaged industries in our city should pay high attention to promote innovation, upgrade outdated industry, enhance technology level, and find new paths for improve profit. Only by doing this can we find out the new spot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Soochow's growth in the future.

Keywords: traditional industry, innovative power, strategy study

(收稿日期：2016-08-24 责任编辑 垠喜)

【创新策略】

国际航空港区开放创新实验构想

——以郑州航空港实验区为例

钮钦^{1,2}，李艳华^{1,3}

(1. 中国民航运输经济与管理科学研究基地，天津 300300；
2.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北京 100872；3. 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天津 300300)

[摘要] 航空港区对于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作用已受到广泛关注，但国际航空港区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在创新驱动方面的作用，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文章结合对郑州航空港区开展开放创新实验优势的分析，指出了通过开放创新实验构建国际航空港区开放创新体系的三条路径，最后给出了科学规划明确重点、营造开放创新的政策环境和集聚高端创新主体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 开放经济 国际航空港区 临空开放创新体系 开放式创新

[中图分类号] F5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6)05-0089-05

[基金项目] 中国民航运输经济与管理科学研究基地开放基金项目(CAUCEMBA1404)。

[作者简介] 钮钦(1986—)，山西天镇人，中国民航运输经济与管理科学研究基地研究实习员，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空间经济与创新管理；李艳华(1969—)，女，河南汝南人，博士，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产业技术经济。

一、引言

航空港区在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名称和发展模式，如空港商务园、临空产业园、航空港经济区、临空经济区、空港新区和航空大都市等。这些概念，或重视交通枢纽对于周边商务贸易繁荣的直接作用，或强调航空港区域作为增长极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或依托航空港对于城镇化和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等。可见，航空港区实践层面的显著特征，主要体现在交通枢纽作为基础设施对

于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作用方面，往往忽视了航空港区特别是国际航空港区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在创新驱动方面的重要功能。实践领域对国际航空港区创新功能的忽视，也折射出学界在该方面研究探讨的关注较少。国外关于临空港区的经济社会效益研究，主要集中在临空经济、空港经济和航空大都市研究等方面(Haya El Nasser, 2003; Karlsson, et al, 2008; Appold, JD Kasarda, 2013; Freestone R, Wiesel I, Freestone R, et al., 2014)。现有的文献还鲜有从区域开放式创新的角度，对国际航空港区域的经济社会效益进行的研究。

区域的经济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区域的创新发展水平。在全球化和数字经济背景下，突破组织内部资源约束的开放式创新，正逐渐成为组织或区域创新的主导模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Henry Chesbrough教授提出开放式创新的概念。区域开放创新实践的探索最早始于2010年由德国、荷兰等欧盟成员国发起的欧洲合作和开放创新策略（简称EURIS）。2014年10月，以开放式创新作为主题的第三届莫斯科国际创新发展论坛举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与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共同出席。2015年9月，国务院同意在苏州工业园区开展开放创新综合试验。

在全球创新网络的条件下，国际航空港区具有开放包容和快捷联通的双重优势，是开展开放创新实验、构建区域开放创新体系的天然良港。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正在运营的国际机场有近40个，已有70余个临空经济区正在开发建设，充分发挥好国际航空港区在开发创新实验中的示范作用，对于形成提高区域开放创新竞争力，更具有深远的实践意义。郑州新郑国际机场是中国八大区域性枢纽机场之一、其货运航线已通达全球主要货运集散中心，初步构建起覆盖全球的航空货运网络。郑州航空港区是国务院批准建设的全国首个以航空经济发展为主题的实验区域。在此基础上开展开放创新综合试验，构建国际航空港区开放创新体系，既是基于航空港区开放创新的优越条件和基础，又有利于打造开放合作新平台，推动以加工贸易为主体的粗放型经济转型升级，拓展内陆地区对外对内开放的新空间和引领区，形成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上新的战略支点。

二、郑州航空港区开展开放创新实验的优势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于2013年3月经国务院批复成立，是目前全国唯一一个国家级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实验区规划批复面积415平方公里，是国内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区域。作为国家批准的第一个以航空经济为引领的国家级新区与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增长极，其规划目标是成为一座联通全球，生态宜居、智慧创新的现代航空大都市。依托郑州航空港区开展开放创新实现的优势体现在：

（一）繁荣便捷的国际航空运输网络

郑州航空港区依托的新郑国际机场是国内八大枢纽机场之一，货邮运输总量稳居中部地区首位，是“十二五”期间全国唯一的综合交通枢纽建设试点。数据显示，2014年新郑机场完成旅客吞吐1580.5万人次，增长20.3%；货邮吞吐37万吨，增长44.9%，旅客吞吐量和货邮吞吐量同比增幅位均居全国24个千万级大型机场首位。航线总数达到185条，通航城市97个。尤其是航空货运，其中全货运国际航线30条，继续领跑内陆，可通达上海、厦门、阿姆斯特丹、卢森堡等30多个城市，初步构建起了覆盖全球主要口岸城市的航线网络。此外，中国民航局在航线开辟和航空公司入驻等方面给予郑州航空港区大量的扶持政策。目前，航空港区启动了“大枢纽”建设，2015年12月郑州机场T2航站楼正式启用，新建了3600米长4F级的第二跑道，成为国内为数不多拥有双跑道、双航站楼的重要枢纽机场，形成了一个汇集航空、城铁、地铁、公路等多种交通方式的综合交通枢纽。郑州机场迈入双跑道双航站楼的时代后，拓宽了郑州航空港区接驳全球生产创新网络的通道，创新人流、物流、商流、资金流、信息流更好地对接全球市场，全方位从事全球生产创新活动、从事国际产业创新、科技创新、金融创新、服务创新文化创新合作，建设“一带一路”上的航空港区开放创新体系。

（二）利于开放创新实验的政策与市场环境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是中国首个上升到国家战略层的航空港经济发展先行区，其核心区域的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也是中部地区第一个获批，业务量处在全国第二位的综合保税区，是开放层次高、政策优惠、功能齐全的特定经济功能区域。国家技术转移郑州中心是继中关村技术转移集聚区之后，国家批复的第二个区域性技术转移中心。国家科技部门支持中心先行先试，集聚、整合和利用国内外创新资源，打造全链条、全方位、高端化、前瞻性的技术转移公共服务平台，形成以国家技术转移郑州中心为枢纽的跨区域、跨领域、跨机构的技术流通与创新服务网络，为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此外，通过持续加强开放平台建设，全力打造对外开放战略高地，航空港实验区建设运行良好。富士康郑州科技园的落户为其打开了对接全球生产网络的窗口，带动了相关配套产业和上下游厂商的集聚，对于航空港区外向型经

济发展和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的提升意义重大。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实施，跨境E贸易日处理量目前已达百万包，郑州航空口岸已完成跨境电商平台部署并开办业务，累计通关商品达15.5万件。电子口岸正式上线运行，国际陆港建设加快推进，初步形成集通关、物流、商务服务于一体的大通关信息平台，可实现与海关、检验检疫、边防等多个部门的互联，为推动口岸部门信息资源共享、提高通关效率奠定了技术基础和平台支撑，实现了由单一空港向陆空衔接的立体开放格局转变，明显提升了港区的对外开放水平。综合国家航空港经济实验区、综合保税港区和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的政策环境优势和良好的电子商务、物流服务等经济市场环境，航空港区已经初步形成了开展航空港区开放创新实验的创新环境格局。

三、国际航空港区开展开放创新实验，构建开放创新体系的路径

在开放经济背景下，国际航空港区开展开放创新实验构建的开放创新体系，是由航空港区内各个与开放式创新相关的主体要素，借助依托互联互通的航空运输网络，高效汇聚整合全球人才、知识、资金和技术等创新资源，融入全球创新网络，通过知识共享创造，信息传播加工，技术合作、转移、扩散及应用，技术和管理协同创新，形成的有机、有序的开放创新网络体系。借助于发达的航空网络，创新主体可以快速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相比一般的区域开放创新体系，国际航空港区开放创新体系的开放程度更高，创新效率也更高；但航空港区往往地处远郊又缺少部分创新主体，如研究型高等院校和从事基础研究的高水平科研机构。

自1994年北京天竺空港经济开发区成立算起，我国的航空港区建设发展实践已经走过了20多年。国际航空港区开展开放创新实验打造开放创新体系，是发挥航空网络互连互通优势，航空港区内各创新主体的交互和创新活动范围国际化，和产业组织网络、创新资源配置和管理制度创新全球化关联互动的产物。从传统的航空港经济体系，到国际航空港区开放创新体系存在一定的演化规律，航空港区开展开放创新实验，构建开放创新体系存在诸多潜在推进路径。从开放和创新的先后次序来看，可

供选择最具代表性的有三条：

创新驱动型演化路径。该实验推进路径的特征，是从“弱创新-低开放”到“强创新-低开放”再到“强创新-高开放”三步走，即首先强调国际航空港区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同时注重国际创新竞争环境的监测，待到港区创新能力足够强大，可以参与激烈的国际竞争时，利用便捷的航空网络和口岸优势，再逐步对外开放，面向全球整合创新资源，建立创新网络。目前，国内的一些航空港区多冠以“临空经济区”之名，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沿袭过去的开发区模式，忽视临空产业甄别和选择，不利于开展开放创新实验，培育构建创新体系。

开放引领型推进路径。该路径的特征是从“弱创新-低开放”到“弱创新-高开放”再到“强创新-高开放”三步走，即首先进行对外开放，快速融入全球价值链和创新网络，以此带动本土创新能力提升。对于创新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来说，这一路径吸收外部知识，引进国际技术，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效果明显。以郑州航空港区为例，富士康郑州科技园的落户为其打开了对接全球生产网络的窗口，带动了相关配套产业和上下游厂商的集聚，对于国际航空港区外向型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的提升意义重大。该推进路径看似短平快，却也蕴藏着较大风险。因经济效益明显易产生依赖性和懈怠性，在创新活动方面，可能长期集中在技术链的末端且以模仿创新居多。

协同互动型推进路线。国内的典型是“天津自贸区（机场片）”。即从“弱创新-低开放”到“强创新-高开放”的演进路径，创新与开放两者齐头并进，协同互动，从而较快形成高水平高层次的国际航空港区开放创新体系。选择交互影响型发展路径，这是以天津自贸区（机场片）为代表的航空港区正在尝试的推进路径。通过对前面两条路径的分析可以看出，该路径是最好的演化捷径，但在实际操作中也是最有难度的路径。以天津空港经济区为例，通过中央政府的协调努力，空客A320总装线引进落户，天津的航空产业发展从无到有，融入到了全球航空制造网络。此后，中航工业直升机总部也落户空港经济区。目前，全区已引进50多个航空项目，航空产业创新体系初步形成，正从价值链的制造生产部分向高附加价值

的研发设计与后期服务端延伸。随着天津自贸区和天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成立，空港经济区的开放创新环境更加优化。

四、推进国际航空港区开展开放创新实验的政策建议

全球化背景下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各地把握科技革命和创新前沿技术的发展趋势，紧扣开放型经济发展主题，深化国际经济技术合作，融入全球创新网络，追求开放链、创新链、产业链、城市链的融合发展。作为发展开放型经济、速度型经济的前沿区域，国际航空港区是开展开放式创新实验的天然沃土，选择作为中原经济区核心区和体制机制创新发展先行区的郑州航空港区开展开放创新综合试验，探索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创新驱动发展新模式，更好地参与国际商业和科技竞争合作，建设开放引领、创新驱动、制度优化、合作共赢的郑州航空港区开放创新体系，对于开放型城市、区域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意义深远。

（一）以科学规划明确开放创新的发展路径和战略重点

国际航空港区开展开放创新实验存在一定的推进规律和潜在发展路径。近年来，郑州航空港区积极打造对外开放平台，利用富士康等国际化程度高的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和创新网络，以此带动了本土创新能力提升，选择了适合港区实际的以开放促创新的开放引领型的发展路径。当前的发展路径虽然对于解决劳动力就业，吸收外部知识，引进国际技术，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效果明显，却也蕴藏着较大风险。因经济效益明显而易产生依赖性和懈怠性，在创新活动方面，可能长期集中在创新链的末端且以模仿创新居多。因此，在推进开放引领型创新发展时需做好科学规划，明确其战略重点是在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基础上，突破现有的封闭创新体系，强化体系内外部知识和技术的流动，要注意克服创新发展中的路径依赖和惰性，强调开放基础上的自主创新和集成创新能力提升，抵御来自外部的市场冲击和技术风险，形成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中亟需的创新资源配置规划能力、创新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创新机制体制的不断完善。

（二）以更为开放的创新政策环境释放创新活力

以体制创新和区域发展为动力，开展郑州航空港区开放创新实验，并提升其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创新资源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需通过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打造更加开放的创新环境，以此为航空港区开放创新试验区发展释放创新活力。一是要整合利用好现有的国家航空港经济实验区、国家技术转移郑州中心、郑州综合保税区等政策，争取有关部门的进一步支持，编制航空港开放创新实验区发展的总体方案，就打造航空港区开放创新体系，促进中部地区开放创新发展达成战略共识；充分利用现有政策优势，提高包括专利合作、自由贸易、技术国际收支、市场准入、技术转移和人才流动等维度的技术政策开放性，由此深化航空港区开放创新体系的开放性；二是在航空港区范围内全面推广上海自贸区的可复制经验，积极围绕投资管理改革、贸易便利化、金融创新、政府职能转变等重要领域，构建科技同产业、金融和创新服务的对接，并引入第三方评估；促进航空港区的营商环境不断向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迈进，对外开放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努力建成中原地区协同开放创新的引领区和先行先试区，为申报内陆自贸区创造条件。

（三）以高端创新主体的集聚增进创新的内生动力

各创新主体的强大创新力量以及技术溢出效应，会为当地知识技术型产业的发展提供创新网络支撑，是推动临空开放创新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郑州航空港区应以产业创新发展为导向，以引进集聚高端创新机构和人才、促进技术转移转化作为打造航空港区开放创新体系的重要着力点。一方面应努力承接重点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等落户，将郑州航空大都市研究院成为实验区与国内外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开展合作的重要平台。深化与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浙江大学等重点院校的战略合作，充分发挥高校科研院所科研资源和技术、人才力量雄厚的优势，在引进或共同建设产业协同创新体系、共建产业创新发展平台、试验示范推广、战略决策咨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引进等方面加强合作；另一方面要以郑州国家高技术生物产业基地（郑州台湾科技园）、中部国际电子商务产业园和富士康郑州

科技园等科技产业园区为平台，积极吸引大型跨国企业、国际知名实验室设立研发机构，突破技术封锁，加强国际化复合型创新人才和团队培养与交流，努力打造创新要素汇集的区域高地。

五、结语

开放经济背景下的国际航空港区依托互联互通的航空运输网络带来的创新资源的快速流动开展开放创新实验，构建临空开放创新体系是航空港区发展的新路径。本文从开放创新理论和区域创新系统理论出发，提出了国际航空港区开展开放创新实验的优势和演进路径，并以郑州航空港为例给出了政策建议。目前，全国各地依托航空港已规划建设了

70余个港区，各地的区位条件、对外开放和创新资源的情况各不相同，需因地制宜制定相应的开放创新实验发展战略。

[参考文献]

- [1] 毛磊. 开放式理论下跨区域协同交互式创新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4, (24):25-28.
- [2] 王焕祥, 孙斐, 段学民.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区域创新系统的演化特征及动力分析[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8, (12):44-47.
- [3] 赖永剑. 贸易开放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动态非线性影响——基于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J]. 软科学, 2015, (5) : 50-54.
- [4] 严建援, 杨银厂. 基于区域层次的开放创新体系研究:行为主体功能要素框架模型[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5, (3):37-45.
- [5] 邵希, 邢小强, 仝允桓. 包容性区域创新体系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 21(6):24-30.
- [6] 赖永剑. 贸易开放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动态非线性影响——基于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J]. 软科学, 2015, (5) : 50-54.

Conception of Opening and Innovation of International Air Port Area

Niu Qin^{1,2}, Li Yanhua^{1,3}

(1. Aviation Economy and Management Institute of CAAC, Tianjin 300300; 2.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usiness School, Beijing 100087; 3. Civil Avi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Economy and Management School, Tianjin 300300)

Abstract: The role of air port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 has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but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air port as a window for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has not yet attracted enough attention. The paper analyses of the advantages of carrying out open innovative experiment in Zhengzhou airport economic area. Subsequently, the paper points out three typical evolution paths that from the airport economic system to the airport open innovation system. Finally, this paper proposes a strategic vision of building Zhengzhou airport open innovation system,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such as scientific plan, optimize the environment for open innovation and amass high-end innovation elements are given.

Keywords: Open economy; International Airport area; Airport open innovation system; Open innovation

(收稿日期: 2016-07-19 责任编辑: 垠喜)

【创新策略】

专利无效判定的缺陷及补救

陈晓林，杨斌

(青海师范大学政法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8；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北京 100014)

[摘要]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我国的专利总量连年创出新高，这使得相关纠纷也不断增加。作为解决纠纷的重要途径，我国现行专利无效判定制度的弊端愈发显现。应允可人民法院对专利的合法性与有效性问题进行判定，并采判决的对世效力，加强行政机关与法院的信息共享，促使专利判定的协调化与合理化。

[关键词] 中国 专利无效判定 缺陷 比较 完善

[中图分类号] G30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 (2016) 05-0094-05

[作者简介] 陈晓林（1976—），湖北孝感人，博士，青海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知识产权、经济法；杨斌（1984—），湖北荆州人，博士，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研究方向：知识产权。

在现代社会，国家间竞争的根本还在于创新和发明。为此，我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明确提出了完善知识产权审判体制，简化权利救济程序，促使各类资源的优化配置，为保护智力成果奠定基础的目标。但是，就当前的专利无效判定制度而言，其在实践中显现出诸多弊病，如何弥补缺陷值得深入探讨。

一、我国现行专利无效宣告制度

从近十余年的申请来看，我国的专利总量已位居世界前例，庞大的专利申请量带来科技进步的同时，也造成专利审查时间冗长和专利品质降低的不足。大量的专利并不符合专利的基本要求，专利密度日益提高，沉睡专利居高不下，专利劫持问题严峻，这便导致了专利无效诉讼的大量增加。为此，我国也增设了专利无效审查制度。

（一）专利无效宣告程序简述

在我国专利法首次修订时，将授权之前的“异议程序”更改为授权之后的“行政撤销程序”，使之与“无效宣告程序”相衔接。然而，行政撤销程序的运行具有重复、复杂等不足，虽再次进行了修订，但对现行专利法中的相关缺陷并未作出实质性更改，故在当前的确权机制上，对专利的有效性予以更改的仅有无效宣告制度。

1. 专利无效宣告的受理机构。我国的专利纠纷既可提起诉讼，又可以诉诸相关行政机构，但申请宣告无效的受理机构只有一个，即专利复审委员会。因此，当事人若认为涉案专利不应该被授权，其须向专利行政部门提出确认专利无效申请。专利复审委员会隶属国务院专利行政机构，其主要管辖不授予专利的复审案件和无效宣告请求的案件。

2. 专利无效宣告的救济程序。当专利无效请求人或专利权人对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决定有异议时，

可以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方为专利复审部门，对方当事人作为第三方参加诉讼。在此程序中，专利行政案件的审理以行政决定为限，法院在审查该机构的决定时，应当审查该决定有无事实依据、程序是否合法等内容，但不能判定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专利无效宣告的行政程序通常也被称为专利无效诉讼，但这与美国等地区的称谓形同质异，并非是以法院为中心的诉讼制度。

（二）我国专利无效判定体系的缺陷

在多年的实践中，我国现行专利无效判定体系的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随着我国专利总量的不断增加，该体系的弊端也愈发显现，这些弊端阻碍了我国专利纠纷的解决与权利的保护，不契合于当前社会发展与创新的时代环境。这些弊端主要有：循环诉讼、中止审理以及无效宣告的定位模糊等几个方面。

1. 无效诉讼程序的“循环诉讼”问题。自我国《专利法》施行以后，专利无效诉讼便衍生出“循环诉讼”的问题。在专利纠纷中，倘若纠纷一方认为对方专利侵害了自己的权利，可向专利部门申请宣告其专利无效。若法院也收到起诉申请的，法院只能判令该部门重新作出审查，专利部门在第二次审核时，受相关证据、材料及其思维的束缚，极有可能作出与以往相同的审查结果，当事人不服决定的可以起诉和上诉，这样又会开始一个诉讼循环，案件久拖不决，给争议双方带来了重大的经济损失。

导致循环诉讼的原因是系统性的，首先，依据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倘若专利复审部门的行政行为存在瑕疵，法院不能直接判定纠纷双方在行政法上的权利与义务，只能判令专利复审部门对相关内容予以重新审查，由此使得循环诉讼的问题难以消除。其次，专利复审部门在诉讼中以被告的身份参与审理，这便会导致诉讼上的不经济，因为审理无效宣告案件与专利复审部门并无利益关系。虽然现行《专利法》允可第三人参加诉讼，但实际运作上反而使案件愈发繁杂，这也导致案件的审理需要较长的时间，不仅不利于保护专利权人，而且也会损及我国的产业竞争力。

2. 专利诉讼先决问题中止审理的弊端。我国采公民法二元诉讼体制，在与专利有关的诉讼中，法院针对专利的有效性问题的中止审理为原

则，因为其对专利的有效性问题的判定并无判定的权限。由此便导致诸多问题，首当其冲的便是法院积压了大量的未结案件。据相关统计显示，因这种程序复杂、周期长而直接影响案件的审理占据专利侵权案件的40%左右，过多的未结案件严重影响了法院的正常审判。

其次便是不能有效抑制专利侵权行为。中止诉讼后，若一方当事人提出诉讼保全申请并提供担保，法院可责令对方当事人停止侵害或采取对策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但此类措施难以取得预期之效。因为财产保全的期限与中止诉讼的生效时间应当相同，但实践中后者则完全取决于专利复审委员会。且对于申请人而言，其应当提供与保全财产相当的财产，但这极有可能因申请人无法提供使得财产保全难以实施，其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侵权行为人会利用无效宣告程序所必须的时间继续侵权，以达到其非法的目的。

3. 无效宣告程序的法律定位模糊。一直以来，在专利的有效性与确权机制中，行政机关的作用远大于法院。《专利法》的历次修订对无效判定方面的规定几无更改，对无效宣告的定位亦不明确，即该程序是行政程序抑或是民事程序未予以说明，从而导致相关实践缺乏依据，该定位科学、明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专利无效宣告审理程序的法制构造、当事人的权利保障以及相关司法制度的内在协调和实践。

通常情形下，专利无效宣告因是否存在民事争议其性质并不相同。对不存在民事争议的无效宣告不服而提起的行政诉讼符合法律逻辑，但当存在民事争议的情形下，无效宣告程序应是一种民事争议裁决程序，若将不服该裁定而提起的诉讼确定为行政诉讼则有欠妥当，因为该诉讼是一种民事纠纷，依照行政诉讼程序予以审理会导致许多功能的扭曲和错位。并且，对具有民事争议性质的诉讼又不能对相关民事权利与义务作出调整亦违背法理。专利复审部门在人员的组成上多为相关技术专家，其隶属于国务院专利行政机构，并非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下属单位。就专利复审部门的行为而言，其所作的决定具有行政行为的性质，而在专利复审部门的复审中，其并没有监督知识产权局的职责，专利无效宣告也不能是对知识产权局的行为的申诉，从而致使实践的困惑。

除以上不足外，行政审查与司法审查适用的法

律与规则的冲突、专利复审委员会在诉讼中的角色定位以及司法审查中当事人和解的困境等均是其弊端所现，囿于篇幅此不一一赘述。因此，对专利无效判定制度的革新与缺陷的补救是社会发展与实践的需要。当然，其革新的前提还在于充分的研究与论证，察鉴域外相关制度，借鉴他国的实践经验。

二、美国的专利权无效诉讼制度

美国是世界上的专利强国，其专利无效诉讼可溯及至1790年，相关的非法行为在当时的专利侵权诉讼中已有明确的规范，被告可就与专利的要件相悖为依据提出抗辩，法院可以此加以审理并予以判决。从早期专利无效诉讼制度的确立到新近的改革，历次修订均将该制度置于重要位置，适应了不同时期的社会需求。

（一）美国的专利权无效诉讼制度简述

1. 管辖法院与审理方式。在一审管辖与审理方面。在以往，此类案件由联邦法院审理^①。但随着2011年新的《专利改革法案》的通过，现行《专利法》规定当事人对专利商标局（PTO）的行政决定有异议的，应向专利审理与上诉委员会（PTAB）提出申诉^②。法院在专利侵权诉讼中，首先会对专利权的范围加以解释，将专利权范围明确化。故通常解释范围越狭隘，与先前技术的区隔越明显，专利有效性则较容易维持。

在第二审管辖及审理方面。专利诉讼第二审是由国会在华盛顿特区成立联邦巡回上诉法院（CAFC），并规定其对于经PTO审查的上诉案件均由其专属审理^③。虽然当事人可进一步提起上诉，但CAFC的判决几乎是专利案件中最具影响力及权威性的，这促成了判决的专业性及一致性，较好地解决了上诉过程中的诸多问题。

2. 专利无效诉讼的主体。法律对专利无效诉讼的主体并无限制，但实务上基于禁止反悔的法理发展出一些限制，诸如被授权人禁止反悔原则、让人禁止反悔原则等。但这些原则也同样受到挑战，最高法院在Blonder案中指出，若许可当事人之间就此争议展开控辩与攻防，则无异于让双方将时力耗费于循环往复的程序中，其成本高昂，背离了专利制度的宗旨和目标，因而该案并未适用该原则对相关主体予以限制。对此，新修订的专利法也进行了

规定，这有利于保障相关人员的诉讼权利^④。

3. 专利无效诉讼的举证。在专利诉讼中，“举证程度”是欲否定专利权的人为了证明专利无效所应尽的举证负担。而此项举证程度在实践中被放宽了。在1983年Connell v. Sears, Roebuck & Co.一案中，Markey法官明确指出质疑专利有效性的人要想推翻专利有效性的推定，必须举出相关事实，而此事实所需的证据必须达到“明确且具说服力”的程度，此项见解为许多法院所采纳。因此，实践中多采用此限度来明确对相关诉讼的举证。

4. 专利无效的主张方式。在专利纠纷案件中，一方当事人可提出专利无效抗辩（此项抗辩属于积极抗辩）或在侵权诉讼程序中提出反诉。由于反诉是独立的诉讼，其更具实际意义，然其主张方式却不限于此，倘若专利无效争议经法院裁量而不加以审理或遭上级法院撤销，专利无效还可以完全独立的确认诉讼来主张。其具有就专利纠纷取得由法院审理并裁判的权利。

（二）美国专利权无效诉讼体系评析

美国的专利无效判定制度具有多样化的特征，当事人若对专利权有异议，既可以向PTO提出专利无效请求，又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就美国相关制度而言，尽管近期对其进行了一些调整，但其本质并未更改，仍然具有实践价值。

首先，法院对专利权的无效判定使当事人可以通过法院主张权利，增加了纠纷解决的不同途径，扩大了当事人的自由选择权。法院对专利的无效判定可在较大程度上满足当事人的需求，这使得当事人可不必被迫接受PTO的审查决定。

其次，法院的判定在客观上起到了制衡PTO的作用。由于专利的审查和授予由PTO来完成，因此，一方当事人对此专利权有异议的可不必通过原有路径请求专利权无效，这在一定程度上对PTO形成制约，有利于其科学审查。

再次，为了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奥巴马政府对专利法进行了修订，其原因之一就是一审法院的诉讼成本较高。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一审法院

28 U.S.C. § 1338(a)(2007).

35 U.S.C. § 134(a)(2011).

35 U.S.C. § 141(b),(c)(2011).

35 U.S.C. § 134, § 306.(2011).

的审理权限，但上诉法院的作用并未更改，对专利机关复审的强化恰恰突出了法院审理的重要性。与此相对应的是，随着我国的专利发明迅速增加，专利纠纷也不断上升，仅靠行政机关解决纷争是不切实际的，因此，美国的相关制度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第四，CAFC既阻止了选择法庭的不足，又促使了判决的一致性。由于法院是专利纠纷的终极判决者，当事人的上诉使其可以以统一的程序和标准作出司法判决，从而避免了司法判定之间的相互冲突的问题。而行政机关援用CAFC的判决，也使行政机关与法院对专利纠纷的审理标准相近，避免了相互对立的结果，有利于最终的执行。

事实上，在确认专利权无效的途径上，经法院提出的专利无效诉讼仅是其中之一，专利无效诉讼以其自身的特点在各类途径中起到了优势互补的作用。作为美国专利法案的重要制度，其历经百余年而未作实质性更改，足见其对解决纠纷的重要作用，因此，其借鉴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三、我国专利无效判定制度的革新与补救

由于我国民事法院无法对专利权的有效性问题上判定，对法院权限的限制令其只能将专利有效性争议转由专利行政机关处理，而在现有行政程序下专利无效判定环节多、耗时长，侵权诉讼中专利有效性判定的分案处理所造成的诉讼拖延与当前产业的发展需求严重不符。有鉴于此，笔者以为，以下内容不失为改革之理性选择。

（一）专利权无效判定的模式选择

由于专利授予是行政行为，对其司法审查是行政诉讼的性质，但在专利权有效性问题上也应关注其私权属性，在权属判定上应以不同的方式予以处理。就现有的单轨制模式而言，专利无效抗辩使得民事法院必须对专利权的有效性给予程序上的非本案化的回应。从否定专利权维护公共利益的角度来看，其功效被低效率所淹没，故我国的专利权无效判定制度应向双轨制发展，即除了现有的专利无效宣告制度以外，法院可对专利的合法性与有效性问题上判定。

从比较法的层面来看，美国的专利无效判定从单一的诉讼模式发展成如今的多元混合模式，体现了专利强国的合理安排与科学选择。我国专利无效

判定双轨制的设立，从法律解释学的意义上讲是自洽的，其并未在根本上违背我国的法律体制；从实务需求上讲，无效判定的双轨制可有效解决实践中的诸多缺陷；从比较法的眼光来看，专利无效判定制度的双轨制被诸多国家所运用，具有较好的示范效应。因此，设立双轨制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践所需，极具实践价值。

（二）专利无效诉讼的相关配套机制

不言而喻，专利无效判定的双轨制模式的运作，仍需相关的配套机制才能达到与制度相协调的效果。从域外的司法实践来看，由相关法院直接对其予以判定，有可能导致认定标准的差异，地方保护主义甚至会通过非法手段笼络法院作出有利于地方利益的决定，从而导致诸多不利结果。因此，审理权限需要集中，特别是专利诉讼的二审案件，这就需要建立专业法院。

在科学技术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各国纷纷采取措施强化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其目的便是增强本国在知识经济中的竞争力，建立专责审理的专业法院或法庭便是举措之一。2014年，我国在北京等地设立的知识产权法院，但其统摄的区域过窄，无法应对我国专利申请与纠纷的急剧发展现状。因此，建议以不同的地理区域为依据，在我国东北、东南、华东、华北、中南、西南、西北等区域设立专业法院。

此外，专业法院的设置的重要内容在于审判人员的专业性，由于知识产权案件涉及专业技术领域，一般法官难以理解相关技术的原理和作用，无法对相关科学技术作出独立的判断。对此，我国也可借鉴美国的专家证人制度，采取专家参审的方式弥补法官非法律专业技术的不足，以满足法院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灵活处理各技术领域的专利纠纷案件。

（三）双轨制下无效判定的效力选择

尽管专利无效判定双轨制已为诸多国家所运用，但是其并非没有缺陷。如专利权人可能需要面对行政机关撤销专利或法院判定无效的情形，此“双重风险”在某种程度上实有减损专利价值的可能。并且，法院与行政机关亦有判断分歧的情形，亦可能有害于对专利制度的信赖。

基于双轨制可能导致上述不足，我们需要解决法院判定的效力问题。笔者以为，对于不同权限的主体作出的专利无效判定之间可能会发生不一致的

情形，专利专责机关所作的判定应赋予其对世性效力。于比较法上，美国在Blonder-Tongue案后认为法院在判定专利无效的案件中，除非专利权人在诉讼中未获得公平的对待，否则其不可再对相关主体行使权利，实质上相当于对世性的无效。可见根据美国法制，当法院认为专利无效时，该认定产生对世效力，此时，行政机关与民事法院两者间的无效判定则难以发生歧异，否则，民事法院与行政机关不同的裁判结果对于司法权威和执行均有一定影响。但是考虑到允许法院对专利权有效性的认定所带来的诉讼效益，此等歧异所导致的对裁判公信力的伤害的可能性极小，因为专业法院的设置使争议审理集中，并且专利无效判定的信息在两个权属机关间的共通也可有效缓解此种歧异的发生。

四、结语

创新与发明是现代发展的基石。我国现行的专利无效判定制度的诸多缺陷阻碍了当前产业的发展步伐。因此，应当强化对专利的司法审查，使人民法院可对专利的实体问题进行判定，勿需以中止审理的方式等候行政机关不尽公平的处置结果。而在判定效力的选择上，民事法院对专利的无效判定应采对世性效力。与此同时，在专利无效判

定的案件上，加强专利专责机关与法院之间的信息共享，以此便能促进专利无效判定的协调化与合理化，从而为确立专业法院的审判机制创造条件。在我国当前的社会背景下，强化专业法院的审判无疑是我们的理性选择，这对于提高解决专利无效判定的弊端、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 [1] 程永顺.专利行政诉讼的若干问题[M].专利行政诉讼实务,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73.
- [2] 张献勇,闫文锋.专利复审委员会的诉讼地位[J].知识产权,2005(5):50.
- [3] 罗东川.专利法第三次修改未能解决的专利无效程序简化问题[J].电子知识产权.2009(5):17.
- [4] 姚兵兵.再谈专利侵权诉讼中止问题——以南京中院为实例[M].专利法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91.
- [5] 陈锦川.从司法角度看专利法实施中存在的若干问题[J].知识产权.2015(4):16.
- [6] 李明德.专利权与商标确权机制的改革思路[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12.
- [7] 秦旭东.专利无效诉讼改革争议未息[J].中国发明与专利,2008(10):28.
- [8] 张迎春.专利无效诉讼的程序理性[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108.
- [9] 郭寿康,李剑.我国知识产权审判组织专门化问题研究——以德国联邦专利法院为视角[J].法学家.2008(3):57.
- [10] 陈锦川.从司法角度看专利法实施中存在的若干问题[J].知识产权.2015(4):16.

Defects and Remedies for Patent Invalidity Determination

Chen Xiaolin, Yang Bin

(Politics and Law School, Qing Hai Normal University, XiNing QingHai 810008 ;
East & Concord Partners BeiJing 100004)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China's total patent is growing every year, which makes the related disputes are increasing. As an important way to solve disputes, the malpractice of the current patent invalidity determination system appear increasingly in China. Viewing the patent invalidity determination system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is great reference value in its associated systems and procedures. In view of the shortcomings of patent invalidity determination system, we should promised to the court to judge the lega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patent, and adopt a judgment to be effective to everyone, enhance information sharing between the executive authorities and the courts, and to promote harmonization and rationalization to the judgment of the patent.

Key words: China; Patent invalidity determination; Defects; Compare; Perfect

(收稿日期：2016-07-19 责任编辑：余音)

【博士论坛】

我国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因素

崔佳¹, 孔英², 陆强¹

(1.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2. 清华-伯克利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55)

[摘要] 目前, 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碳排放国, 有必要加强对碳排放的相关研究。基于过往相关研究的总结, 笔者从人口、经济等七个方面较全面研究了中国1998-2012年27省两大区域的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表明: 改善经济增长方式, 建立新型考核指标, 优化能源结构, 提升能源效率将有利于区域碳排放的减少。

[关键词] 区域碳排放 影响因素 STIRPAT模型 系统聚类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 X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 (2016) 05-0099-04

[作者简介] 崔佳(1980—), 女, 辽宁沈阳人,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经济管理; 孔英(1960—), 北京人, 清华-伯克利学院、约克大学教授, 研究方向: 经济学; 陆强(1964—), 北京人,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管理科学与工程。

一、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现状

全球环境变化是由自然和人为因素引起的, 影响系统功能的全球尺度变化。针对全球环境无法预期的变化, 地球系统科学联盟(ESSP)推出了四大“联合研究计划”, 其中“全球碳计划”位列研究首位(葛全胜, 2011)。

随着气候变化的影响, 国内外学者对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研究也逐渐增多。Shafik和Bandyopadhyay(1992)对149个国家1960~1990年数据研究发现: 碳排放量与人均收入呈现正向相关关系。Kruznets(1955)最早提出“倒U型”库兹涅茨曲线概念, 他发现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存在不均衡关系。当经济水平提高时, 收入分配不均程度增大, 到达峰值后, 收入分配的不均衡程度开始缩小。

Birdsall(1992)认为人口增长对温室气体排放产生的影响存在两种方式: 一是较多的人口对能源需求会越来越多, 因此能源消费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越来越多; 二是快速的人口增长导致森林破坏, 改变土地利用方式, 这些都导致了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由Taylor和Copeland(1994)提出的“污染避难所假说”, 认为国家的环境管制降低了国内污染企业的竞争力, 导致产业的转移, 污染密集型企业会从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高的国家向低的国家迁移, 从而使实施较低环境标准的国家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的避难所。Xu和Jiang(2007)基于美国1980~2004年数据研究发现, 产业结构的改变成为影响能源效率的最重要因素。He等(2010)等说明能源政策有利于建立良好的环境, 此外想要更高的空气质量, 更好的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是必不可少的。外商直接投资对碳排放具有影响。

表1 聚类结果

分类	省份
碳排放高速增长区 (9个)	福建、山东、河南、内蒙古、广西、云南、陕西、新疆、青海
碳排放缓速增长区 (18个)	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甘肃

表2 聚类区域情况比较

分类	项目	碳排放总量 10 ⁴ t	人均碳排放量 t-CO ₂	碳排放强度 kg-CO ₂ /RMB	碳排放密度 kg-CO ₂ /kgce
碳排放高速增长区	总量均值	2.1829	4.8572	0.3584	2.7092
	增长率均值	11.56%	11.04%	-0.5%	-0.03%
碳排放缓速增长区	总量均值	2.1090	4.4727	0.2883	2.6455
	增长率均值	7.65%	6.92%	-3.72%	-0.22%

学者对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模型主要集中在EKC、LMDI、KAYA和STIRPAT模型上。虽然这些模型研究的目标相同，但是这些模型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其中，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EKC）研究的侧重点在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倒U型关系，研究范围狭窄；指数分解法LMDI模型侧重于从技术和结构角度研究碳排放影响因素；Kaya（IPAT）等式及其变型只能反映变量之间等比例的变动关系，分析某个变量对碳排放的影响时只能假定其它变量不变；因此，衍生出了STIRPAT模型，该模型系数可以反映各指标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研究的指标范围可以包括人口、经济、技术以及其它与碳排放存在函数关系的变量张佳丽（2010）。同时，这个模型着眼于国家层面衡量碳排放，既可以分析一国经济体内部完全的碳排放影响因素，又可以通过对外贸易的角度分析国际碳排放转移和泄漏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目前针对中国的区域碳排放影响因素的研究尚不充分，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而且STIRPAT模型在研究碳排放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因此，本文从人口总量、城市化、人均GDP、碳排放密度、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七个方面运用STIRPAT模型对中国碳排放区域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二、我国区域碳排放影响因素

为了研究不同因素对区域碳排放增长速度的影响，我们首先需要进行区域分类。简单的使用行政区划并不能显示出区域特征，因此，我们使用聚类

分析法将中国27个省市按照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单位GDP的增长所带来的碳排放量）以及碳排放密度（单位经济产出的碳排放量）四类指标的年平均增速作为划分依据，分为碳排放高速增长区和碳排放缓速增长区，其结果如表1所示。

此外，从表2可以看到，碳排放高速增长区9省中，东、中、西部分别包含2个、1个、6个省，比例为22%、11%、67%，以西部省份居多；碳排放缓速增长区18个省中，东、中、西部分别包含8个、6个、4个省，比例为44%、33%、23%，以东、中部省份居多。

缓速增长区内，河北、江苏、辽宁、广东、浙江分别为碳排放总量前五位的省区；高速增长区内，山东、内蒙古、河南、陕西、云南分别为碳排放总量前五位的省区。

完成聚类，我们需要重点筛选几个有可能影响区域碳排放量的因素。韩文科等指出，从中国减少碳排放的手段来看，主要有两个途径：发展非化石能源和广义节能。其中，广义节能包括结构节能和技术节能。途径可概括为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生产技术的调整（韩文科等，2012）。另外，Dietz和Rosa（1997）指出，在IPAT等式和STIRPAT模型中，技术变量包含了除人口、富裕程度以外的其他对环境产生影响的因素。因此，我们挑选了人均GDP、经济规模、城市化水平、煤炭消耗比重（代表能源结构）、第三产业比重（代表产业结构）、碳排放密度、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七个变量作为研究重点，采用1998~2012年27个省共405个观测值，运用STIRPAT模型回归分析^①，全面地从人口规模、经济规模、技术水平、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五个方面研究中国不同区域的碳排放影响因素。

回归的结果表明，碳排放高速增长地区与缓速增长地区的碳排放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差异。

1. 在两区域内，即碳排放高速增长区和低速增长区内，显著影响碳排放水平的因素（对碳排放贡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M].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9-2013.

献率绝对值由大到小)为:人均GDP、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城市化水平,且这三个指标都显著正向影响碳排放,只在高速增长区显著的指标有能源结构与碳排放密度,只在缓速增长区显著的指标有人口总量;

2. 碳排放高速增长区内,显著影响碳排放水平的因素(对碳排放贡献率绝对值由大到小)为:人均GDP、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城市化水平、人口总量,且这些指标都与碳排放总量正相关;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碳排放密度对碳排放没有显著影响。其中,就能源结构而言可能有两个原因:煤炭比重很高(81.43%),该地区经济发展严重依赖煤炭这种高碳资源,煤炭占比小幅度的减小不一定能够带来显著的碳排放量减小,“积极结构效应”很小;该地区追求经济快速增长,第二产业迅速扩张,产生巨大的能源消耗,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能源结构调整对碳排放的积极影响。而碳排放密度与碳排放水平无显著相关性,可能有两个原因:该地区技术水平较弱,碳排放密度下降幅度很小,几乎对碳排放无影响;技术进步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了单位能源消耗,从而降低了单位成本。

3. 碳排放缓速增长区内,显著影响碳排放水平的因素(对碳排放贡献率绝对值由大到小)为:人均GDP、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能源结构、城市化水平、碳排放密度,且都与碳排放总量正相关;人口总量和产业结构对碳排放没有显著影响。碳排放缓速增长区人均GDP水平要高于缓速增长区人均GDP水平。普遍来说,缓速增长区人口教育程度较高,更愿意消费低碳产品,并希望通过科技力量来改善环境;在高速增长区,人们普遍追求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就会增加环境成本、消耗能源,增加碳排放量。

一个出乎意料的发现是第三产业比重对两地区的碳排放水平无显著影响,两地区第三产业比重都不高,第二产业比重已超过50%,第三产业产生的“积极结构影响”相对较小。另外,虽然第三产业主要是具有高加工度、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等特征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几乎没有碳排放量,但是,高产值的运输业、房地产业等第三产业实质属于第二产业的附加,这些行业产值比重的增长,反而会导致碳排放量的增加。因此,两地区第三产业对碳排放的影响不显著。

三、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实证结果,本文认为我国两大区域应从以下七个方面制定碳减排政策:

1. 改善经济增长方式,建立新型考核指标。一方面,碳排放高速增长区经济增长严重依赖自然资源,经济增长方式表现为高耗能、低效益。因此,在该区域保持经济发展、提高工业化水平的前提下,要实现节能减排,就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一条低能耗、低污染、高效益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开发节能技术、引进先进技术和理念,迅速推广技术应用,提高重工业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与碳排放量;开发新能源,逐渐摆脱以煤炭消耗为主的现状;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发展金融业等第三产业。另一方面,在两区域内,政府不仅要考虑经济发展的增量,还要考虑经济发展的质量,即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应当将该指标作为一项政绩考核指标,通过新的评审机制,增强地方政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动性,为实现区域碳减排目标奠定基础。

2. 合理贯彻人口政策,积极倡导低碳生活。由于中国碳排放高速增长区的人口规模一直在不断扩大,人口增加对该地区二氧化碳排放产生明显的正向驱动效应。因此,从长期来看,应当继续贯彻落实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人口增长,减缓人口环境压力;另外,应该在区域内提升人口素质,向人们合理宣传低碳知识,倡导低碳消费方式和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引导人们进入低碳生活行列。

3. 发展新型城市化,建设低碳新城镇。城市化的消极效应在碳排放高速增长区和缓速增长区都比较突出。因此,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缓解城市化发展增加的碳排放。完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如公共交通、合理道路规划等,降低人均能耗;改变公众能源消费理念,宣传低碳能源消费,减少私家车的使用;引导城市化生产方式转向第三产业,如高技术、高科技、低能耗等企业,在经济增长方式上弱化城市化消极影响;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生态农业,回流部分原农村人口,一方面缓解城市化过程中过快的人口增长。另一方面,引导绿色的第一产业。

4. 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低碳产业。由实证分析

可得,不断改进碳排放高速增长区和缓速增长区的产业结构向第三产业发展,是目前的重要任务。通过西部大开发战略、人才引进、FDI等措施,大力发展金融业等服务业,引进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大力发展低碳产业,主要包括新能源产业,例如太阳能、生物质能等,达到高效率、低排放、少污染的产业结构发展目标。

5. 优化能源结构,提升能源效率。能源结构与碳排放缓速增长区碳排放显著正相关,煤炭比重的下降起到了减排作用,但影响程度较小。另外,在碳排放高速增长区,煤炭占比很高,而严重依赖高碳资源发展的经济模式,使得能源结构的小幅度改变无法显著降低碳排放。而且,煤炭等自然资源是不可再生资源,现有能源结构违背了可持续发展、低碳发展战略。

6. 建立企业奖惩制度,加强节能技术开发。碳排放密度显著正向影响缓速增长区的碳排放水平,体现该地区对低碳能源技术利用效果显著。因此,缓速增长区应继续利用这一减排机制,引导高速增长区企业采用低碳技术。

7. 建立碳交易制度,实现市场化减排。在控制碳排放的过程中,不仅要依靠政府政策支持,还需要运用市场机制来自动调节。科斯定理告诉我们,清晰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应该将企业通过技术提升而节约的碳排放权利作为一种产权,明确碳排放权的界定、排放额度的分配以及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完善配额发放年限、投资者门槛、惩罚措施等规则。通过这一机制,把排放权配置到产

生效益最大的企业中去,可有效平衡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存在的“两难”问题。

[参考文献]

- [1] 葛全胜,方修. 中国碳排放的历史与现状[M]. 气象出版社, 2011.
- [2] 韩文科,康艳兵,刘强. 中国2020年温室气体控制目标的实现路径与对策[M].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2.
- [3] 张佳丽. 基于STIRPAT模型的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研究[D]. 湖南: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2011.
- [4] Birdsall H H, Lane C, Ramser M N, et al. Induction of VCAM - 1 and ICAM - 1 on human neural cells and mechanisms of mononuclear leukocyte adherence.[J]. Journal of Immunology, 1992, 148(9):2717 - 23.
- [5] Copeland B R, Taylor M S. North - South 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4, 109(3):755 - 787.
- [6] Dietz T, Rosa E A. Effects of Population and Affluence on CO2 Emissions[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997, 94(1):175 - 9.
- [7] He K, Lei Y, Pan X, et al. Co - benefits from energy policies in China[J]. rgy, 2010, 35: 4265 - 4272.
- [8] Kuznets 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Capital Formation and Financing[J]. Numerical Heat Transfer Part A - Applications, 1955, 48(8):763 - 790.
- [9] Shafik N, Bandyopadhyay S.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Time Series and Cross - Country Evidence[J].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992.
- [10] Wing I S, Eckaus R 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historical decline in US energy intensity for long - run CO 2, emission projections[J]. Energy Policy, 2007, 35(11):5267 - 5286.
- [11] Xu, G. Jiang, Z..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echnical progress, structural change, and energy efficiency in the United States [J]. Science of Science and Manag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7, 28 (3): 104 - 107.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gional Carbon Emission in China

Cui Jia¹, Kong Ying², LuQiang¹

(1.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 Tsinghua University, Guangdong, Shenzhen 518055)

Abstract: Nowadays, China has become the world's No.1 that generates the largest amount of carbon emissions. Therefore, it's necessary to do more research on it.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27 provinces from 1998 to 2012, the paper does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regional carbon emissions exerted by total population, economy, and other 7 factors. Research results: improvement of the economic growth mod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type of assessment indicators, optimization of the energy structure and improvement of energy efficiency will be conducive to the reduction of carbon emissions.

Keywords: Regional Carbon Emissions; Determinants; the STIRPAT Model; 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

(收稿日期: 2016-08-19 责任编辑: 靳叶)

【博士论坛】

城市老工业区搬迁改造方略

赫曦滢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研究所, 吉林 长春 130033)

[摘要] 本文将城市老工业区的发展现状、突出问题和发展前景作为研究老工业区调整与更新的三个切入点, 分析了老工业区污染工业发展的两难境地和企业搬迁行为面临的现实挑战, 指出实现城市老工业区的转型与更新, 要始终围绕结构调整、体制创新、城市功能完善、环境保护和社会民生等方面, 全面推进老工业区产业、城市、社会及环境的综合调整升级。

[关键词] 城市老工业区 吉林省 转型 改造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6)05

[基金项目] 吉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吉林省中部城市群供需拉动效应研究》(20160418044FG);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吉林省城市老工业区搬迁改造问题研究》(2015ZD02)。

[作者简介] 赫曦滢(1983—), 女, 满族, 博士, 吉林长春人,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东北地区城镇化。

21世纪以来, 世界经济的发展模式日新月异, 重工业的发展环境与方向发生变革。信息网络技术带动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兴起与发展, 柔性和虚拟制造业已经成为高端制造业的新标签。反观中国老工业城市, 经济和体制的双重因素制约了工业发展模式的转型与升级。产能过剩、结构不合理和自主创新能力弱等问题日益突出; 产业的布局不够合理, 不能支撑城市可持续发展; 生态环境也面临巨大挑战。为此, 2011年, 中央和国务院开始着手编制《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专项规划(2011-2020)》(以下简称《规划》), 我国老工业基地城市进入全面调整改造的新阶段。《规划》范围覆盖了我国从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的65个老工业基地城市, 其中包括吉林省7座老工业基地城市, 11个城市老工业区。随后国务院又发布了《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实施意见》以及《国家支持东北振兴若干

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 这为城市老工业区转型与更新改造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同时也提出了时间表和新要求。

新世纪以来, 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从小高潮到低谷的图景。2003年到2012年, 东北三省地区国内生产总值10年的时间翻了两番多。但是, 2013年以来, 东北地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增速不断减缓。严峻的经济形势倒逼城市老工业区转型与更新改造。

一、城市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的 必要性与有利条件

(一) 吉林城市老工业区是中国重工业的“铁锈”区域

吉林的城市老工业区大多数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和“三线”建设时期规划的，由国家统一布局、以重工业骨干企业为依托聚集形成的工业区。“一五”计划期间，在重点建设东北工业基地的方针指导下，在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中，有11项布局在吉林，吉林成为当时中国工业建设的重点区域。在建国初期，老工业区为打造中国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老工业城市的形成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至今仍然是吉林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和重要支撑。但是，从重工业发展的潮流来看，这些企业现在大多位于城市中心区域，已经成为落后产能最集中的区域。工业污染严重、基础设施老化、用地紧张、安全隐患突出、困难群体较多、棚户区改造任务重等问题愈加突出，不仅与城市功能完善和空间布局的优化的要求不相适应，也对企业扩能提质造成了空间约束，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铁锈”区域。

（二）吉林城市老工业区以资源输出型产业为主导

按照国家确定的老工业区范围和标准，吉林的7座城市中共有11个城市老工业区，这11个城市老工业区占地面积约89平方公里，其中工业用地约40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45%，共有工业企业752户，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37户。吉林的城市老工业区基本都是以资源输出型产业为主，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按照“毛、糖、革、纸、酒、药、油”的产业布局，根据吉林的资源优势，各城市陆续建成一批大中型资源型企业。拥有丰富煤炭资源的辽源市曾经煤炭产量占全国煤炭产量的1/29，煤炭业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80%以上，而今已经成为了典型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往日的辉煌不再；白山市一直以煤炭、林业和铁矿石生产为主导的资源型经济结构也导致了其形成了以资源开发和原材料输出为特征的工业体系；通化市以医药、葡萄酒、机械和纺织等行业为主，通化钢铁公司也是我国重要的钢铁生产企业；白城市以发电、麻纺、造纸、水泥等产业为主导，资源型企业大多布局在平齐铁路西侧和齐阿铁路沿线；吉林市因为拥有丰富的水、矿产和森林资源，国家将大批重污染的资源型企业布局于此。东北十年振兴，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些早该淘汰、限制和转型的产能，不降反升，经济结构中传统产业和产品，尤其是重工业仍占比重

较大，资源输出型产业依然占据半壁江山，重工业“一柱擎天”和产业结构单一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治，“原”字号、“初”字号产品居多，结构调整和升级转型仍在爬坡过坎。不少大中型企业，仍处于高端产业中的低端。

（三）吉林城市老工业区工业基础雄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吉林老工业区工业基础雄厚，而且具有较为丰富的水利、森林、矿产等资源，仍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首先，老工业区的资产存量非常大。吉林由于前期的建设积累了大量资产，很多企业虽然面临产业转型的考验，但在国内仍旧是行业的龙头老大。现有的规模以上企业近300家，工业固定资产占全省比例高，这些企业每年创造的利润仍十分可观。巨大的资产存量将会成为老工业调整改造的重要推动力量；其次，老工业区的产业规模大。2012年，吉林的11个城市老工业区范围内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占全省的近30%。在调整改造完成后，老工业区企业的发展空间将更加广阔，极大地带动产业的发展；再次，老工业区在吉林的产业地位重要。城市老工业区中不乏一大批在能源、军工、装备制造和原材料等方面发挥基础性、战略性作用的大中型企业，有大型骨干企业作为支撑，高素质的工人队伍作为基础，许多产品的技术水平在国内首屈一指；最后，老工业区的科技创新仍旧有较大潜力。老工业区所在的7座城市大都分布在吉林省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中部地区，该区域拥有高等院校约30所、国家级技术研发实验机构10多个，拥有大量的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具有研发重大技术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础条件。另外，吉林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些都为老工业区的搬迁改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城市老工业区搬迁改造面临的挑战

当前，吉林城市老工业区搬迁改造中面临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第一，部分城市老工业区在搬迁改造中发展定位不准确，规划不科学，搬迁企业承接地的选择不合理；第二，在搬迁和改造过程中，一部分污染土地的治理不够彻底，延续粗放的土地利用方式，大拆大建劳民伤财，需要政府的规范与引导；第三，城市老工业区在搬迁改造中延续

以往的城市规划思想，内部空间布局不够合理，限制了企业的发展和城市的扩容；第四，老工业区就业压力大，收入水平低。吉林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本来就处于全国的中下水平，但老工业区居民的收入水平才相当于吉林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4/5左右，解决这些困难群众的生活问题成为老工业区转型与更新改造的核心问题；第五，国有企业改革相对滞后，历史遗留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给搬迁增加了难度。一些大中型国有企业虽然经过多年改革，但改革成效一直不大，一些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的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困难重重。

除此之外，吉林城市老工业区搬迁改造还面临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企业搬迁行为本身的困境与造成的负面影响；二是产业与企业转型升级中面临的严峻形势。两个方面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形成了制约城市老工业区发展的主要障碍，具体如下：

（一）老工业区的污染企业发展面临两难境地

吉林城市老工业区中污染企业很多，而且很多企业规模庞大、经济效益良好，想在短期内完全解决这些企业存在的问题有相当的难度。有相当多的企业存在搬迁难度，搬迁效果和预期有较大差异。这些企业治污手段一般都要低于国家规定标准，即使部分企业能够达到国家标准，还是不能满足城市居民对环境的期望。这类污染企业发展举步维艰：一方面，如果在城区内勉强生存，必须要停掉污染工序，这不仅影响生产，而且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终的解决方案还是向外围搬迁并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企业虽然有搬迁的诉求，但实际难度较大，致使搬迁成为空中阁楼。第一，搬迁行为本身需要投入大量资金，除了购置和更新设备，还需要花费新征土地费用；第二，搬迁完成后，企业需要进行多年的建设才能恢复到搬迁前的生产状况，适应新环境需要时间；第三，企业在征地时，要对很多因素进行全方位的综合考虑，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慎重挑选，市场份额在这段时间必然会受到损失。

另外，二次搬迁问题在中国城市的工业郊区化过程中也很突出，负面效应也非常明显。主要原因主要是一些政府的规划部门与企业目光短浅，缺乏长远意识，搬迁到城乡结合部的企业，由于城市迅速的扩张，企业污染和扰民等问题还会反复出现，

企业不得不选择再次搬迁。很多企业在多次搬迁中造成了巨大损失，甚至破产倒闭，这与不合理的搬迁行为有极大关系。

（二）企业搬迁行为的领导干预问题突出

当前，老工业区搬迁过程中领导干预问题比较突出，行政力量过于强大，带来诸多弊端。首先，地方领导与企业看待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均有差异，对企业搬迁及其发展进行过多干预，非但不能确保企业的长远利益，而且可能限制企业的活力；其次，领导干预主要的目的是壮大本地区工业发展的整体实力，确保经济增长，防止企业出现“外流”现象，而这种思想不利于建立完善的市场和竞争机制，也不利于城市的长远发展；最后，当前的搬迁规划空间跨度有限，承接区域在城市周边，考虑基础设施和搬迁成本等因素，企业不可能搬迁过远，从长远角度看，这种策略不能彻底解决对居民区的干扰问题，为企业二次搬迁埋下隐患。

（三）分散搬迁与近域搬迁问题仍是制约企业发展的重要原因

近域搬迁的根源在于企业对城市基础设施过于依赖，尤其是公共交通的便利程度、污水管网的建设情况等对企业搬迁行为有重大影响。这些基础设施都是由政府部门出资建设的，企业不能单独建设，而企业在公共设施齐全的区域布局就能更好地利用这些设施，降低生产和环保成本。因此，如果基础设施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必然会导致企业搬迁行为出现分散化，自主择址到成本低、设施齐全的区域，使政府对企业的管理陷入被动状态。在走访调研中我们也发现，许多搬迁企业分布十分分散，即使在制定了搬迁计划的情况下，也并没有按要求进驻开发区，自身又不能形成完整的工业区，在基础设施、生活服务设施、排污设施等方面面临困境。

（四）产能过剩、要素驱动产业转型升级不可持续问题复杂艰巨

吉林城市老工业区是我国产能过剩的重灾区。如何适应新常态的新要求，化解产能过剩危机是其面临的重要挑战，不但要考虑通过产业重组、转型升级、环境治理等克服要素驱动产业转型升级不可持续的诟病，而且要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入手，真正使市场“活”起来，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城市老工业区搬迁改造对策分析

经济新常态给吉林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吉林城市老工业区要围绕结构调整、体制创新、城市功能完善、环境保护和社会民生几个方面，打出转型升级和更新改造的组合拳。本文主要从企业搬迁行为和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企业活力等方面提出如下对策建议，以期全面推进老工业区产业、城市、社会及环境的综合调整升级。

（一）加大政策扶持和宏观调控力度，降低企业的搬迁和环保成本

综合考虑到企业现实搬迁需求，将老工业区企业搬迁纳入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和城市规划中去。政府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力争降低企业搬迁和入驻工业园区的成本。就目前我国城市发展的方向来看，除了高新技术开发区外，其他类型的开发区都会对入驻企业进行选择，即只有无污染或少污染的企业才能入驻，而建设中的各个城市老工业区的承接区也对入驻门槛有所要求，很多搬迁企业因为环保不达标而不能入驻。为了避免这些企业不搬迁或分散搬迁给改造和管理造成困难，政府有必要进行统一的土地规划，必要时设立一些专门接受污染、扰民企业的工业园区，对这些区域按照国家环保要求进行整体规划和管理。建议对开发区进行分类建设，如按照污染程度划分为重污染和轻污染，或者按照污染类型分为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噪声污染等，根据不同类型的企业和环保需要，建立污染处理设施和相应的社会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通过建立统一的标准化厂房，让企业接受“定制”服务，这样既可以改变搬迁企业布局分散、不便管理的状况，也可以减少企业的负担，降低环保和搬迁成本。

（二）保障企业经济利益，为搬迁企业提供更多土地补偿

从老工业区企业搬迁的现实看，资金短缺是困扰企业搬迁的最大障碍，它造成了企业搬迁的进退两难，许多企业搬迁上马迟缓与持续时间过长等问题也直接与之相关。因此，政府要力争为企业提供更为坚实的经济保障。对于搬迁企业而言，要让企业得到更多的土地补偿金，以法律或规定的形式对土地补偿金的分配方式及比例进行严格管理，

保障企业的合法利益。在政府方面，要妥善处理土地出让金的分配问题，应当从地区和全市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将资金投入到工业发展上来，政府要从城区土地功能的“退二进三”所获得的出让金中拿出更多的份额调剂城市工业的发展。针对企业搬迁的资金不足问题，可以鼓励搬迁企业发行企业债券、企业资产重组，支持银行优先贷款等形式来解决。

（三）对老工业区的整体功能进行适时优化，布局力求合理

考虑城市用地功能的相容性，原有工业用地的分类不应仅局限于以污染度作为指标的一、二、三类，可以存在新型的工业用地分类。因而可以适量增加都市工业用地，但同时也不能对此进行极端发展，应根据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和产业基础发展可持续性的都市产业功能，既要发展创意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更要跳出现有产业的限制，主动占领产业价值链的高端，发展占用资源少、产业带动强的高端产业。

（四）因地制宜选择接续产业，实施多元化产业发展战略

现有规划中各城市对老工业区的腾退区域基本都选择了“退二进三”的发展模式，这既符合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方向，也符合城市发展的规律。但是，相似的发展模式也容易产生过度竞争，导致老工业区第三产业多而不强的局面。因此，发展接续产业也要因地制宜，优先发展有一定竞争优势、发展前景大的产业。实施城市老工业区产业转型的具体行动计划，除了要重点发展主导产业外，还要积极发展一些支柱产业，实施吸纳就业的重点工程。重点发展一批再就业项目，走产业多元化发展道路，发挥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效应。加快发展旅游、养老、健康等产业和电子商务等新兴业态，培育消费新热点。同时，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对老工业区的支持力度，建设接续替代的集聚区和产业园区。

（五）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激活国有企业发展动力

根据《国家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的精神，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创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对老工业区的国有企业进行系统化的改革，支持企业建立改革试点，争取中央的政策支

持。对于国有企业，要按照中央统一部署，结合各城市的特点，研究央企与地方协同发展政策，组建跨区域的国有资本投资和运营公司，对经营状况不佳的企业进行重组或退出，增强央企的生存和适应能力。同时，要积极整合企业资源，通过股权多元化的方式将资源投入到战略性产业和新兴领域，支持央企和地方共建产业园区，用股权转让收益支付改革成本；对于地方国有企业，要进行分类改革，设立专项资金用以支付改革成本，充分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通过国有资产的证券化和本土化。

（六）开展老工业区产学研改革试验，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老工业区转型和改造归根到底要靠科技创新支撑长期发展，要促进产学研的结合，打破制约发展的体制障碍，打通产学研之间的连接通道。因此，

在转型过程中要建立一种综合性的发展机制，老工业区转型和空间重构设计较多的部门，如规划部门、环保部门、土地部门、房产部门、城建部门、计委、经委、银行等，需要各部门之间相互协调，共同决策。一方面，要充分重视专家、学者的作用，最好能开展专题研究，进行深入调查；另一方面，由市政府牵头，召开涉及部门之间的协调会，研制切实合理的搬迁方案。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良性发展机制，推进吉林城市老工业区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 [1] 刘文波,何勇.腾笼换鸟大转型—东北城市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纪实[J].人民日报,2015-03-11.
- [2] 冯建.转型期中国城市内部空间重构[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

Strategy for the Relocation of Urban Old Industrial Areas

He Xiying

(Social Science Academy of Jilin Province, Jilin Changchun 130033)

Abstract: Jilin province is the cradle of China's heavy industry development. There are many large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 the province, and worthy of the name of the old industrial base, in the period of planned economy o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for the city of jilin province has 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social developmen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society, urban old industrial zone of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appeared constantly, because of the expansion of city, is located in the edge of the city area in the past the old industrial area, evolution of the urban core is an urgent need to whole transferring and function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jilin old industrial city transformation and the urgency and necessity of updating, through analysi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old industrial area,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i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government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and control.

Keywords: Urban old industrial Area; Jilin province; Transformation; Reform

(收稿日期:2016-08-19 责任编辑:廖令鹏)

【博士论坛】

基于竞合机制的京津冀港口群发展

佟继英

(辽宁大学, 辽宁 沈阳 110036; 唐山学院, 河北 唐山 063000)

[摘要] 本文从货物吞吐量、分货种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外贸吞吐量等方面介绍了京津冀各港口运营状况及竞争现状, 分析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下港口群竞合发展的必要性, 从优化港口功能布局、建立港口合作机制、以市场为载体优化组合资源、完善集疏运体系、加强无水港建设等方面, 提出了京津冀港口群竞合发展策略。

[关键词] 京津冀 港口群 竞争合作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6)05-0108-05

[基金项目] 2015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港口-产业-城市”融合的京津冀港口群协同发展对策研究”(编号: HB15YJ01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全球经贸体系重构下中国经济改革深化与发展方式转型研究”(编号: 14JJD790021)。

[作者简介] 佟继英(1975—), 女, 河北唐山人, 辽宁大学博士研究生, 唐山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国际贸易理论及其应用。

一、引言

港口作为一国重要的基础设施以及对外贸易的重要枢纽, 已发展成为具有多元化功能的产业, 其竞争形式也从单一港口发展转化为区域港口群的形式。港口群各港口之间的资源共享、错位发展, 竞争与合作并存, 将有利于避免港口群内部过度竞争所导致的资源浪费、重复建设以及闲置等问题。京津冀及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已经被列入为我国区域发展的三大战略, 港口作为对外贸易的桥梁,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京津冀地区港口间距离较近, 由南到北依次分布着黄骅港、天津港、唐山港(包括京唐港区

和曹妃甸港区), 各港口货源腹地有一定重合。依据港口各自优势及腹地状况, 整合资源, 将有利于避免由于同质竞争、盲目扩建所造成的资源浪费、低效率、高成本问题, 有利于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

二、京津冀港口群发展现状

(一) 各港口基本情况

天津港是我国连通中俄蒙经济走廊和新欧亚大陆桥的重要起点, 是环渤海地区最大的综合性港口之一, 同时也是目前世界上等级最高的深水人工港之一, 在京津冀港口集装箱及外贸运输中占有绝对优势, 目前拥有包括集装箱、煤炭、矿石、原油及

制品、大型设备、液化天然气等专业化泊位，其30万吨级航道、复式航道也已经开始正式运行，并且已经成功接卸了装载量为1.8万和1.9万TEU的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船舶。近年来天津港积极加强在内地的无水港布局，目前已经在石家庄、保定、张家口、保定、北京朝阳、北京平谷等内地十二个省市建立了23个无水港，并将进一步增强其无水港覆盖密度，增强其与京津冀地区的联系。

唐山港腹地煤矿、矿石资源较为丰富，其运输货种主要包括矿石、煤炭、水泥、机械设备、集装箱等，通达欧、亚、美等20多个国家及地区。其中曹妃甸港区是天然深水大港，具有不冻不淤的优势，从2005年矿石码头通航以来，已与澳大利亚、巴西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通航，是矿石、能源等大宗商品的集疏港，2014年货物吞吐量首次超过秦皇岛港，达到近2.9亿吨，成为河北省的第一大港。近年来，唐山港的集装箱运输发展迅速，其中2014年吞吐量为112万标箱，为河北省首个年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00万标箱的港口。

秦皇岛港是著名的天然不冻港，地处华北与东北的衔接地，有着便利的交通条件，为北煤南运的主要枢纽港及北方重要的能源输出港之一，港口年均煤炭输出量占全国的50%以上，是“三西”煤炭基地的重要出海口岸，主要是将来自山西、内蒙、河北、山西等地的煤炭输往华南、华东以及亚洲、欧洲、美洲等国家和地区。2014年完成货物吞吐量3.82亿吨，同比增长4.69%，集装箱吞吐量完成41万标箱，同比增长6.8%，创历史新高。

黄骅港则是华北地区的重要对外开放口岸和第二大煤炭输出港，地处渤海湾穹顶处，是环渤海各港口中内陆运距最短、运输成本最经济的港口。其腹地广阔，腹地人口、经济总量及面积占全国1/10左右，包括了山西、宁夏、内蒙及豫北、冀中南以及晋西南等地区。为我国主要的煤炭转运枢纽港，其煤炭港区航线已经达到了我国华南、华北以及韩国、日本和东南亚的部分国家和地区。虽然集装箱运输起步较晚，吞吐量不大，但目前也已经有包括到辽宁营口港、广州南沙港和青岛黄岛港的3条内贸航线和2条外贸航线。总体而言，内贸货物量占黄骅港货物吞吐量的近九成，煤炭则占货物吞吐总量的70%，矿石占20%。

（二）各港口运营能力

1. 各港口货物吞吐总量

货物吞吐量是港口反映其综合营运能力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指标。2008~2014年，京津冀港口吞吐量呈现逐年攀升的态势，年均增长率达到11.1%，其中天津港7.21%，唐山港30%，秦皇岛1.5%，黄骅港14.97%。

从排名来看，2008~2010年，天津港货物吞吐量排名第一，之后依次为秦皇岛港、唐山港和黄骅港。从2011年至今，情况发生逆转，天津港货物吞吐量仍然排名第一，但是唐山港后来居上，增长迅速，已远远超过了秦皇岛港。天津港占比从2008年的44.78%减少到2015年的36.22%，唐山港从13.66%增加到33.6%；秦皇岛港从31.74%减少到18.38%；黄骅港从9.82%增加到11.8%，其中唐山港发展最为迅速。目前在京津冀四大港口中天津港由于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经济地位，枢纽大港的地位保持不变。同时，自唐山曹妃甸港开港通航以来，贸易综合大港建设逐步推进，30万吨级深水泊位优势进一步呈现，已成为北京产业转移的最大承载区，货物吞吐量已达到2.9亿吨，增速连续九年保持世界第一，其中矿石占货物吞吐总量的50%左右，已经成为北京较为便捷的出海通道。

2. 各港口分类货物吞吐量

从货物种类结构来看，近年来推动京津冀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长的主要货类是煤炭、矿石。从货类的结构化分解看，2008年以来，矿石对京津冀港口吞吐量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20.44%；煤炭对京津冀港口吞吐量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47.59%；油品对京津冀港口吞吐量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6.61。这主要是因为京津冀地区各种焦煤、非金属矿资源丰富，腹地工业基础雄厚，尤其是钢铁产能规模较大，也导致港口间存在同质化竞争问题。

随着京津冀腹地钢铁工业的发展，各港口铁矿石吞吐量也大幅上升，年均增长率达到34.2%，各港口钢铁吞吐量占货物吞吐量的比重较大，已经形成以天津港和唐山港为主、秦皇岛港和黄骅港为辅的铁矿石运输格局。就铁矿石货物吞吐量占比来说，唐山港铁矿石业务发展迅猛，在京津冀铁矿石吞吐量占比已经由2007年35.31%，增加到了目前的54.9%，尤其是曹妃甸港区，其铁矿石吞吐量已超过天津港；天津港铁矿石吞吐量由52.80%下降到34.47%。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天津港和唐山港进口

铁矿石交叉规模约达到6300万吨,约占京津冀港口铁矿石进口量的25.2%。

京津冀港口特别是河北省的三个港口历来是我国重要的煤炭运输港口。其中秦皇岛港是我国最大的煤炭中转港口,占全国港口下水煤炭的50%左右,其煤炭库存与吞吐量曾一度被视为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在京津冀港口煤炭吞吐量占比中一直保持在第一的位置,但是同其他港口的差距逐渐缩小。目前,京津冀其他港口也在积极依托腹地煤炭资源的优势,积极发展煤炭运输。唐山港区煤炭吞吐量在京津冀港口的占比在2007年仅为3.89%,目前直追秦皇岛港,已达到28.63%;黄骅港目前煤炭年吞吐能力为1.83亿吨,2014年完成煤炭吞吐量1.37亿吨,同比增加523万吨,其煤炭吞吐量占比变化不大;天津港目前煤炭年吞吐能力为8500万吨,2014年完成煤炭吞吐量7837万吨,同比增加1352万吨。目前,各港口对煤炭资源的争夺日益激烈,都积极进行后续工程建设。其中曹妃甸港区于2015年7月试产了设计吞吐能力为5000万吨的煤二期码头工程,预期两年后煤炭吞吐能力将达到2.5亿吨;京唐老港正在新建装船能力达3600万吨的新煤码头;黄骅港正在规划建设吞吐能力为1亿吨的煤炭五期工程。

3. 各港口集装箱运输状况

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已经成为衡量港口运营能力和先进性的重要指标,其流向构成、数量构成已经成为港口在国际、地区交通地位的重要体现。以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提出为契机,近年来京津冀经济发展状况良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持续快速增长,整个港口群集装箱吞吐量已经由2007年的760万TEU增加到2014年的1591.8万TEU,增长109%,年增长率达到29.92%。其中天津港具有绝对优势,主要承担外贸干线运输,近年来其海铁联运发展迅速,2015年1月,首发了天津港到石家庄的管内集装箱班列,即集装箱在天津卸货后可以直接通过火车专列抵达石家庄南站,大大提高了输运速度。截止目前,天津货运中心总共有国内集装箱班列9条,便利的国内运输,使得其铁路集装箱运输比重大幅攀升。而对河北省而言,集装箱运输是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新业务,三港四区吞吐量加起来也仅为天津港的13%,其规模相对较少,且航线也不多,容易造成运输货物积压。

4. 各港口外贸吞吐量

外贸吞吐量反映了港口及其经济腹地的外贸依存度,“一带一路”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红利、天津港自由贸易区的设立都使得京津冀地区未来对外贸易更加蓬勃发展。2015年1~9月,京津冀港口外贸吞吐量为45244万吨,其中天津港为22150万吨,唐山港为20597万吨,秦皇岛港为1146万吨,黄骅港为1351万吨,分别占港口群外贸吞吐量的48.96%、45.52%、2.53%以及2.99%。其中唐山港外贸吞吐量的增长最为迅速,从2007年的占比19.43%增加到了2015年的占比45.52%,其与天津港的差距在逐渐缩小,而秦皇岛港和黄骅港相对占比较少。

三、京津冀港口竞合发展的必要性

海洋运输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必然会扮演者极为重要的角色。目前对于京津冀四港五区来说,存在着腹地交叉的现象,腹地、货源的争夺也极为激烈。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目前京津冀各港口间的竞争更多的体现在对腹地资源的竞争,是腹地货源的重新分配,这种竞争并不能增加港口群总的货运量,反而会使得港口群内耗严重,整体实力下降,整个港口群资源使用效率低下,不利于与周边港口的竞争。虽然目前京津冀港口间存在同质化竞争的现象,但主要局限在部分港口和货类之间,尚不能形成京津冀港口发展中的主要和普遍问题。京津冀协同发展以及《关于加快沿海港口转型升级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强力支撑的意见》等政策意见的出台,为京津冀港口群竞合发展提供了政策保证。京津冀港口存在着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各港口特色、发展重点不同,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作用与地位也存在着差异,因此,可以通过港口间的分工合作,互通有无,对中小港口实现整合,实施港口群协同发展、竞合发展战略,来有效遏制无序、同质化竞争问题。因此,京津冀港口群竞合发展既有其可能性,又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

京津冀港口竞合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首先,将合作与竞争纳入京津冀港口发展过程中,将有利于促进京津冀地区与辽宁沿海经济带、山东沿海经济带、黄河三角洲等区域的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形成整体实力,完善港口生产力布局,增强京津冀整体经济实力,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目标的实现;其次,京津冀港口群竞合机制的建立将有利于

进一步加强三地的经济合作，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有利于京津冀地区城市功能拓展，为化解过剩产能、产业转移提供空间，进一步促进京津冀地区港城产的协调发展；最后，通过建立港口群竞合机制，将有利于统筹港口集疏运体系建设，提升区域国际航运市场竞争能力，有利于京津冀地区的对外开放，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加强区域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建设。

四、基于竞合机制的京津冀港口群发展思路

（一）实现港口错位发展，优化功能布局

京津冀港口应以培育全国知名大港为目标，共同建设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打造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强大引擎和京津冀出海口。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契机，构建衔接中俄蒙、新亚欧打等经济走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港群体体系。在各港口功能定位上，天津港应依托现有港口优势，以集装箱的存贮和运输为主要业务，而河北省港口重点是支持天津港发展集装箱运输，以矿石、石化、煤炭等能源运输为主。

其中天津港作为环渤海地区的枢纽港，应依托其综合性较强的优势，着力提升集装箱吞吐和中转能力，强化物流运输，将其建设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国际贸易大港；增强港口服务能力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采取多种措施引导临港产业优化布局，加强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积极发展金融、信息物流、运输等生产性服务业，充分发挥其在京津冀港口中的核心地位。唐山港应依托腹地丰富的矿石资源，依托深水大港的天然优势，继续发展煤炭和矿石运输，其中曹妃甸港区应侧重发展“10万吨级以上”大进大出的泊位，京唐港区侧重发展“10万吨级以下”泊位；应依托自身优势，积极承接京津产业转移，建设成为北京主要的出海口。秦皇岛港应继续发挥其煤炭运输大港的优势，作为北煤南运的大通道，为延长煤炭产业链提供低成本、高质量的运输服务；优化港口功能，继续深化实施山海关港区建设工程，将散货功能逐渐由西港区调整到东港群，并依托其自身优势，逐渐扩展杂货运输及旅游客运业务。黄骅港应继续依托其煤炭大港的优势，继续以煤炭、石油化工产品作为主，积极推进综合港区二期工程建设，加大煤炭、矿石、原油等泊位建设。

（二）强化顶层设计，建立港口合作机制

京津冀各级政府应为港口协同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强化顶层设计，建立港口群之间的有效合作机制，充分借鉴国内外港口群竞合发展的先进经验，根据腹地货源和港口各自特色、优势，整合资源，形成优势互补、分工合理、合作竞争的格局，不断优化京津冀区域港口的合理分工和产业布局。

就集装箱运输而言，其对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及泊位的要求较为严格。港口群应把基础设施最为优越、岸线资源最为丰富的港口，作为集装箱运输中心枢纽港，同时将周边港口发展成配套港以及专业港和分流港，从而可以避免对腹地资源的争夺。天津港不论是在吞吐量、货源、货物流向上都处于绝对的优势。可以依托天津港固有优势将其作为京津冀地区的综合性枢纽港和集装箱干线港，以外贸运输为主，不断集聚箱源、拓展航线。河北省各港口近期集装箱运输应以内贸线、内支线和近洋航线为重点，远期则可以结合京津冀集装箱运输布局的调整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状况，适当发展远洋运输。应依托港口基础设施及腹地优势，着力发展煤炭运输，逐渐形成秦皇岛东港区、唐山曹妃甸港区和京唐港区、黄骅港煤炭港区共同发展的总体格局，未来增量将主要由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和黄骅港煤炭港区承担。目前矿石在京津冀港口吞吐量所占比重加大，各港口货种不一，今后其矿石码头建设应结合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京津产业转移，重新布局，各自针对不同的经济腹地。其中的铁矿石码头应该继续发唐山曹妃甸港区和京唐港区的优势，将其和天津港共同建设成为京津冀地区最重要的中转接卸基地，成为环渤海中北部地区重要的铁矿石外贸进口接卸港，为首钢、唐钢等钢铁企业及临港冶金企业提供运输保障；黄骅港综合港区主要为冀中南等地区腹地提供矿石运输服务，相应布局建设矿石码头；秦皇岛港将以东港区矿石码头为临近的钢铁企业提供矿石装卸服务。

（三）强化资本合作，以市场为载体优化港口资源

2014年8月河北港口集团与天津港集团共同出资组建的渤海津冀港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在优化京津冀港口合理分工和产业布局方面开了先河，其成立对完善京津冀港口功能布局、增强港口集疏运体系建设、实现京津冀港口优势互补、提升区域国际

航运市场竞争能力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今后京津冀港口应继续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采取如建立京津冀港口投资平台等市场化手段,通过资产重组和股权置换等方式,实现港口资源的整合重组,促进港口群的协调发展,形成统一的港区规划、投资、建设、运营、服务体系。

(四) 港城产融合发展,完善集疏运系统

京津冀地区应依托区域优势,培育临港工业园区,充分发挥港口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不断调整与优化各港口的功能与结构,避免港口与腹地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不匹配所带来的资源浪费,实现港城产融合发展,有效支持腹地产业结构的成功转型。

为架起港口与腹地之间的桥梁,今后要进一步加强港口对腹地的带动作用,构建京津冀现代综合交通网络。京津冀应不断完善港口集疏运体系,构建以港口为中心的陆、海、空综合集疏运大通道,实现港口之间的无缝连接。加快包括机场、铁路、高速公路、深水航道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建立设施完备、集疏运体系顺畅、布局合理的港口基础设施。推动京津冀港以“市场运作、利益共享”模式构筑港口群内支线运输网络及港口企业整合和港口货源积聚等。积极推进京津与河北各市之间城际、城郊铁路的建设,完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提高交通运输的便利性,打造轨道上的京津冀。水路方面,应大力扩展水水中转业务,积极完善四港五区之间的互相支撑、互相喂给、高效畅通的航线布局;铁路方面,加快推进张唐、唐曹等城际铁路建设,构建港口后方疏港铁路网建设,逐渐缩短城市

与港口之间、城市之间的距离。打造港口与后方腹地之间的快速、顺畅的综合运输通道。

(五) 依托无水港建设,提升港口辐射功能

京津冀无水港的建设不仅有利于提高港口的辐射功能,而且更加有助于密切三地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三地现代服务业、物流业的发展。目前,京津冀无水港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背景之下,目前区域无水港建设已经进入扩容升级阶段。京津冀各级政府应积极推动,按照政府推动、市场主导的原则,继续积极推动无水港建设,充分实现港口功能的扩展,将其打造为三地区域经济发展的门户、扩大对外对内开放的重要平台,进而在整个区域内建立高效便捷的现代物流体系,依托港口、无水港建设打造临港经济开发区,增强对区域外企业和高端要素的吸引力,加强港口对区域经济的辐射功能。

[参考文献]

- [1] 代宝. 当代超越竞争战略的和谐内涵[J]. 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 2010, (5).
- [2] 刘静. 浅析环渤海地区港口协同发展[J]. 交通企业管理, 2014, (1).
- [3] 陈森. 港口群内港口竞争与合作研究[D]. 上海海事大学, 2007.
- [4] 焦知岳, 张冬梅. 京津冀一体化下港口群发展竞合分析[J].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15, (8).
- [5] 薛晶晶. 基于时间Petri网的内陆港集装箱物流系统的建模与仿真[D]. 长安大学, 2012.
- [6] 2004 - 2015年中国港口年鉴.
- [7] 中国港口网<http://www.chinaports.com/>.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Port Group Based on Competing Mechanism

Tong Ji ying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6; Tangshan College Tangshan 063000)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troduction of port in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province, this paper analyses their 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status, including cargo throughput, container throughput and foreign trade throughput. Secondly, it puts forward the necessity of the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of Port Group under th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province. And then, it proposes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competition and development, including optimizing harbor distribution, establishing cooperation mechanism between ports, reorganizing resources relying on the market economic mechanism, improving transportation system,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nhydrous port, and so on.

Key words: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Province; Port Group;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收稿日期: 2016-08-19 责任编辑: 垠喜)